

乌拉特前旗文史资料

第二辑目录

乌拉特西公旗(即前旗)	
札萨克世袭简介.....	叶喜摘录整理(1)
关于恩和巴雅尔从事“红党”活动 的史料辑要.....	那顺巴雅尔原著 宝音翻译整理(7)
三公旗小学.....	宋布尔巴图(34)
祭祀穆纳.....	彭斯克巴扎尔 那顺敖其尔原著 叶喜译(52)
新安小学校史.....	陈建盛(62)
关于“谎粮堆”的考查.....	乔袁理(77)
包头、绥西、五原抗战亲历记.....	李敏才(84)
新安小学师生痛打警察始末记.....	陈建盛(111)
日寇入侵河套经过安北的前前后后.....	许贵德(120)
朱舜青在河套倡办垦区农场.....	边慕平 李博岩(128)
安北基督教会史略.....	董玉奇(135)
三湖河灌区水利概况.....	葛昌龄(164)
贾上元的舞台艺术生涯.....	李志学(202)

乌拉特西公旗(即前旗)

札萨克世袭简介

叶喜摘录整理

乌拉特西公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是乌拉特部三公旗之一。

据《蒙古游牧记》记载：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居住于呼伦贝尔，后移于此，号所部曰“乌拉特”。布尔海之后，分所部为三，长子赖噶孙鄂木布、幼子巴尔赛、孙色棱、曾孙图巴，于清天聪七年(1633年)率部归清。清顺治五年(1648年)叙从战功，因鄂木布、色棱等逝世，于是由图巴掌中旗，封辅国公；鄂木布之子鄂班掌前旗，封镇国公；色棱之子巴克巴海掌后旗，封镇国公。各授札萨克，世袭罔替。

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从清顺治五年至解

放前夕，共有十八次袭，现分述如下：

清顺治五年（1648年）封鄂木布之子鄂班为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顺治十五年（1658年）卒。

第一次袭博勒都呼（鄂班长子）：顺治十五年（1658年）袭札萨克镇国公，顺治十八年（1661年）卒。

第二次袭博勒图（鄂班次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袭札萨克镇国公。康熙七年（1668年）卒。

第三次袭阿尤什（鄂班四子）：康熙七年（1668年）袭札萨克镇国公。康熙十一年（1672年）卒。

第四次袭诺扪（阿尤什长子）：康熙十一年（1672年）袭札萨克镇国公。二十二年（1683年）卒。

第五次袭达尔玛第：（诺扪长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袭札萨克镇国公。二十八年（1689年）卒。

第六次袭达尔玛什哩（达尔玛第长子）：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袭札萨克镇国

公。雍正三年（1725年）以罪削。

第七次袭达尔玛吉哩第：（达尔玛什哩长子）：雍正三年（1725年）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十六年（1751年）卒。

第八次袭达尔玛哩第（达尔玛吉哩第长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

第九次袭噶勒桑车凌：（达尔玛哩第长子）：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

第十次袭噶勒桑罗垒：（达尔玛哩第次子）：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袭札萨克镇国公。当年（1779年）寻卒。

第十一次袭济克墨特多尔济：（达尔玛吉哩第次子）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

第十二次袭巴图敖其尔：（济克墨特多尔济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袭札萨克镇国公。道光十四年（1834年）卒。

第十三次袭噶勒当旺楚克多尔济（巴图敖其尔子）：道光十四年（1834年）袭札萨

克镇国公。咸丰四年（1854年）卒。

第十四次袭贡苏隆扎布（噶勒当旺楚克多尔济子）：咸丰四年（1854年）袭札萨克镇国公。光绪初年（1875年）卒。因无子袭其位，引起争夺札萨克席位而延续到光绪八年（1882年）。

第十五次袭贺希格德力格尔（贡苏隆扎布孙子）：光绪八年（1882年）袭札萨克民国初年（1912年）因其接受共和而被封为贝勒、并加封为郡王，因此他就成了贝勒郡王。民国十三年（1924年）。因其无子再次出现了互相争夺札萨克席位的斗争。延续八年无人袭札萨克位。

第十六次袭石拉布多尔济（贺希格德力格尔侄子）：因贺希格德力格尔无子，在本旗又发生了争夺札萨克席位的矛盾，达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民国十二年（1931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国民政府下令让贺希格德力格尔侄子石拉布多尔济袭札萨克贝子。民国二十五（1936年）卒。

第十七次袭阿木尔扎那：（劳布僧桑杰次

子)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袭札萨克。

在西公旗札萨克缺位的情况下,以额尔和道尔吉为首的西公旗上层官员依仗日伪势力,从全旗台吉贵族中物色札萨克人选。结果终于选定家住古拉奔达坝的台吉劳布僧桑杰次子阿木尔札那充当了傀儡札萨克。

日本占领乌拉山一带后,原石拉布多尔济三太太奇俊峰(色布勒玛)投奔傅作义辖区后大套。成立了西公旗临时政府,她自己不能袭札萨克位,因此札萨克缺席。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奇俊峰回到西公旗原衙门所在地哈拉汗补隆,以西公旗保安队司令的身份,取代了阿木尔札那的札萨克席位,阿只好回乡放牧。

第十八次袭巴布色楞(汉名奇法武,小名阿拉腾敖其尔,奇俊峰养子): 一九四五年奇夫人用天保、地保、四六队保的作法给其年仅八岁的阿拉腾敖其尔虚加了五岁,改名为巴布色楞经蒙藏委员会批为记名札萨克,她自己掌管了旗印大权,一九四七年秋母子二人被郝游龙(陶克套胡巴图)杀害于苏补日盖庙。

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西公旗札萨

克再次缺位，这一时期由郝游龙掌握了西公旗军队大权，原协理额尔和道尔吉掌握了行政大权。

关于恩和巴雅尔从事“红党”

活动的史料辑要

那顺巴雅尔原著

宝音翻译并协助整理

前 言



关于恩和巴雅尔在原绥西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是根据他的妻子米德格玛（今年八十一岁）和他生前的好友洛布桑丹必扎拉生（今年八十七岁）、阿茹苏布热格庙喇嘛扎木苏（现年八十岁）以及恩和巴雅尔之子曾格诺如布（现年五十七岁）等人提供的史实材料整理

编写的。

在这里，我所写的仅仅是恩和巴雅尔从事革命活动的点滴情况，并不全面。尚希后来撰写恩和巴雅尔革命史的同志们加以补充完善，并切望恩和巴雅尔的革命传略早日问世。

所谓“红党”，是指从事内蒙地区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那时，由于恩和巴雅尔不仅直接同苏联、外蒙古取得了联系，同时他也又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乌兰巴托召开的“内人党”中央特别会议上，在恩和巴雅尔未参加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因此，人们称他是“红党”——恩和巴雅尔。

根据搜集到的史料，我分别把它整理成恩和巴雅尔的家境和他的少年时期；恩和巴雅尔赴喀尔喀蒙古和苏联的经过；恩和巴雅尔主持召开革命大会；恩和巴雅尔为革命壮烈牺牲等四部分，以缅怀先烈。

一、恩和巴雅尔的家境和他的少年时期

恩和巴雅尔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出生在乌拉特西公旗勃鲁珠亥（地名）的一个世代贫苦的牧民家庭里。他阿爸叫巴勒道尔吉，额吉（母）叫宝迪桑。

父母共生有十一个儿女，其中四男七女，恩和巴雅尔在儿子当中排行老三。他家家境贫寒，全部家当也不过十几只羊的光景。为了全家生活，巴勒道日吉每年都在割芨芨、红柳、马莲和挖甜草根；而宝迪桑也夜以继日地给人家作针线、推磨、舂炒米，放庙仓的苏鲁克和役畜，夫妻俩就这样辛辛苦苦地抚养着一群孩子。恩和巴雅尔从小就聪明好学，他阿爸为了让他学习文化知识，把他送往东达合少（中公旗），二等台吉官其格身边做学生，（后来官其格因和当地官吏不和，搬到西公旗居住）。官其格知识渊博，蒙汉兼通，是当时难得的人才。他教授的学生有二三十名，当时，在西公旗的军政

要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官其格的学生。恩和巴雅尔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三十名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颇受官其格老师的赏识和器重。那时，因条件所限，每隔几天，就组织学生上山砍柴，以供日常需用。可是，官其格老师发现，在往回背柴禾时，恩和巴雅尔每次都落在其他学生的后面。起初，老师很生气，以为他偷懒，不肯出力，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他每次上山打柴时，都悄悄带着书本，别人打柴他看书，别人往回走时，他才开始打柴，所以总是落在别人的后头。当老师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不但不责怪他，而且为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从此，留他在家里专心读书，再也不用上山背柴了。

恩和巴雅尔读的是蒙汉文，因此，他从小便掌握了蒙汉两种语言文字，这对恩和巴雅尔以后进入政界和投身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因为他才能出众，蒙汉兼通，在当时人才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十三岁就进入了官府当了笔贴式（文书）。当时他连马都上

不去，每逢骑马，还得让额吉扶上去。在衙门里，恩和巴雅尔有时起草公文，有时抄写文件。由于他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人人爱慕，因此，公庙子的喇嘛们，请他用毛笔抄写蒙文经卷——“甘珠尔”经。从此，恩和巴雅尔成为在牧区受人喜欢的文人墨客了。

西公旗札萨克诺彦贺喜格德力格尔逝世后，因无子嗣，在大吐斯拉克其（协理）额尔和道尔吉的提议下，由贺王堂弟石拉布多尔济继任了札萨克诺彦。对于此事，公庙子的依西达格登大喇嘛始终坚决反对。因为他企图让其侄子巴图巴雅尔接充札萨克诺彦之职，成为一旗之长（依西达格登与贺喜格德力格尔为叔伯兄弟）。从此，西公旗围绕谁接替札萨克诺彦职位的问题，形成为两大派。斗争的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额尔和道尔吉上书绥远省主席商震和乌兰察布盟长巴布道尔济，呈请批准由三等台吉石拉布多尔济为札萨克诺彦。这个报告的起草人，便是恩和巴雅尔。后来额尔和道尔吉官司打赢了，由石拉布多尔济接任了西公旗札萨克诺彦之

职。于是恩和巴雅尔进一步受到官府的器重，被晋升为衙门的文书长。

恩和巴雅尔十八岁那年，被任命为笔贴室长，接着又奉命与黄毛二人赴北京蒙藏院任文书。由于恩和巴雅尔的才华出众，因此蒙藏院委任他为委员。

二、恩和巴雅尔赴喀尔喀蒙古

（外蒙古）和苏联的经过

在北京任职期间，恩和巴雅尔很注意观察和了解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当时，国际上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皇帝国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推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国内继辛亥革命之后，“五四”青年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着整个中国，同时，喀尔喀蒙古正酝酿着革命独立。国内外这些革命运动，对恩和巴雅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这种形势，他决心返里宣传革命道

理，开展革命活动。在他回西公旗前，首先剪掉了长辫子，以示决心。他从北京回到家乡后，怀着满腔的热情，向全旗人民宣传“五四”青年运动的伟大意义，大讲俄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的影响。接着，在一九二二年秋季，他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离开家乡，去了喀尔喀蒙古。临走时，他悄悄告诉妻子，不久在这一带将发生革命，他先到那边（指喀尔喀蒙古）看看。此事除妻子外，他对任何人都没有透露。他的行动非常秘密。

恩和巴雅尔到了喀尔喀蒙古以后，在那里过了一个春节。据说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和乔巴山曾接见过他，并给他许多重要指示。他的额吉也说，恩和巴雅尔从喀尔喀蒙古回来后，曾和她商量，要把家搬至喀尔喀蒙古居住。当时，由于他额吉没有表态，就只好作罢。

按西公旗旧制，从每年腊月三十日起，为封存旗衙门官印的日子，启封日期，则在次年的正月，由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的四天中

选择。在这四天内，选择天气最好的日子为启封日，并举行隆重的启印仪式。在官印封存的二十多天里，衙门（官府）一律不办理公事，惟当启封大印的这一天，全旗高级军政官员和十二个苏木的章京和洪德，参加官印启封大典。一九二三年的官印启封大典，和往常一样，庄严而隆重。除公庙子的大喇嘛依西达格登的人马外，全旗大小官员全部赶到。启封大典结束前，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文体活动，真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恩和巴雅尔抓住这个良机，站在会场上的高处，向全旗人民进行宣传。他报告了自己去喀尔喀蒙古的经过，并且公开号召西公旗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进行革命。当人们听了恩和巴雅尔的宣传后，大为震惊，许多人当场表示拥护，要求参加革命。就在这次启印大会上，根据大家的一致要求，起草了西公旗人民的致革命党书，书中表示拥护、赞成革命。经旗吐斯拉克其（协理）额尔和道尔吉加盖官印后，当场交给了恩和巴雅尔，请他转交给革命组织。

恩和巴雅尔是一个杰出的宣传活动家。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他不仅在广大牧民群众中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还巧妙地深入到上层人士中，逐个去说服和启发他们起来参加革命。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有时还为牧民们解决具体问题。如东达合少（中公旗）吉昆（东）苏木的官其格家窝藏抢了西公旗牧民的土匪，该旗不予惩办，恩和巴雅尔便出来替西公旗牧民打官司，结果赢了东达合少。一九二四年，恩和巴雅尔第二次去了喀尔喀蒙古（是年他二十四岁）。这时，恩和巴雅尔的名子在草原上的牧民中，已经家喻户晓。人们亲昵地叫他是“红党”恩和巴雅尔。究竟他哪年加入过哪些党，人们并不清楚。有人说，恩和巴雅尔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有人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有的材料上记载着他参加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他第二次赴喀尔喀蒙古时，同行的是一位汉族同胞。他们两人随身携带了以全旗人民名义起草的革命书，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喀尔喀蒙古已经推

翻了以哲布尊旦巴为首的黄教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乌兰巴托，他分别见到了乔巴山和苏联驻蒙古特使。苏联特使告诉恩和巴雅尔说，你可以去莫斯科，于是，他便去了苏联。他在莫斯科时，由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接见了。他除向代表汇报了西公旗革命发展的情况外，还要求第三国际支援西公旗革命运动。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回答说：“第三国际将派维辛斯基去中国。今后你们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同时，苏联同志也答应给他们支援六百支长枪，两挺机枪还有些手枪。并派两名俄国人和一名翻译来中国。双方约定在包头接头，还告诉恩和巴雅尔说，“蒙古革命党”人也会支持你们革命的。又说，为了便利革命活动，你们暂时可以打起俄国革命的旗号，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共同进行北伐战争。对此，第三国际的代表说，你们那里和喀尔喀蒙古的情况不同，没有条件实行独立，

要想取得内蒙古人民的解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第三国际的代表还告诉恩和巴雅尔，过完年你要尽快返回家乡，为一九二六年夺取革命胜利做好准备。恩和巴雅尔根据第三国际代表的指示，在喀尔喀蒙古过罢年，立即返回西公旗。在他回旗时，蒙古方面决定派四个人来协助工作。这四个人都是我国蒙古族。他们是赛音巴雅尔（包悦卿）、赛兴阿、墨尔斯（郭道甫、呼伦贝尔人），另一人名字不祥。蒙方给他们每个人制做了一件相同颜色的蒙古袍子和一顶帽子，然后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中蒙边界。他们入境后，先是步行到了阿纳斯太（地名），然后从那里借骑乘回到西公旗孙岱家。在这里躲了两天以后，又继续往南走过了黄河，先后到鄂托克、乌审和杭锦三个旗，见到了席尼喇嘛乌力吉杰日嘎拉，看了独贵龙运动的组织情况。在此期间，恩和巴雅尔从协日召（庙名）派人回旗通知地方官员，说明他已来到伊盟地区。西公旗接到信后，立即派高勒苏木的三等台吉

阿木嘎和他的随从宝迪仁钦、仁庆道尔吉三人专程到协日召迎接恩和巴雅尔返旗。之后，把恩和巴雅尔一行，安置住在乌日吐高勒庙。

恩和巴雅尔进行革命活动，必然会招致敌对分子的仇视和反对。公庙子大喇嘛依西达格登得知恩和巴雅尔从事革命活动，并去过“红党”国家的消息后，便认为旗札萨克诺彦石拉布多尔济，淖尔津杭赖（札萨克诺彦贺喜格德力格尔之妻）有加入“红党”的嫌疑。因此，他把恩和巴雅尔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处心积虑地进行策划，企图谋杀恩和巴雅尔。依西达格登大喇嘛的阴谋，被巴润庙的活佛喇嘛探知后，他迅速报告给石拉布多尔济、淖尔津杭赖，并把他们二人转移到额尔和道尔吉协理身边，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恩和巴雅尔他们也由乌日吐高勒庙回到了旗衙门，会见了额尔和道尔吉协理。恩和巴雅尔除一方面向额尔和道尔吉介绍了从喀尔喀蒙古新来的四位客人外，又向他介绍了喀尔

喀蒙古和苏联的革命形势。后经过反复协商，终于使额尔和道尔吉同意召开全旗的革命大会。

三、恩和巴雅尔主持召开革命大会

二十年代中期，乌拉特西公旗的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额尔和道尔吉一人手中。因此，恩和巴雅尔开展革命活动，必须首先争取和利用额尔和道尔吉。他同额经过一番协商，决定一九二六年（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在乌日吐高勒庙召开革命大会。并对大会议程及需要通过的事项，都做了具体的研究安排。

在革命大会召开之前，恩和巴雅尔、赛音巴雅尔和墨尔斯一起到了包头。他们在包头勘察确定革命指挥机关驻地的同时，并赶制了旗帜。与此同时，按原定时间，如数接受了苏联支援的枪支弹药。他们留下二百支步枪，把其余枪支弹药给了西公旗团长沙格德尔和他的儿子玛西巴雅尔营长，重点武装

了这支部队。因为沙格德尔对革命态度坚决，积极支持恩和巴雅尔的活动，并且他又是掌握全旗军队实权的人。

一九二六年（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在乌日吐高勒庙上，高挂有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高唱着革命进行曲，由恩和巴雅尔主持了革命大会。到会的人们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充满着坚定的革命信心，大会开得异常成功。据说，大家唱的歌词是恩和巴雅尔亲自写的。记得在歌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举起那革命的红旗，要把革命的歌声响遍四海；使敌人怕得失魂落魄，快快把百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英特纳雄奈尔，必定要胜利，要胜利！！”大会上恩和巴雅尔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热烈拥护，并激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砸烂旧制度，解放全人类，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在大会期间，青年人积极报名参加革命，乃至大会结束后两天，就有二三十名青年报名参军。其中有牧民、也有喇嘛。有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贺希格达来

（现在白彦花医院当医生，七十四岁）报名要求参加革命。当时他的身个连一杆枪高都没有，但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他额吉知道后，多方劝说方才作罢。乌日吐高勒庙活佛喇嘛洛布僧丹必扎拉生（八十七岁，健在）、班弟喇嘛宝德仁钦和仁钦道日吉，也积极报名加入革命行列，从而使革命队伍迅速发展。恩和巴雅尔将枪支弹药，发放给参加革命的青年后，接着便在乌日吐高勒庙搞集中训练，由赛兴阿直接担任军事教练。后来，这支队伍成为恩和巴雅尔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

同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恩和巴雅尔把部队从乌日吐高勒庙移驻到包头，把指挥部设在离城西不远的关老爷庙附近。同时，为了进一步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并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情况，恩和巴雅尔曾到过不少地方。据说，曾跟毕力格巴特尔有过联系。毕力格巴特尔告诉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共两党发生分裂，给革

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毕力格巴特尔建议恩和巴雅尔返包头后，亲自或派一名可靠的人去北京，直接同第三共产国际远东代表联系。恩和巴雅尔根据毕力格巴特尔的建议，又征得一道工作的几位苏联同志同意，派赛音巴雅尔进北京找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从乌日吐高勒庙喇嘛那里，借了一套喇嘛服装，把赛音巴雅尔打扮成喇嘛模样，以去雍和官拜佛磕头为名到了北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当经共产国际代表指出：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他们进一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如形势不利，应立即从包头撤往喀尔喀蒙古。共产国际的代表还告诉说，他将在一九二七年回国。赛音巴雅尔返回包头后，把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的内容和所提出来的意见，向恩和巴雅尔一一作了汇报。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认为暂时还呆在包头，等过了春节，看看形势的发展情况再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开始了大屠

杀，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鉴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经研究决定，恩和巴雅尔去鄂尔多斯找席尼喇嘛。如果伊盟形势对革命有利，就将革命力量转移到鄂尔多斯；如果情况仍然不好，再投奔苏联和外蒙古。另外，恩和巴雅尔已经估计到，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会有人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特别是西公旗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很多，又犬牙交错，必须防止和警惕有人背叛“红党”，给革命造成损失。不久，他亲自带领二十余人，过黄河直奔席尼喇嘛处，不料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动手，开始暗中监视席尼喇嘛的活动。于是，恩和巴雅尔当机立断，作出了向北转移的决定。当时，在包头驻有革命队伍百十人左右，他们用十六辆车，八峰骆驼，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装运上，离开了包头。当他们走到昆都伦河畔，准备在两户汉族大院安营打尖时，突然有几百名军人包围过来。据老乡说，这些家伙住在离村不远的正南方，经常出没在特标勃勒西（昭君坟）一带。每隔一个时期，就要四出抢劫、掠夺老百姓的东

西。谈起这些部队，不论是老人或小孩，都叫他们是张老爷部队。根据这一情况，几位苏联人提出来要收拾这帮土匪，同时已把机枪架起来准备向他们开火。正在这时，恩和巴雅尔部队中的一个叫额尔登和什克和一个莫日根庙的喇嘛诺木罕出来说：我俩曾与张匪为结拜兄弟，我们可以出面说和，让张匪让路。大家轻信了他俩的话，派他们去联系。结果他们俩给对方实话实说，说恩和巴雅尔的部队要路过这里，回西公旗。张匪便问，是否为“红党”恩和巴雅尔，他本人现在在哪里？这两人一一如实回答。说恩和巴雅尔前几天就过去了，谈话中，并把几个苏联人也告诉给他们。张匪了解此情况后，马上装出同意撤兵让路，并提出请他们的部队来其驻地休息。额尔登和什克、诺木罕二人中了敌人的计，跑在高山头上，呼喊大家过去。就这样，恩和巴雅尔的部队上了当，三位苏联人和翻译都叫敌人俘虏了。其他人连情况也没来得及搞清楚，就被敌人缴了械。最后敌人扣留了苏联人、翻译及其他两人，然后宣

布其余人员可以回家。

绝大部分士兵向西北方面走去，及至到了阿嘎鲁泰（地名）包红布家时，恩和巴雅尔正好由协日召赶到此地，遇上了此种惨况。他对几个领导人的遇险感到十分焦急。他非常难过地说：“失掉财产没什么可惜的，而失去了几位革命同志，是革命的最大损失！”他悔恨自己当时不该离开包头。接着召集大家开会，除说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形势暂时对我们不利，革命的同志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外，还告诉大家，西公旗额尔和道尔吉叛变了革命，他勾结依西达格登大喇嘛，企图袭击我们。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事已至此，现在每个同志要各拿自己的主意，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去；愿意跟我去喀尔喀蒙古的也可以去。但，是走是留，我们大家都要到乌日吐高勒庙后再分手。”说完，全体人马越过古日本达巴（三道坝），到了小吐斯拉克其（协理）色林保家。色林保看到恩和巴雅尔部队遭受敌人的袭击惨况后，主动支援部队十支步枪，这样以来，他们算

上原有的枪支，已有三十来支枪了。在部队继续走到莫日根北口子时，和那顺傲其尔带领的十来个兵相遇，于是，他们汇合在一起，奔赴乌日吐高勒庙。

乌日吐高勒庙，原是召开过革命大会的地方，也可称作革命发源地。当恩和巴雅尔的部队来到乌日吐高勒庙时，由于革命遭到失败，他们正在面临着新的考验。当时，有的人提出离开部队回家放牧，但绝大部分人则坚持留下来去喀尔喀蒙古继续革命。其中最使人感动的是：乌日吐高勒庙的活佛喇嘛洛布僧丹必扎拉生也坚决要走。但由于庙上执事喇嘛们的执意挽留，没有满足活佛的要求。个别战士满心想走，惟因家庭困难走不了，最后，他们不得不流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

之后，恩和巴雅尔为了进一步摸清西公旗各类上层人士对革命的态度，他特意找到额尔和道尔吉，请他谈一下他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额尔和道尔吉口是心非地对恩和巴雅尔只是说：“现在，你们对一个旗的安

全都很难保证，还谈什么苏联和蒙古出兵支援呢？”他对恩和巴雅尔去喀尔喀蒙古的问题，避而不谈。显然，额尔和道尔吉对革命的看法，是抱着消极失望的态度。

四、恩和巴雅尔为革命壮烈牺牲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恨不得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为了镇压国内革命力量，扑灭革命火焰，他纠集了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围剿革命苏区。当时，绥远都统把西公旗的吐斯拉克其额尔和道尔吉叫到归绥，让他汇报苏联人在西公旗的活动情况，并下令追查逮捕革命党中的主要头目。额尔和道尔吉原是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他尽管加入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他貌合神离，和革命党人并不是一条心。关于额尔和道尔吉与绥远都统之间究竟有过什么秘密勾结，人们并不清楚。可是，在额从绥远返回西公旗以后，立即着手布置消灭恩和巴雅尔领导

的革命队伍。他首先采取拉拢利用的手段，企图哄骗恩和巴雅尔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恩和巴雅尔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对他的甜言蜜语，嗤之以鼻，致使额尔和道尔吉的阴谋没能得逞。于是他又采取了三种方法。即利用他全旗大协理的权势，发布围歼恩和巴雅尔革命部队的命令。他命令三等台吉石拉布多尔济出兵，与骑兵配合攻打恩和巴雅尔。但石拉布多尔济拒绝出兵，他质问额尔和道尔吉：“作为堂堂有名的西公旗吐斯拉克其大诺彦，你曾经亲自带领大家宣誓参加过“红党”，如今出尔反尔，竟命令我去打恩和巴雅尔，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不用说我的部队不在，即便在，也不会给你出兵打人家。”此话是朝鲁巴特尔亲自听他说的。额尔和道尔吉，恼羞成怒，又给本旗阿拉塔钦苏木梅林章盖宝音陶克特下道命令，让他在七月二日，务必出兵从恩和巴雅尔驻地的左侧发起进攻。可是额尔和道尔吉没想到宝音陶克特与恩和巴雅尔是老朋友，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宝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将额

的行动计划通知给恩和巴雅尔。

额尔和道尔吉费尽心机，始终没达到消灭恩和巴雅尔的目的，于是，他又施展了阴谋诡计。按过去的老传统习惯，在每年的旧历七月初二，旗衙门都要举行祭军旗仪式。军旗长九尺，旗尖是一块三棱铁，旗边是用淡黄色的绸缎和哈达制成的穗子；旗中心刻有奔腾的四条巨龙；旗杆把上套着带长辫子的人头皮。在祭军旗的仪式上，所有的士兵都须列队跪倒在军旗前面发誓效忠。

七月初二凌晨，由额尔和道尔吉部下的排长西日门带队，向恩和巴雅尔驻地的右侧发起了进攻。当时，恩和巴雅尔在院中烧毁文件。同时在左侧也响起了枪声。这时，恩和巴雅尔部下埋伏在西沟里的十个士兵，有一个喀尔喀人中弹身亡，其余的人退下来了。西日门的部队愈打愈烈，三番五次地扑上来，但均被恩和巴雅尔给打退了。当恩和巴雅尔发现左侧来的是宝音陶克特的部队时，便告诉大家不要管左侧的枪声，要集中力量对付西日门。经过半天的战斗，西日门

的部队开始后退了，宝音陶克特的部队，也撤回乌宝力格驻地。恩和巴雅尔借战斗暂时停止的间隙，很风趣地对大家说：“西日门能把我们消灭在这个山沟，那是西日门的幸运；我们能冲出他们的包围圈，那是西日门的失败。”接着，恩和巴雅尔还动员大家说：

“敌人可以打死我们，但消灭不了这个地区的革命。我们一定要突破额尔和道尔吉的封锁，永得生存，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他宣布：每个战士只许带一匹马，一套马鞍和一杆枪，其他东西留给群众，以便轻装突围。

在夜幕低垂，暮色四合时，枪声又响了。西日门部队再次进行反扑。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恩和巴雅尔吩咐大家：估计西日门也许变换战术，他很有可能放弃骑马，率众徒步进行攻击。我们则趁机骑马突围，尽快摆脱敌人。还说，“我们是人，西日门也是人，只要中弹，他们也逃不脱死亡的命运。”接着恩和巴雅尔吻了一下五个月的儿子，然后告别了妻子，接过警

卫员递过来的轻机枪，骑马率领大家冲杀过去。顿时战场上，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带着风声的子弹呼啸着飞过他们的头顶，雨点般地落在西日门的阵地上。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恩和巴雅尔的部队，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于次日一早安全地到达了莫日根庙。

恩和巴雅尔的部队，经过这场铁与火的洗礼后，素质明显地提高了。在莫日根庙上，他一边设岗加哨，防止敌人的袭击，同时还看望了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并对士兵家属也逐个地做了工作。沙格德尔团长是西公旗坚决支持恩和巴雅尔革命的上层人士。他闻讯赶来看望恩和巴雅尔。并劝恩和巴雅尔不要去喀尔喀蒙古，自己保证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恩和巴雅尔当时反复讲了他之所以要出走的理由，并请求老团长在他走后，多方面关照他的母、妻及幼子。还请老团长代他向色林保吐斯拉克其和宝音陶克特梅林章京作解释，说明他当前的处境和苦衷。过去这三个人都解救过恩和巴雅尔，并帮过他的忙。因此，恩和巴雅尔很感激他

们，并愿以诚相告。

额尔和道尔吉，消灭恩和巴雅尔的阴谋虽然失败了，但他并不死心，他先后又与大余太和东达合少（中公旗）取得联系，准备切断恩和巴雅尔的去路，企图把他们消灭在边境线内。一九二八年八月（阴历七月十七日），当恩和巴雅尔的部队路经大余太以东乌兰呼都格时，突然遭到贺连长部队的袭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在战斗中虽然战士那顺傲其尔牺牲了，但部队再次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继续往北前进。终于在旧历七月二十到达了中蒙边境的索伦山南麓的恩格尔庙。由于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他们决定在恩格尔庙休息后再动身。不料，他们却被早已接到额尔和道尔吉通报的东达哈少的齐布格扎卜率领的二百多名士兵所包围。在第二天黎明双方便开始接火。在战斗中恩和巴雅尔爬上山顶用轻机枪掩护着战士完全地脱离了敌人的火力网，但在他个人最后撤离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

一九二八年旧历七月二十一日的凌晨，

年仅二十七岁的恩和巴雅尔同志，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民族的解放，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的英雄业绩永远为人民传颂。

恩和巴雅尔同志永垂不朽！

注：本文选自《巴盟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个别字、句，略有改动。

三公旗小学

宋布尔巴图

(一)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通电各盟旗派代表到南京“参议政要”。从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彻底被摧毁。民主主义将实现，对这场空前未有的革命胜利，全国人民包括蒙古族王公庶民在内，莫不拍手称快。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乌盟值班盟长巴布多尔济，带领乌拉特西公旗梅令章京桑介扎布（汉名贺级三）及衙门师爷恩和巴雅尔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前后，他们三人，游览了京、津等地区壮丽山河，名胜古迹，同时观察了“五、四”运动以后的新形

势新气象，使一向偏居在盟旗的三位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增进了知识，不仅对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在改变盟旗经济文化落后方面，有了适应形势，奋发向前，创建学校，培养人才的强烈愿望。

在这个时期，东北蒙旗师范教师郭道甫的学生及白云梯等人。随同冯玉祥部队进入绥远五原一带时，贺级三以旅长身份带兵镇守包头，在园子巷设置了乌拉特前旗驻包办事处，这时他的助手“红党”恩和巴雅尔与蒙古人民革命党人有了联系，接受了乌兰巴托传来的革命理论，以及支援来的八九十支步枪。于是在乌拉特西公旗梅力更庙一带，发展党员、组成党小组，招兵买马，建立“红党”武装，发放宣传革命材料，高唱革命歌曲。

与此同时，贺级三等三人，为了培养蒙族人才，改变蒙区落后面貌，发起创办学校的建议，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得到乌盟值班盟长巴布多尔济的同意。并决定：三公旗联合办学校，成立筹备小组。贺级三负责主持，乌

拉特中公旗章京巴扎尔、梅令德力格尔桑及乌拉特东公旗协理松布尔巴图等人参加；三个旗各拨出若干顷土地作为学田地，以其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学校名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三公旗公立两级小学校”。事后又经过一番努力，由乌拉特西公旗扎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指定在千里庙前的同义隆拨地为学田地，成立学田局，负责管理垦种和筹措学校费用等事宜。乌拉特中公旗和东公旗，曾也答应给学校拨地，但始终没有兑现。

三公旗小学，就是在当时国内革命势力由南向北发展，蒙古革命思潮由北向南传播；再加积极分子的努力倡导下，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建立、发展、完善起来的。

(二)

筹建学校负责人贺级三，原籍乌拉特西公旗贺日恼德苏木人，简称姓贺，他家住包头西兰柜窑子。他的小名又叫刘保子，人们尊称为刘保官府。他从青年时期即出入旗衙

门，曾任旗的梅令章京，管辖六个苏木，是札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的有力助手。办垦务时，经常代表贺喜格德力格尔处理具体事务，广交垦务局及地方绅士。一九二四年之后，经常代表旗衙门和贺喜格德力格尔出席各地举行的会议。冯玉祥进入绥西时，他以旅长身份镇守包头，在包头南圪洞建造了砖木结构，较为豪华的三套院，巷名叫贺家巷。

后来贺级三在办理放垦期间，不但自做主张和任意扩大报垦面积，引起广大牧民的反对，而且札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也为他的独断专行非常气愤，将贺级三带上镣铐下狱，但由于贺本人联系面广，个人名声高，再加兵权在手，贺喜格德力格尔对他无可奈何，只解除了其梅令章京职务后释放。贺级三仍然带兵在包头周围的大树湾，五大村一带驻扎，还依靠国民革命的势力镇守包头城，所以革去章京一职，并不降低他的威信权势，再加他还有一位得力助手“红党”恩和巴雅尔，所以他筹办一所小学，易如反掌。

一九二五年，贺级三在包头园子巷乌拉特西公旗办事处门口，挂起了校牌，请王升为总务主任，雇用管帐先生和事务员开始筹备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改造了有三间大的教室二座，四五间学生宿舍，还建立了大小厨房、传达室，师生厕所，另外给学生做了一百多套书桌凳子，五六张教师办公桌子，以及大小黑板和讲台等等。

在修建教室，配备教学用具的同时，积极聘请教师。由于包头师资缺乏，便由山西大同、浑源、五台等地请来汉文教师李文诚、薛××、孟××等三人。由“红党”恩和巴雅尔任蒙文教师，李文诚任教务主任，同时责成李文诚备文报盟长及绥远督统府（省府）教育厅备案。与此同时请求上级拨发经费资助，呼吁各有关方面支持。因贺级三是当时的垦务局、水利局委员，镇守包头的旅长，所以地方豪绅纷纷捧场大力支持。在学田地还没收入之前，即完成了筹备工作。

种学田地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且

油水极大。所以贺级三于一九二四年即命其子贺守基任学田局局长。其子上任之后，先聘请了大小管家、帐房先生、长工头、大师傅，此外雇了二三十名长工。在千里庙前同义隆修建了许多间正房、库房、伙房、长工住房。贺守基统率其手下人马各执其事，除耕种几十顷土地之外，还放牧着牛羊。经过一年以后，真可谓，牛羊满圈粮满仓，供给三公旗小学师生职工一切工资和衣服，伙食等费用绰绰有余。当时蒙民中纷纷议论说：“从后套拉走的金子有碌碡那么大，到了包头磨成鸡蛋那么小”意思是说学田地收入不少，然其中漏洞很大，真正用到学校者确实不多。

开垦学田地，有了收入之后，起了很大的纠纷。原因是千里庙的主持管家，认为学田地原来是庙上的缮召地，所以学田地的收入应由庙上支配，再者开垦学田地，破坏了草场，影响了放牧，所以要求收回学田地；石拉布多尔济任札萨克后认为学田地的收入应上缴王府一部份；至于贺守基更是理直气壮地认为他是执行老札萨克贺喜德力格尔的

命令，名正言顺，要全权支配学田地的一切收支。三方面各持已见，闹得不可开交，矛盾日益激化。尽管如此，经过积极努力之后，学校有了场地，有了教师、职工，有了充足的办学经费，其筹备工作基本结束。

(三)

一九二五年，贺级三任第一任校长。当时有汉教师三人，蒙教师一人，校医一人，学生仅有七八人，上课一两个月后就放假了。学生冬夏季衣服穿戴，理发、洗澡、医疗，以及学习文具，用具等全部由学田经费拨款供给。沙尔沁、土默特蒙民子弟中与贺级三校长、贺守基学田局长有亲属关系的如全崇德、全崇富、全新华、云文斋等也享受了不同的公费待遇。

当时教师工资相当高，最低的每月支现大洋四十多元，教师家属由校方安排住处。一九二六年“红党”恩和巴雅尔同贺级三的内弟喇嘛扎布前往乌兰巴托后，于一九三一

年从科尔沁旗请来吴亚挥老先生（大胡子，以后赴南京蒙藏学校任教）教蒙文，他月支现大洋八十元还嫌有点少。从而可知校长，主任等人的工资更为可观。直到一九二六年蒙民对送子弟入学学习的道理还不理解，尽管入学后完全享受公费，但仍没人自愿入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衙门采用了强迫性的指名入学措施。如仍不去入学者，即派人抓学生，结果只抓了十多名学生。其年小者十二三岁，大者二十一二岁，抓来年龄大的学生，住上几天，换上新衣服后就跑掉，比较安心学习者，要算贺家子弟，因为他们住在包头五大村一带，大部份是贺家的亲人，如贺守先、贺守忠、贺淑清、贺守业、贺守信、贺立基、贺立业、贺永级、贺级富等。

一九二八年间学生增到一百多人，教室不够用，宿舍也不够用，于是租用了财神庙久长城巷内一个大院，修了四个大教室和学生宿舍。随着学生的增多，教师也相应增多了。如薛韩正、史境武、巴拉吉尼玛，图门巴雅尔、恩和巴雅尔、呼尔沁

毕力格（汉名叫焦连璧）李振江、王恩荫（原巴盟副盟长）、侯燕之、孟宇等都是新增教师。当时由教务主任李文诚代行校长职权，此外增设了事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员、会计员等共达十四五人之多。实行“四、二”制教学，教学科目有算术、语文（包括蒙文）、地理、历史、美术、武术、唱歌后来还增设了英文、满文、藏文等课。此外为了办好学校，成立了董事会，聘请社会名人任董事、商讨有关重大事宜。

一九二九年，学校董事会认为在包头办学校，学生入学率不高，有必要迁回乌拉特西公旗教学。根据这一决定，便在乌拉特西公旗梅力更庙借用“章恨”大院，修缮了许多房间，把学校由包头迁到这里办了一个学期。学生人数有所增加，但学生们非常淘气，经常到庙里折腾，还和小喇嘛打架，再加汉教师不习惯在山沟里生活，喇嘛们也反对在庙上办学，于是汉教师纷纷要求把学校搬回包头，校址仍设在包头园子巷西公旗办事处院内，并将扎萨克来包时住的正房外间改

为教室（扎萨克来包时住里间）。

一九二九年贺级三校长逝世，由其子贺守基代理校长。但不久校长由代理扎萨克额尔贺道尔济担任。

（四）

额尔贺道尔济，汉名额宝斋，任乌拉特西公旗代行扎萨克，他原是西公旗的东协理。贺公逝世后，由于继任扎萨克的人选一时决定不下来，在石拉布多尔济和巴图巴雅尔互争扎萨克职位之际，盟长指定额宝斋代行扎萨克职权。他掌握了全旗军政大权以后，便自动兼任了三公旗小学校长。

额校长上任以后除汉文教师个别变动外，大部份仍用旧人；蒙文教师辞退了吴亚挥老先生，从绥东福生庄请来巴拉吉尼玛任蒙文教师。另外还聘请了乌拉特西公旗的阿尤尔布尼亚和乌拉特东公旗原任协理松布尔巴图等二人任教。这个时期职工七人，教务主任一人，总务主任一人，记帐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工友一人，炊事员二人。

这个时期有蒙汉学生近百名，除有土默特旗学生七、八名外，其余都是乌拉特西公旗人。一九二九年初级班毕业了十五人，一九三〇年初级班毕业了十人，一九三一年初级班毕业了十二人，高级班毕业了七人。

额校长在任时期，石拉布多尔济在衙门里争权夺利，占了上风。于是后套千里庙同义隆学田局停办，所有学田局的土地财产一律归由石拉布多尔济处理，至于学校经费来源，改由中滩、五大村垦务岁租收入中支付，其收租事宜责由包头办事处办理。

这时学校董事会，由额宝斋兼董事长，由王升、王三不浪任副董事长，下设工作人员四五人，主要办理收款记帐等事宜。这项垦务岁收不亚于学田局时期的收入，满可以支付教职工的工资以及各项开支所需。

这个时期事务主任史境武，对供应管理学生的衣、食、住等方面非常认真。设备也增加了不少，如各种乐器、大小军鼓、军号等深受学生喜爱。学生在参加运动会，游行时齐穿一色新校服，队伍整齐化一，十分壮

观。在包头城内所有学校中，堪列首位。

后来由山西五台山请来张××担任学校的武术教练，教学生学武术。各项美术作品都在成绩展览室里展出。每次参加运动会时，均创可喜的成绩。

一九三二年秋，额宝斋校长和新上任的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之间矛盾重重，于是额宝斋逃往百灵庙，投奔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遗职自然由石拉布多尔济担任。

(五)

一九三三年石拉布多尔济自任校长，辞去原教务主任李文诚，另聘请严肃（实际是绥远省教育厅派遣来的）担任教务主任，同时代行校长职权。严肃出身行伍，他在学校根本不管校务，每日忙于窥探石拉布多尔济的动向，调查了解社会的动态，他实际上是绥远省驻乌拉特西公旗的坐探。

与此同时，一位叫王汉民的教师也来到了三公旗小学。王是吉林省人，日本留学

生，他精通日语，略懂汉文，行动诡秘，与日本人有何等关系不得而知，但从日寇占了包头之后，他一跃而升为包头市政府总务科长来看，可知此人是个日本特务。

三公旗学校出现了严肃、王汉民之流以后，他们不务正业，学校各个方面停滞不前，蒙生减少，大量招来汉生入学顶充人数。这些汉生大部份是前旗富人子弟，他们虽不享受公费，但也不交纳学费，而且还供给课本文具等等。汉生大部分年幼系跑校生，蒙生年岁大均住校，蒙汉生经常有打架现象，训育主任概不过问。

这个时期，学校里成立了童子军，每人都发放了童子军服和一些用品。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教育非常松弛，以致学生违纪行为非常严重，有些大点的学生经常与警察闹事，到戏园子捣乱，到下流地方胡混，甚至为伙食标准下降而去找衙门仕官闹事，罢课。更奇怪的是教师聚众赌博、被学生抓住后，教师向学生行贿。教师引导学生仿效桃园三结义拜把子认兄弟。从而趁机大吃二喝，把个好端端的

学校竟被一二个来历不明的人搅得乌七八糟，笑话百出，使学校走向下坡路。

一九三六年秋，石拉布多尔济逝世，其夫人奇俊峰（蒙名叫色布勒玛）出任三公旗小学校长之职。

（六）

奇俊峰是石拉布多尔济的三太太，虽稍懂汉文，但并不懂办学之道，他上任后把表现好且有学识的教师大部分辞退，委派他的亲信图门巴雅尔任蒙文教师，请来两三名买卖人任汉文教师，奇俊峰与教务主任严肃关系暧昧，严成了奇俊峰的私人秘书。此时学生只有三十余人，学校经费挪做王府衙门使用，学生享受公费无以保证，经常请愿，罢课。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奇俊峰去往后套，教务主任严肃去向不明，只留下总务主任王升，他趁机独吞学校财产，三公小学校到此时混乱不堪，濒临垮台边缘。

(七)

一九三八年，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以后，额宝斋由绥东重返西公旗，仍住在包头园子巷办事处，成立了乌拉特西公旗政府，代行札萨克职务。从此以后就不再提三公学校了。

一九三九年初，旗政府迁到东大高勒沟口时，把三公旗小学校剩下的部份桌凳也搬到乌日图高勒沟口的小庙子（今巴音花苏木），借用活佛的大庭院和喇嘛们房舍作为校舍，校名改为乌拉特前旗小学校，由阿命达瓦主持校务。阿命达瓦调升到旗政府工作以后，由额尔登毕力格负责学校工作。他从本地聘请了特古斯毕力格担任蒙语教师，后来因国民党军队与日寇在包头、五原等地交战，局势不稳，学校停办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六年学校又搬到官牛渠，校名改为西公旗国立中心小学，学校的一切费用由旗政府支付，学校的负责人为杜锦华。

一九四九年校址由官牛犊迁至根子场，继续办学，暂由教务主任华吉日戈负责学校工作。一九五〇年把学校又迁到小庙子，这时由初小发展到完小。一九五三年学校迁到哈业胡同，修建了新校舍，添置了学生桌凳和办公用具，华吉日戈任代理校长职务。一九五六年学校从哈业胡同迁到哈拉汗，校名改为乌拉特前旗巴音花蒙完小，华吉日戈任校长。同年上级给学校分配了五六名师范毕业生任教，随着时日的推移该校的面貌日新月异，学生连年增加教学质量大为提高，深受群众欢迎。

(八)

从三公旗小学到改名为西公旗国立中心小学而发展成为今天的乌拉特前旗蒙古族第一中学，尽管为期不太久长，然却相当曲折。

由于当时教师本身水平较高，加上要求严格，所以学生的成绩出色，培养出许多有用之材。在乌拉特前旗政治文化等方面，起了一

定的推动作用。

据统计了解，三公旗小学毕业生中鄂秉礼，鄂志诚二人保送到黄埔军官学校学习，郝体礼、德振国保送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贺守先、贺守忠、贺守业、郝振华（乌恩德力格尔）、鄂枢中（宋布尔巴图）、云文齐（土旗人）等六人考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学习。

从三公学校毕业后到外地深造毕业者有：伊锦文由民国大学毕业、贺守业由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焦连璧（呼尔沁毕力格）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又在东京医大毕业、云文齐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贺守忠和郝永忠由日本北海道大学毕业。

原三公旗小学学生，经过深造担任了不同职务者计有：贺立基从蒙古留学回国后担任伪蒙军副团长，金志强从伪王爷庙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蒙古军团长。另外从三公旗小学出来的师生，经过学习、锻炼从而在旧社会任职者有：三十五军某团团长吕景端，某军团长、军统特务郑凤鸣（已镇压），国立伊盟中学教师、乌拉特中旗国民党党部书记贺守忠，

伪国大代表、国立乌拉特前旗小学校长贺守业，茂明安旗三青团书记员郝振华，马王庙蒙古中学校长、土旗包头小学校长、国立伊盟中学教员、乌拉特西公旗西协理鄂枢中（宋布尔巴图），伊盟中学代校长伊锦文。西公旗保安司令郝游龙（陶克陶胡巴图）等。

三公旗小学出来的师生在新社会参加革命工作的有：内蒙古卫生厅厅长胡尔沁毕力格。畜牧厅畜牧处处长云文齐，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总务主任贺守业，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长伊锦文，乌拉特前旗旗长、阿盟教育局局长恩克巴雅尔，乌拉特前旗副旗长拉麻扎布，乌盟、巴盟文教处副处长宋布尔巴图等。

从上述事实来看，早期的乌盟六旗都无设立学校，三公旗小学成立以后，绝大部分学生是乌拉特前旗的学生，因而从乌拉特三公旗小学毕业的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较早，无论新旧社会从事各项工作者也较多，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祭祀穆纳

彭斯克巴扎尔

那顺敖其尔

撰

叶 喜 译

阴山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这就是“穆纳乌拉”（汉语称乌拉山）。它象一条巨龙横卧在乌拉特草原，龙头昂首于包头昆都伦河西岸，龙尾甩于穆纳哈少（卧羊台）之边，东西长达一百多公里，南北宽约十五公里，面积约为一千三百九十八平方公里，平均高度为海拔二千多米，主峰“石拉敖来”（今称大桦背），为海拔二千三百二十二米。

“穆纳乌拉”山势险峻，峰峦叠嶂；苍松翠柏常年青，山涧流水永不干；林深叶茂，果实累累；绿草成茵，香花吐蕊；流水清彻，宛若白练绕山间；潺潺涧溪奏山歌，珍禽异兽栖山间。“穆纳乌山”真可谓渺渺

仙境，佛地洞天。

在那日煦风暖之时登上“穆纳乌拉”主峰向南俯瞰，黄河闪着银光弯弯曲曲奔向东方；气势磅礴的包钢浓烟滚滚就在眼前。回首远望北麓，乌拉特牧场，羊群象朵朵白云在草原上游动，牛马骆驼象彩色的玛瑙散落其间。

面西而立，河套平原坦荡无垠，渠道纵横，麦浪滚滚，塞外粮仓名不虚传。西北方的乌梁素海碧波鳞鳞，芦苇、蒲草郁郁葱葱，把海面衬托得无比秀丽。极目向东远眺，漫漫薄雾犹如白色轻纱，忽隐忽现罩在大青山上，更加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这秀丽壮观的景色，怎不令游人陶醉，心旷神怡！

民间传说“穆纳乌拉”的由来，有三种之多：一为令人尊敬的佛名；二为值得钦佩的勇士名；三为勤劳朴实的山人名。后人为了纪念颂扬“穆纳”，同时祈祷它给人间消除灾祸，降临吉祥，所以把“穆纳”尊为神供奉起来。于是便把这座大山也称为“穆纳乌

拉”。至于从哪年开始而得名，因无文字记载，没法考证。

过去在乌拉特西公旗的寺庙和民间，保存供奉着大小不等的“穆纳”画像，但今大部已被焚毁。从现在发现的一张画像来看“穆纳”是一位头戴金盔，身披铠甲，英姿勃勃，威风凛凛，满面红光的大将军。他右手高举银枪，左手怀抱宝盆，跨下的铁青烈马，飞驰奔腾，身后的佛光神火，烈焰熊熊。从图中画像推测，“穆纳”既非勇士，也不是山人，而是一位从远古流传下来，被人们神化了的大将军。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将军，便把这座雄伟的宝山称为“穆纳乌拉”、“穆尼乌拉”、“穆纳汗”、“穆纳哈干”，流传至今，以示颂扬。

“穆纳乌拉”森林丛密，除在深处古树参天外，还到处生长着松、柏、杨、柳、桦等乔木；木瓜、青丛、野樱桃等灌木；梨、山楂、酸枣、桑葚等野果；山里生长着木鳖子、黄芪、当归、党参、草乌、珠芽蓼、铁线莲等百余种贵重药材，以及金针、蘑菇、发菜等味美

可口的野菜。过去在深山密林中，曾繁衍生息过虎、豹、鹿、团羊、青羊、扫雪等珍贵野生动物。此外，还蕴藏着丰富的金、铁、云母、芙蓉、矽石、石墨、大理石等稀有矿产。

“穆纳乌拉”不仅风景如画，物产丰富，而且是广大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圣地，所以他们在颂歌里唱道：

须弥山雄伟壮丽，
向前方。

清水泉潺潺长流，
游青鲚。

须弥山高高矗立，
向前方。

山洪水滚滚咆哮，
震山岗。

长青松挺拔耸立，
迎风扬。

百灵鸟歌声悦耳，
保安康。

香柏树枝繁叶茂，
吐芬芳。

金凤凰展翅飞翔，
呈吉祥。

在《蒙古源流》中记载，成吉思汗行兵唐古特
国途中，经过“穆纳乌拉”时，曾降旨曰：

“将亡之国可以寨之，
太平之国可以营之。
饥饿之鹿可以果腹，
老耄之人可以息止。”

可见“穆纳乌拉”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宝山，
无怪乎世世代代居住在“穆纳乌拉”的人们
把她看作幸福的乐园，大家怀着无比虔诚崇敬
的心情，祈祷“穆纳”保佑，世代平靖，万事
如意，消除灾祸，降临吉祥，五畜兴旺，美满
幸福。久而久之便发展到祭祀“穆纳乌拉”的
统一活动。祭祀“穆纳乌拉”的活动可能从古
就有，但自乌拉特部迁居此地后，才逐渐形成
惯例，一直延续到解放。每年阴历五月间，三
个旗的札萨克及衙门官吏、贵族、喇嘛以及庶
民，攀登到“穆纳石拉敖来”参加祭祀仪式，
以期“穆纳”降临幸福。

尽管三个旗的祭祀时间都在五月间，祭祀

仪式基本相同，但是具体日期，祭祀地点则互不一致：西公旗（即乌拉特前旗）把“穆纳”上的“石拉敖来”主峰作为祭祀地，每年五月底五为祭期；中公旗（即乌拉特中旗）也是在“穆纳石拉敖来”东北侧的“苏布日根朝鲁”（意即塔形石）前进行祭祀，每年阴历五月初三为祭期。东公旗（即乌拉特后旗）也是在中公旗祭地东北侧的阿布都日朝鲁（意即柜形石）前进行祭祀，每年五月初七为祭期。

此外，三个旗在每年祭祀“穆纳乌拉”还以苏木或以户为范围进行祭祀，他们选择各种畸形的山峰、山石定为祭地，如大坝峰、巴音温都尔峰、查汗禾日敖来等等，多达百余之处。

西公旗祭祀“穆纳乌拉”还有具体规定：札萨克、协理、总管哪年去参加均可，而三个札楞章盖却每年要轮流率领其四个苏木章盖，带上羊背（整羊）去祭祀。如轮到德格都四个苏木的札楞章盖班时，就率领尤何苏木、巴格苏木、塔布达苏木、都腾苏木的四名苏木章盖去祭祀；轮上独木达四个苏木的札楞章盖班时，就率领尤何阿拉特沁苏木、高勒苏

木、巴格阿拉特沁苏木、鄂吉格沁苏木的四名苏木章盖去祭奠；轮到吉公四个苏木的札楞章盖班时，就率领其乌兰奴德苏木、何日奴德苏木、哈日奴德苏木、焦沁苏木的四名苏木章盖去祭祀。梅力更庙的梅力更活佛不仅每年必到，而且还带领其属下的大小喇嘛去念经，举行祭祀。

当五月端五这天，西公旗的官吏、贵族、喇嘛、庶民百姓各自携带祭品，纷纷攀登“穆纳石拉敖来”，在祭地前聚会，举行祭祀仪式。在祭祀开始前，先把主峰旁的那棵枝繁叶茂，主杆挺拔的大松树，用各色绸缎、哈达装饰得色彩斑斓，耀人眼目，十分壮观。在祭台正面供奉着“穆纳”的彩色画像，画像两侧竖立着枪、叉、刀、戟等兵器，祭台前摆上各种荤素祭品和香炉。一刹时香烟袅袅幽香四散，祭地上铺着毡毯，放上四方小桌，让参加祭祀的大小喇嘛依其学位高低顺序相对而坐诵经祈祷。据说念的经文，有的是由三世梅力更葛根劳布僧丹必扎拉生用蒙文撰作，后由阿勒锡热庙（西公旗二十四庙之一）一世活佛忽勒钦贵

译为藏文。其名目为“幸运经”、“颂扬穆纳”、“祈求穆纳”、“招唤穆纳”、“驱邪经”等。祭祀时，是先官吏、贵族然后庶民百姓烧香、磕头、酌酒。在祭祀中他们默默祷告念念有词，其意无非是感谢山神逢凶化吉，普降吉祥；祈祷“穆纳”保佑，人畜兴旺，万事如意等等。由于来参加祭祀的人们先后不一，所以祭祀活动从日出到日落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西公旗对祭祀“穆纳乌拉”极其虔诚讲究，凡参加祭祀者必须骑骏马，忌讳骑驴、骡。

由于“穆纳乌拉”林木资源丰富，所以西公旗把“穆纳乌拉”分为东西前山，东西后山四部，由旗衙门选择精明强干之人，担任护林工作，其责任心强，任职年限较长，否则随时撤换。各护林人员定时巡山，发现偷伐林木者，除没收其木料外，还要惩罚。“穆纳乌拉”内居住的牧民需要木料时，要经护林员批准，按需要采伐，但不准滥伐倒卖；官吏、贵族用料时，也得在衙门领取许可证书，下达公

文，方可采伐。

日寇入侵绥西以后，毁坏了东山不少林木，加之有些地方的人们进山偷砍林木的现象较为严重，护林人员无法制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旗衙门只得派兵护林，保护这座秀丽的宝山。

巍巍矗立在乌拉特草原上的“穆纳乌拉”，在饿殍遍野灾难深重的旧社会，她那肥美的野生动物，香甜的野果，曾拯救过无数濒临死亡的人们；在兵慌马乱，土匪横行的年代里，她那茂密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沟壑，是人们逃难避灾的良好场所。“穆纳乌拉”几千年来哺育了人们成长壮大，“穆纳乌拉”将被人们世世代代赞颂、歌唱。



穆纳画像

新安小学校史

陈建盛

新安镇（原扒子补隆）小学，从清末光绪年间教会建立的私塾开始，因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而时办时停，然终于冲破障碍，克服困难，经过“育英小学”时期，“公立私立”学校阶段，而发展演变成为今日的小学校。

这所小学，在河套地区建校最早，至今已有八十年之久的历史，培育出相当多的学生，有一部分学生经过到各地深造，成为有用之材，甚至成为革命先驱者，所以这所学校堪称塞外一所历史悠久，成效较好的学校。

追溯既往对展望未来，有所裨益。为此，愿就自己的耳闻和经历，把新安镇小学史叙述如下。

(一)

大约在一九〇五年前后（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会势力渗入人烟稀少的执子补隆。由牧师费安河（原名叫费尔林顿）在该地修建教堂，成立了协同会，宣传耶稣基督教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教会借杀死其传教士为由，向满清政府办教案，索得四百二十五顷赔款地。民国十二年，又向达拉特旗租得四百顷永租地（准退不准收的意思）。费安河为了增加产量，开发财源，便招雇民工，兴挖了长五十余里的一道“洋人渠”（后改名民复渠），他除雇工自耕一百多顷地外，其余土地全部出租，索以租金，每顷白银六至二十两。由于在“洋人渠”域种地，不出其它杂役，因而来这里种地者与日俱增，儿童人数也相应增加。

一九〇五年，费安河进行文化渗透，决定让儿童识字，从小培养信仰基督的心灵，于是

请萨县二王先生教学，以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为主，兼学《圣经》中的警句（学警句也为识字）。

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当地蒙民追随外蒙革命起义，地方上曾一度不靖，致使学校暂停。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教会学校继续开办，分蒙汉三所学校教学。

一、蒙古学校。

该校初为二王先生负责教学，一九二〇年由蒙藏学院毕业的韩文元负责教学。学校为私塾形式，教材是古书（旧书），一九二〇年后，学当时国家编译的《蒙文合璧课本》。同年学制改为三、三制。学生最多时达到四十余名，最少时也有二十余名。该校系男女同学同班授课。校舍有办公室一间，教室三间（晚间兼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一间。校舍建筑设备均在堡子（即现新安乡政府所在院）内的前边西院。

二、汉校。

该校分男校和女校。男女校都称“育英小学校”。校长初为美籍牧师费安河，至一九二二年秋教会又由牧师安××接任校长。男

校由程自铨先生负责。由程自铨及毛安乐等四人任教。女校由毛安乐和王洲馨负责并任教。男校学生有八九十名，女校学生有二十余名。学制按当时国家规定，实行六年三、三制。课本为国文、算术等。男校是完全小学，女校只有初小。男校校舍有教员办公室一间，教室高小三间，初小三间，宿舍两间，储藏室两间。女校校舍有教室、宿舍共四间。男女校舍均在堡子内的后院、西院和西厅内。

学校经费包括办公费，教员工资以及男女生膳宿费、纸张文具费均由教会负责供给。男女生绝大部分都住校，学生除学课本外，每晚和礼拜日，必须到礼拜堂守礼拜、听牧师、长老讲道，接受基督教义。由于学校完全是公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贫苦农牧民子女。教会规定学生念书必须信教受礼，这是教会学校的一大特点。

男校高小班到一九一九年时已毕业两班，其中部分学生如曹继贤、侯升阁、王时英等人是被保送到归绥（今呼市）张家口等地深造的老校友。

一九二〇年，费安河牧师病故，程自铨老师辞职，汉校高小班停办，学校由毛安乐负责，教员有王可权等二人，学生约五十余名，校舍、学制、经费均仍照旧。

一九二二年秋，请山西右玉县赵国治任教，汉男校高小班才得以复课。初小教师仍由王可权等三人任教。此时学生又增加到八十余名。

一九二五年秋，赵国治离职，学生人数减至三四十名。在赵国治任教后，女校由萨拉齐教会请来的女教师米利暗（学名不清）前来任教。

一九二六年冬，冯玉祥部队过境西去后，土匪遍地骚扰，地方治安动乱不安，学校停办。

一九二七年秋，地方治安恢复平静，教会决定继续办学。男校由曹继贤负责，女校由张兰秀负责。男校学生四十余名，女校学生二十余名，校舍仍在教堂院内。此时经费除教师工资及办公费仍由教会负责外，学生膳食、书籍、文具等费用均系自费。一九二九年，北方各地普遍闹荒灾，各地灾民纷纷逃往河套，致使当

地也成灾区，地方秩序大乱，学校又停办。

(二)

一九三一年秋，安北设治局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决定在三区所在地扒子补隆建立学校，经与教会商妥，在堡子内后院东侧修建了学校一所。计教务室一间，教室三间，厨房一间，宿舍一室两间。校名为安北第二小学校（简称二校）。校长教员仅有王文杰一人，学生三十余名，只设初小，复式教学。学制实行四、二制，经费每月三十元。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底，因教会仅有的土地被放垦，收入枯竭，学校经费来源断绝，致使学校停办。一九三二年春，教会又继续办学，校名为私立安北蒙汉小学校，校长曹继贤，教员王可权。蒙汉学生共四十余名（无住校生）。只有初小班，进行复式教学。校舍有教室两间，宿舍一间，均在堡子内西院。

一九三三年春，王文杰辞职，安北第二小学由曹继贤接办，公私两校合并。学生人数

增至八十名，有蒙汉初级四个班，复式教学。经费由当时政府供给，从此学校完全公立。

(三)

一九三四年秋，曹继贤调大余太第一小学后，遗缺由赵国治接任，学生有七十多人，设初小四个年级，复式教学。蒙校这时停办。第二小学教员有刘光德和侯升阁。校址由教堂院内迁至城东北角（即原新安学校旧址），有教室两间，教员办公室一间，伙房一间。

一九三六年春，赵国治调到第一小学。二小校长由张德敏接任，教员有刘光汉。设初级两个班，复式教学，学生人数减少到五十余名，其主要的原因是当年垦区在西九号南边的新村成立一所垦区小学，凡就读垦校的学生，其食宿、书籍、文具均为公费，故有一部分贫民子弟因生活困难而转入垦校。

一九三六年，初小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到大余太第一小学高小班学习。在高小毕业后，

学生因其家庭经济状况不同，有的就此失学，有的考入归绥（即今呼市）中学或包头中学（因河套地区没一所中学）继续深造。

一九三七年秋后，归包相继沦陷，国民党的部队撤至河套一带。其时人心惶恐，纷纷逃离家乡，成批难民逃入该地，因此秩序大乱，学校停办。同年十月，安北设治局所在地大余太被日寇侵占，安北设治局所属机构迁驻扒子补隆。冬季绥西局势逐渐好转，地方秩序安定，设治局各机构职能恢复，开始整顿地方教育，学校复课。此时校长是赵国治，教育主任曹继贤，教员有刘光汉等三人，学生人数达八十余名。设高小一个班，初小三个班（其中三四年级复式教学），学制实行四、二制，读当时的国定课本。初小有国文、算术、常识，高小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公民。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间，安北战时动员委员会驻于北海生。其成员马子成、李石英、王健（马子成之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她）们三人除经常给学生讲全民抗战等

道理外，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并定时发动学生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他们在学校活动时间虽然很短，但对学生的影响却很大。由于他们给学生贯输抗日爱国思想，学生的学习情绪很高，思想也很活跃，学校的抗日气氛也很浓厚。

一九三九年冬，经当时的教育厅长阎伟主持决定在陕坝成立国立绥远中学，于是来校补习投考中学的学生增加了三十多名。至此学生人数达到一百一十余名。当年报考国立绥中的学生计三十多名，均被录取。如现兰州大学教授白桐，兰州铁道学院工程师白恭，南京市市委组织部部长左占魁以及解放初任开封市团委书记的张士德等人均是本校这届毕业的学生。

一九四〇年春放寒假后，日寇利用黄河和乌梁素海封冻时间，疯狂侵入河套，安北、五原等地相继沦陷，学校停办。后来傅作义部利用黄河、乌梁素海解冻时节的有利时机，巧作安排，设计袭敌，一举取得五原战役的辉煌胜利。从此，日寇被迫退出河套，地方秩序逐步恢复稳定，约在当年五月间学校继续开学。当

时赵国治离校西去，学校由刘光汉临时负责。一九四〇年暑假秦毅斋为校长。一九四二年暑假到一九四三年底由魏建德任校长，一九四四年贾恭为校长，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潘毅生任校长。一九四〇年暑假后学校已建成四、二制六个班的完全小学。教员有七人，学生已达二百余人。抗战胜利时，学校班级已发展到八个班，教员增到九名，学生达到三百余名，其中住校生有四十余名。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止，每年均有一个高小班约三十至四十名学生毕业，其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约10—15名）考入国立绥中或陕坝师范深造。

（四）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校长是韩风礼。一九四六年暑假到一九四七年暑假校长是李炳武。一九四七年暑假到解放时校长是赵新民。从抗战胜利到解放为止，发展到十一个班学生达到百余名，其中住校生有三十余名。教职员增加到十多名，校工两名。

(五)

在抗战期间，每年随着班级的增多，校舍相应的也略有增加，但都很简陋，到胜利时，大部分已破烂不堪。抗战胜利后，在韩风礼任校长期间，增建教室四间，办公室一间。全校已有教室八间，办公室一间，教员宿舍一间。一九四八年，赵新民任校长期间，又扩建教室四间、教员宿舍一间、学生宿舍八间。同年，在教育科科长陈建盛的重视下，把大余太敌伪遗留下的木料给学校拨了一部分，除添置教员办公桌椅外，其余全做成学生凳，从此学生结束了坐泥凳的历史。

(六)

抗战胜利后，学校的发展比较快，特别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中更为显著。不但学校规模扩大，学生人数增多，教学质量提高，而且学校组织也日趋健全完善。学校领导除校长外，还设教导主任，训育主任（专管学生纪律）、事务员，各司其职。学校建立

了一整套有关教员职责以及体育、纪律考勤等制度，因而，学生守纪律、讲礼貌，校风较好。学校重视学生身心健康，聘请国术教师，传授拳术，还增添了兰球架、滑梯等体育设施，以供学生锻炼身体。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时止，每年都有一个高小班毕业，人数约四十到五十名。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在毕业的学生中，每年约有十五名至二十名，考入国立绥中、陕坝师范或包头中学深造。一九四九年毕业的五十名学生，全被当年新成立的县立河套中学所录取。

新安镇小学（扒子补隆更名新安镇时，学校也改名新安镇小学），是安北县的重点学校，师资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有许多教员是大学生，因而教学质量较高。解放前三年，学校还招收了一批历届初小毕业生和怕国民党抓兵的超令失学青年入校学习。解放初期，这批学生绝大部分被人民政府吸收参加了工作。因此，学校也为新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有相当文化水平和出色工作能力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解

放初期参加工作的学生约有一百五十人，其中参军的有三十余名。到现在担任科局级或营级以上的干部约有三十余名，其中县团级以上的有七、八名。从事高级领导工作的有内蒙古自治区付主席赵志宏同志、某部师长赵××同志、某军区司令员齐至圣同志、巴盟政法委员会付书记奇国栋同志、内蒙古党委办公厅付秘书长万继生同志、内蒙外事办付主任傅占元同志、内蒙党委组织部付部长田建英同志、磴口县委书记刘玉亭同志、国家地震局工程师安得惠同志（女）。

解放前历届新安小学校长花名表（一）

任职年月	姓名	备注
1905年	费安河 (亦叫费尔林敦)	1、蒙校负责人；二王先生。2、汉男校负责人；程自铨。3、汉女校负责人；王洲馨。 1905年以私塾形式授课，1914年改为育英小学，分蒙、汉校；汉校又分为汉男校与汉女校。
1922年秋	安牧师 (有人称安德生)	
1926年冬		冯玉祥部过境地方不靖停学。
1927年秋	普博爱	男校负责人；普博爱女，校负责人；张兰秀，普博爱主持复学。
1931年秋	王文杰	教会与安北设治局商妥成立安北第二小学校。
1932年春	曹继贤	教会又办学，校名叫私立蒙汉小学校，安北第二小学校仍存。
1933年春	曹继贤	安北第二小学校王文杰辞职，公私两校合并。

解放前历届新安小学校长花名表（二）

任职年月	姓名	备注
1934年秋	赵国治	蒙校停办，校名仍是安北第二小学校，校址迁于城东北角。
1936年春	张德敏	垦区小学成立。
1937年秋		学校停办，同年十月安北设治局迁至扒子补隆。
1938年秋	赵国治	
1939年	赵国治	学校改为新安镇小学校。学制四、二制。
1940年春		日寇侵占五原，学校停办。
1940年5月	刘光汉	刘光汉负责。
1940年夏	秦毅斋	学校已建成为四二制的完全小学校。
1942年夏	魏建德	
1944年	贾恭	
1945年上半年	潘毅生	
1945年下半年	韩风礼	
1946年夏	李炳武	
1947年夏至 1949年解放	赵新民	学校除设校长外，还设教导主任、训育主任、事务员。

关于“谎粮堆”的考查

乔秉理

在乌拉特前旗境内，东起三顶帐房村，西至公庙子村，沿包兰铁路线南侧有许多奇异的土堆群，人们看了不禁要问，这是怎样形成的呢？现将我考查的过程和结果简叙如下。

访当地老年人，他们根据传说，对这些土堆群称之为“谎粮堆”，为甚叫做“谎粮堆”呢？相传远在宋朝期间，朝廷曾派重兵镇守过这一军事要地。这一地段因为北有高耸的乌拉山做为天然屏障，南有黄河南北阻隔，形成了军事上易守难攻的咽喉要道。当时朝廷怕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向南进攻，所以派重兵把守了这一关口。据说有一时期在此驻守的宋兵断了给养，敌方将领获此机密后惊喜万分，认为良机已到，如乘机发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夺取胜利。此时宋军将领也最害怕对方来这一招，正在忧虑之际，突然得悉要遭到进攻，于是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在这危急关头，军中有

一参谋献计说：此时此刻只要镇静，便可设法取胜。我们应当临危不乱，泰然处之，一面立即扬言已有大批援粮运到阵地，一面要在暗中迅速建造许多假粮堆（即谎粮堆），以欺骗对方，打消敌方乘机进攻的念头。宋军即刻依计而行，强迫民众和兵士积土成堆，用席箔笆子苫盖。敌方以为真有不少粮食堆积在阵地，于是取消了进攻的计划。此次建造起来的“谎粮堆”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历史遗迹。

上述“谎粮堆”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从来也没有人加以考证，可能是因为考证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许多人听了之后只是当作谈资笑料而已。我在六十年代初期首次听到这种传说后，好奇地向讲故事的老人提了几个问题：“谎粮堆”体积这样大，数量这么多，分布在东西六十多公里的地段，又是强迫民众挖土堆建，在古代那种条件下，能够在几个黑夜之内迅速完工吗？同时敌对双方以乌拉山为界距离很近，大兴“谎粮堆”建设，且有大批民众参加，能绝对保密吗？另外宋军既然处于绝粮的境地，估计附近老百姓

的粮食也不会有余，在没粮吃的情况下，有气力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吗？我问的这些问题，讲故事的老人以及周围的人都不愿答复，而且不耐烦地说：那谁能知道呢！多年来我们只听这样传说着，从未有人问过究竟是如何来的。从此虽得知了这些土堆群的名称叫做“谎粮堆”，但对其形成的真正原因，始终在我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六十年代初，乌拉特前旗属于包头管辖，我当时在前旗商业系统工作，到包头办事的机会甚多，每当乘火车在前旗至包头这段路程往返时，不由得总想看看铁路南侧这些“谎粮堆”，同时就忆起那种有趣近乎神活的传说。每当在我下乡到达这一带时，也总是再想和一些老者们进一步探讨一下“谎粮堆”是如何形成的。后来又听到两种别的说法。有位有学识的农村会计说：你要探讨的土堆群，那都是些古代阵亡军人的坟墓，土堆有大有小，是根据军衔级别而定的。他又说：远在宋朝时期与北方的少数民族为敌，在这一军事要

地驻扎着大批军队，不仅在这里就连西山咀卧羊台北至大余太村，宋朝的兵都扎过老营。今三顶帐房村，是由当年宋军将领驻扎的三个帐房而得名；西边的城壕、堡子湾等村庄是宋代一个大兵营所在地。城壕村的南边有一长方形的旧城址，以往的房屋都不存在了，但旧的城址还看得清清楚楚。在堡子湾还可看到当年城堡的大厚墙壁。现在这些村庄的名称都是从那时流传下来的，至于说大余太村余太君曾经住过，园柱形的拴“马桩子”山，余太君曾在此拴过马，有关这些传说肯定是臆造的，但是当年宋朝在这一带有过大批驻军这是事实。我听了这位会计的传说，同时联想到五十年代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曾经发表过《通过在大余太的发掘揭开了宋代历史的宝库》一文，从而说明这位会计的说词是有些历史根据的。

乌拉山前这一咽喉要道和大余太重镇，不仅在古代是军家争夺之地，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管辖绥西河套，日寇侵占包头和大余太，也是以这两地作为分界线的。由此看来

在古代两军争夺之地段，其伤亡不会少的，阵亡将士掩埋在这一地带的坟墓形成土堆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马革裹尸的说法，那毕竟是少数高级将领。可是既然是古墓群，为什么连一块墓碑都看不见？在此之前谁也没挖掘它，看究竟是否坟墓，因而还不能确切的证实这一说法。

后来又听到一种不同的说法，有一位在此地住过多年的老农、植树造林的模范说：这些土堆群既不是“谎粮堆”也不是古坟墓，它是由某些植物固定下的沙土丘。因为在沿黄河一带过去有不少的大沙丘，这些明沙随风移动，遇上哈莫儿（和枸杞相似的植物又称骆驼刺）、蒺藜（红柳）等这些植物时，便受到障碍形成大小不等的许多沙土丘，这就是土堆群形成的原因。这位老农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广阔的草原上确有上述原因形成的沙土丘，但是在未证实之前，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断而已。

综上所述究竟那一种说法才是这些土堆真正形成的原因呢？这必需要有事实作为根

据,才能准确的说明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变化,在过去认识不了的事物而今天却被事实所证实,关于“谎粮堆”的秘密,也是被这样揭开的。

一九六六年国家决定在公庙子村的东边兴建一个军用飞机场,破土动工后,要修筑很长的跑道,其间所遇到的障碍物都得铲平,其中就有所谓的“谎粮堆”也被铲平。在施工中揭示了这些土堆群的秘密,发现内有棺材以及用泥土烧制而成的锅、灶、马、牛、猪、羊等陪葬品。与此同时在西山咀的卧羊台上,引水上山修筑垅道,在土堆群中的一个土堆上挖土时,发现下面也是个古墓,挖出一口很大的棺材,还有陪葬的两个衣柜。棺材和衣柜是用乌拉山油松板制成,里面不存死骨,棺材的小头和衣柜的一角已被砍开窃走了全部财物。衣柜用紫油漆刷过,上面还有许多花纹图案。砌葬所用的砖都是毛口袋纹正方砖。后来一九七五年堡子湾村的北面,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一部分“谎粮堆”也摊平了,经观察也确实是古墓。墓内还挖出一个大铜罗锅,还有一些

残缺不全的兵器。经自治区考古工作者鉴定，他们说这些都是宋代的遗物。

事实胜于雄辩，过去的“谎粮堆”只不过是一种有趣的传说臆造而已。古坟墓的说法通过事实证明是有一定根据的。

包头、绥西、五原抗战亲历记

李敏才

(一)

日寇侵华，蓄谋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统治集团，就制订了所谓吞并世界的“大陆政策”。其步骤是：第一征服中国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最后征服全世界，这是日本明治政府精心炮制野心勃勃的扩张侵略政策。日寇当权人物，对侵华战略却有严重分歧，少壮激进派，主张速战速决，鲸吞我国；元老重臣派，则主张利用我国军阀混战，党派矛盾的机会，采用蚕食办法，以逐步达到侵占全中国之目的。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人少壮派当权后，立即采取了“鲸吞策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芦沟桥事件，接着，调兵遣将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真可谓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芦沟桥事件发生后，立即激起我全国军民无比愤怒，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此，抗日初期形成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

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绥远两省，划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朱德、卫立煌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平绥铁路沿线的部队对日作战。当时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只有二一一旅和二一八旅六个团的兵力。傅作义在其受命之后，立即率部开赴绥东前线，令孙兰峰的二一一旅攻击孔家庄日军，令董其武的二一八旅攻击商都日军，董部曾一度攻克商都、南壕堽等地。后因日军向山西猛烈进攻，阎锡山电令傅作义放弃绥远，亲率三十五军迅速

援晋，并任其为平型关战役总指挥。此后傅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忻口、太原等战役。

一九三八年冬季，日军攻陷武汉后，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敌叛国，蒋介石为了鼓励士气安定军心，亲到陕西三原召开北方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当时傅作义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在第二战区受阎锡山的歧视排挤，在会上向蒋表示愿脱离二战区，仍回绥远抗日，蒋表示同意，令傅作义率三十五军开赴绥西河套地区，归属第八战区建制，并升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原在河套地区的所有部队统归傅作义指挥，于一九三九年的春季傅长官率三十五军及二战区的炮兵第二十五团，从晋西北的河曲、神池、保德、偏关等地挥师入套。

到河套后，三十五军立即进行整编，将原来的两个旅，扩编为三个师。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下辖三〇一团，团长王建业；三〇二团，团长郭景云；三〇三团，团长王赞臣。新编第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下辖九十一团，团长刘景新；九十二团，团长王雷

震；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下辖九十四团，团长杨新钊；九十五团，团长张世珍；九十六团，团长黄纯烈。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三十五军发动绥南战役后，回师山西河曲、保德、偏关等县，整训补充，同年冬季，傅作义在河曲县成立了第二战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随营第二分校（总校长阎锡山，二分校校长傅作义），建校宗旨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我本人当时在三十五军四百二十团当庶务上士，考入该校随三十五军来到河套。一九三九年秋季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编第三十二师九十四团九连任准尉见习官，参加了包头战役。战后升任本连少尉排长，接着又参加了绥西、五原两个战役，兹将参加这三个战役的亲身经历概述如下。

（二）

一九三九年冬季，日寇猖狂进攻我华南各省，傅作义为了配合华南作战，准备袭击包头

日军，以牵制敌军南下，当时我新编第三十二师驻防于五原县新公中一带进行整训。旋奉军长傅作义命令，我师立即开赴安北县大有公、庞三圪堵、四柜（归树林子乡所辖）、国虎圪旦（归长胜乡所辖）等地，并在驻地附近对包头方向构筑防御工事。另外派出百分之三十兵力，打上乌梁素海和乌加河坚冰，从北向南垛成高一米七，宽一米左右的冰墙，长约二十余里。此举表面看来是防御包头日军进攻，实则是迷惑麻痹敌人，以使其判断发生错觉，为奇袭包头获胜创造条件。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傅作义由五原乘汽车来大有公村给我全师官兵讲话，其内容大意是针对当时官兵有惧怕日军坦克、汽车的思想，讲述了如何利用集束手榴弹、炸药包、汽油瓶等炸毁坦克和汽车的方法，还讲了军人既要爱国又要爱民的道理，随后又召集排以上军官讲话说：“防御应当采取主动，以积极进攻代替消极防御，不应当守着一个地方等着挨打。”他主张：“打敌必胜，防敌无成；又快又狠，胜于顾虑周详，要抢占好

地形打敌，把坏地形让给敌人挨打。”最后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奇袭包头任务。在会议上傅作义令我师：“沿乌拉山脉夜行昼伏向包头挺进，行军途中，绝对保守秘密，进村休息后要严密封锁，不准任何人出村，到部队出发后才准许村人行动。”另外，把我新编第三十二师番号改为“欣然支队”（因为师长袁庆荣号欣然，故此得名），以迷惑敌人。

傅作义来我师讲话是乘坐的大汽车，散会后仍乘原车返五原，为了保密和迷惑敌人，行至途中改乘军马，随军向包头前进，汽车则继续向五原驰去。

当我师抵达包头附近麻池村时，突然接到傅作义命令我师以急行军速度赶至昆都仑，攻击前口子村日伪军。拂晓前，当我团到达前口子村外时，一〇一师早已把该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狼狈向包头逃窜。这次战斗中，一〇一师活捉了日伪军团长李根车等人，我团奉命在前口子附近休息待命。

为了截击从余太增援包头的日军，我团

派第一营营长鲁乐山率全营到后口子村伏击。翌日拂晓前，鲁营长恐怕哨兵睡觉，独自一人出村查哨，突然发现从余太增援包头日伪军百余人急速过来。因当时天还未亮，部队正在休息，鲁营长迅速回到村内时，敌人也进了村，鲁营长当即和少数哨兵、卫兵突然向敌军开枪射击。日伪军毫无准备，被我军打得四散逃窜，这次战斗击毙大余太日本驻军大佐小林一男及士兵数人。由于没有全部消灭日伪军，战斗结束后，傅作义来我团严厉批评了鲁乐山营长，说他戒备不严，麻痹大意，不该使进入网中之鱼，令其跑掉。

傍晚，孙兰峰师长被日军包围在黄草洼山上，傅作义命令我团即刻前往增援解围。夜十二时左右，我团赶到该地，立即协同孙兰峰师向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敌不支向包头城内逃去，这次战斗焚毁敌人汽车七辆。

与此同时，新编第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已攻入包头城内，团长安春山带领全团官兵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争夺巷战。但由于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破坏萨县附近铁路不彻底，只

拆除了几根道轨，就认为完成了破坏铁路任务，因此未能阻止从山西、张家口等地来增援包头的日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傅作义始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向河套方向转进。

新编第三十一师从包头撤出战斗时，守卫在娘娘庙的一个副班长和两位战士，由于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继续坚守阵地，次日虽被日军包围，但仍孤军奋战，打死日兵数人，最后日军逼迫老百姓去告知该副班长说：“傅作义部队已全部撤回河套了，你们要是投降保证不杀，若不投降就要用炮把娘娘庙炸平。”这三位战士英勇顽强拒不投降，表示一定要打到底。最后日军果真用炮兵和步兵联合进攻娘娘庙，这三位孤军奋战的英雄，全部壮烈牺牲。由于不知名姓，傅作义在给官兵讲述此事时，称为娘娘庙中的三位“无名英雄”。还将他们的英雄事迹编印成书，发给各部队学习。

部队撤至河套后，傅作义来我师给官兵讲话说：“我们这次进攻包头是胜利而不是失败。因为我们发动包头战役的目的，是牵

制敌人南下，而不是为了长期占领包头。由于我军对包头的进攻，致使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日军不敢南下，这样我们就有力地配合了华南战役，所以说是胜利不是失败。”

我团由包头撤回河套后，奉命在西山咀卧羊台一带（即现在砖瓦厂所在地）沿山构筑作战工事，阻止日军沿包、五公路向河套侵犯。当时西山咀卧羊台附近，没有一户人家，我们全团官兵全都住在自己亲手挖的山洞里。由于没有门窗，洞口只得用干草堵塞，以御风寒。时值腊月，地冻天寒，风雪交加，尽管全体官兵衣着单薄，然为了抗击日寇，人人吃苦耐劳奋不顾身，以十天的时间不分昼夜地连续突击构成了防御工事。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团阵地交由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接防，我团则调至四柜、庞三圪堵、国虎圪旦一带整训。

我团从包头转移时，因在日军飞机、坦克的狂轰滥炸下，秩序混乱，以致部队失去控制，重机枪连，丢失了重机枪两挺。事后傅作义为了严肃军纪，将该连连长李××逮捕，交军法

处处置。

(三)

驻包头日军司令官小岛，为了对我军袭击包头进行报复，于是派飞机轰炸第八战区傅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五原县城。当时我连驻安北县庞三圪堵整训备战。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都能看到由包头飞来敌机数架，去轰炸五原。飞机过去数分钟后，五原方向烟柱腾空而起，接着听见轰隆隆爆炸声。听人说有一次炸弹落到傅作义住的院内，由于他的卫士机智灵活迅速将傅推倒在地，才避免了被空袭之危险，但傅作义的随从副官侯××就在这次轰炸中牺牲了。这样连续轰炸直到日军占领五原以后才停止。

日寇为了打通大西北走廊，占据河套产粮区筹集粮饷，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就开始调兵遣将作进攻准备。从晋、察、绥等地抽调日、蒙、伪军和驻地警备队等共拼凑步、骑、炮兵三万六千余人，在一千二百多辆汽车配合下，由日军黑田师团长指挥，于当年腊月下旬兵分三路，向我河套地区大举进攻，其第一路由后

山向乌不浪口、乌镇攻击；第二路由前山沿五、包公路向西山咀攻击；第三路沿黄河西岸向马七渡口攻击，三路兵马均在五原合击。

傅作义侦知敌人企图后，立即在五原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对策，部署各部队防御河套的作战任务。会议决定：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防守马七渡口和西山咀地区；宁夏马鸿逵部马腾蛟师，防守乌镇和乌不浪口地区；三十五军为战区机动部队，随时和敌人主力部队机动作战。同时还规定各部队的政工人员都换穿便衣，留在原驻地附近，组织老乡做好空室清野，侦察敌情、安定民心、协助我军破坏敌人的后方设施等工作。

傅作义对绥西战役总的战略是：“避不利，找胜利；积小胜为大胜；不叫敌人好来，更不叫敌人好走；既要处处设防阻击敌人，又要机动灵活避免死守硬拼。”同时还规定：所有参战部队，不论在任何艰险情势下，都不能借口“机动”脱离战区地域，只能在战区范围内，依托山脉与敌周旋，以期捕捉机会，歼灭日军主力。

绥西战役开始前，我连住在庞三圪堵。阴

历腊月二十三日这天早晨，一架敌机突然飞临我连驻地上空，侦察盘旋，由于日军知道我军没有高射武器，敌机飞得很低，我们还能清楚地看见飞机上的日本国徽。这时我迅速到屋内取出轻机枪，向敌机打了一梭子，敌机立即向东飞去。连长李玉璋过来，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给敌人暴露了目标。就在这天的傍晚，日军即开始向我西山咀守军攻击。我们听到炮声后，上房观看，只见西山咀方向，烟尘四起。入夜炮声更趋激烈，直到夜十一时才平静。这时我们在房上看到敌人的汽车灯象一条火龙似地沿着包、五公路，向五原方向驶去。

我师为了阻击向五原方向进犯之敌，以两个团的兵力埋伏在五原四牛头圪堵沙丘内，在二十四日清晨与敌展开激战。日军飞机数架轮番轰炸，坦克和炮兵掩护其步兵冲锋，由于战场系沙漠地带，坦克行动迟缓，不能发挥其威力。日军虽反复进攻数次，均被我师击退，最后日军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我师伤亡甚重，但阵地屹然不动。直到夜间我师才奉命向西转移。

翌日我团在四柜圪旦与从乌不浪口进犯五原之敌遭遇，当即给予迎头痛击。在战斗中我连连长李玉璋看到日军汽车十余辆满载日兵，企图抢占我团阵地左侧一个有围墙的大场面。如果敌人抢占了此场面，依托围墙从左侧袭击我团，我们将处于危险之境地，因此连长当机立断，命令我带领全排火速抢占该场面。我排受命后立即以最快速度，抢占了场面，这时汽车上的百余名日兵也下车从三面向我排展开进攻。但因我排有土围墙作依托，而敌人却处于平坦开阔地之上，毫无掩护，战斗数小时敌人始终不能接近我阵地一寸。当时因我排阵地突出团阵地前约一千五百米左右，而且又是三面受敌，特别是经过数小时战斗后，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又毫无撤退的迹象，其情况异常危险。但全排战士却毫无惧色，非常沉着。为了节省弹药我命各班，步枪在敌人进至距我二百米时才准射击，轻机枪须距四百米时才准射击。最后敌人六十余人冲至距我阵地前一百米处凹地内，我集中全排火力形成火网封锁敌人，致使这六十多个敌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

在凹地内隐伏两个多小时。直到傍晚敌人施放烟幕弹，乘机逃跑。事后我们去凹地察看，到处是斑斑血迹，敌人伤亡惨重。这次战斗我排牺牲副班长一名，战士三名。

入夜后接到连长命令，全排即刻到连部集合，准备夜十二时袭击敌人汽车，当我全排到连部后，又接到团长让我连立即随部队沿山向西转移的命令，于是部队向西转进。

阴历正月初一，我团转移至陕坝西面铁匠圪旦，连长命令休息待命。因为当天是春节，连长叫司务长筹集猪肉五十斤和白面八十斤，分配给各班吃饺子。正在我们高高兴兴地包饺子时，突然一个老乡慌慌张张跑来给连长报告说：“村东二三里地方，一炮黄尘（意即尘土飞扬），你们赶快去看看”。这时连长立即命令全连携带武器集合，到村东一个大土山上占领阵地。我们刚上了土山，敌人日蒙骑兵百余人，还有十几峰骆驼，满载从老乡那里抢夺来的东西，已到了土山下面不远的地方，看样子敌人准备进村过春节。连长一声喊“打！”全连立即开枪射击。敌人因毫无准备，在突击之下乱作

一团，抱头鼠窜，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战斗。斯役打死十一名日蒙军，并缴获步骑枪八支，日式手枪一支、望远镜一架、子弹七百余发，乘马九匹、骆驼三峰。战士们高兴地说：“咱们这个春节过得好，小日本给咱们送的礼物真不少！”

敌人侵占后套，到临河以西一带时，发现其后方及侧翼均有我三十五军及游击部队不时袭扰，于是不敢再继续西进，立即命令全部日蒙伪军退回五原，以防我军把他们分隔吃掉。这时三十五军也尾随敌人返回五原附近，积极备战，准备反攻五原。

(四)

绥西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为了总结绥西战役经验教训和部署反攻五原作战任务，在临河县东南亚马来召开团以上军事会议。会上首先对绥西战役进行了总结，认为绥西战役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在日寇西犯途中，我军有力地阻击了敌人，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但我军损失也不小，其原因是有的部队对傅作义战前提出的“避不利，找胜利”；“积小

胜，为大胜”；“不要死打硬拚，要机动灵活”等正确策略没有真正领会并认真执行，而习惯于传统的阵地战，一旦和日军接触，就是死打硬拚，再加在兵员和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因此伤亡惨重。

这次会议上，有的团长提出：“在绥西战役中有的部队长官，擅自脱离部队，离开战区，有的消极避战，如马鸿逵的马腾蛟师擅自退到宁夏；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擅自退到伊盟桃力民，对此若不绳之以法，不但今后作战不会取得任何胜利，而且军纪更松弛，战力更差，战斗一定会失败”。傅作义为了整饬军纪，在会上当场将作战不力的游击军司令马秉仁和擅自离开部队的九十一团团长刘景新逮捕法办。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因贻误军机也给予撤职留任带罪立功的处分。至于门炳岳和马腾蛟因系友军，则未给任何处分。

会议上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反攻五原有必胜的把握，当即决定攻击五原，其战术是采取“掏心战”。该战术之核心是组织强有力的部队，突然袭击日军首脑指挥机关，摧毁敌人的

神经中枢，使敌军处于瘫痪状态，尔后各个击破大获全胜。傅作义在会上特令英勇善战的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为“掏心突击队”司令，曹子谦为副司令。并另从各部队抽调既熟悉五原城内情况而又勇敢善战的官兵一部，配属安春山团参加“掏心战”。

反攻五原的时间，选定于三月二十日。因为根据河套历年经验，此时正是各河、渠解冻之际，为使日军坦克、汽车和重炮等不能发挥其威力，随即命令地方行政人员，动员群众在三月二十日前尽量从黄河向各渠道放水，给日军造成行动上的不便，阻滞机动车辆行驶。

会议上决定各部队的作战任务是：令新编第三十一师及警备旅附山炮一个营，从西面向五原进攻，师长孙兰峰为总指挥，旅长徐子珍为副总指挥；令新编第三十二师附山炮一个营，攻击五原前补红、后补红、广胜西、旧城，总指挥为师长袁庆荣；令第一〇一师为战区总预备队，但从该师抽出郭景云团彻底破坏包头至河套之间各处桥梁，以防止包头之敌迅速增援以及五原溃败之敌的东逃；令门炳岳的骑兵第

七师，王子修的步兵第六旅，安华亭的步兵第五旅，石玉山的骑兵第四师等其它部队，攻击五原外围各据点，如新公中、西商、郝镜桥、蛮可素、乌拉壕等地。

会后，我师奉命秘密开赴五原西什巴圪图一带积极训练。我团任务是攻击五原旧城，团、营、连均按分配给的攻击目标，在野外设置模型，日夜演练。

在反攻五原前，傅作义曾来我师给全体官兵讲话，其内容大意是敌我情况对比，反攻五原的必要，五原战役必胜的根据等等。最后他说：“据情报人员和老乡们反映，现在五原的日蒙伪军每人都有两三匹马，马上驮满了向乡亲们抢夺来的财物。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而我们的官兵除了枪支弹药和身上的衣服外，其它一无所有，我们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吗？所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次五原战役每个官兵要有胜利信心，要准备牺牲。我的决心是这次反攻五原，打到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打下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傅作义命令参战部队必须在 三月二十日

夜间零点，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事前必须严守秘密，给敌军个措手不及。因此我师于三月十九日深夜向五原城郊移动，距五原城十几里地方隐蔽休息。中午连长李玉璋去营部开会回来，召集我们三个排长开会说：“营长命令我连挑选一名熟悉五原旧城情况的排长，带领三十名机智勇敢的战士，组成营的突击队，首先攻入旧城，占领旧城内的白墙大院，待营大部队到后，再归还连的建制。”我当场报名愿带突击队首先攻入旧城，随即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全连好武器由我带，二是全连战士由我挑。”连长表示“可以”。于是我从全连挑选了最优秀的班长和战士三十名，携带轻机枪四挺、冲锋枪六支，其余为步枪组成了突击队。

三月二十日夜十时许，我团已秘密前进至前补红村外，因原驻该村伪蒙军骑兵一个连撤走不久，没有放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前补红村。在村中休息时，团部司号长到一位老乡家要水喝，发现这家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被刚撤走的伪军四人轮奸了。他当即向团长杨新钊报告了

此事。团长立即叫军医去给少女治疗，并召集全团官兵作战前讲话。当他讲明这个少女被轮奸的事实后，非常气愤地说：“敌人简直不是人！谁无姐妹？我们的同胞受这样惨无人道的蹂躏，这是我们军人的奇耻大辱！现在我们就向旧城日伪军发动进攻，报仇雪耻的机会到了，你们要把仇恨压进枪膛，凝结在刺刀尖上向敌人讨还血债！分配给各营连的战斗任务要坚决完成，一丝一毫也不能打折扣，必须全部彻底地把日蒙伪军消灭掉，才能对得起养活我们的河套乡亲们。”由于少女被敌人轮奸事件，激起了全体官兵的无比愤怒，纷纷表示要坚决消灭日蒙伪军，给河套乡亲们报仇雪恨！

夜十一时半我率领的突击队，已前进至旧城边缘，我们攻击的目标白墙大院，已清晰可见。这时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敌哨兵抽烟的闪光，我立即命令突击队就地隐伏，等待总攻时刻的到来，虽然离攻击时刻最多不过二十分钟，可是我们都感到度时如年，心情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突然一颗发起总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接着四面八方的枪炮声喊杀

声四起，我们迅速向白墙大院冲去。但冲至大院门口时，敌人已将大门紧闭，大门左右两侧碉堡内的敌人以轻机枪步枪向我突击队猛烈射击起来，由于我们所处地形平坦，无法隐蔽，敌人所踞白墙很高，攀登不易，因而第一次冲锋并未奏效，反而牺牲了两位班长，四名战士，另有七人受重伤，我本人头部也受轻伤。当我命令突击队迅速撤至距白墙大院一百五十米左右之渠壕内，准备整顿部队，再次进攻时，营长苗逢安已率全营官兵赶到现场，我当即向营长报告了敌人情况和我们攻击受挫情形。营长命令我突击队归还九连建制，同时令第七连和第九连携带炸药云梯，继续猛攻白墙大院之敌。我们两个连的兵力共一百七十余人，又再度向敌人发起猛攻。因为此时敌人已有所准备，火力比前更加猛烈，很难接近白墙，但我们仍然顽强地向敌人进攻。最后第七连终于攻至大门附近，将门侧两个碉堡炸毁，碉堡内敌人全部被歼。这时我也被敌人手榴弹炸伤腿部和臀部，不能行动，连长命令担架把我抢救下去，转送战地医疗所。

我营在数次猛烈进攻旧城战斗中，牺牲惨重，最后全营官兵只剩七十余人。我连连长李玉璋也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傅作义得知我营攻击受挫情况后，非常震怒，当即命令师长袁庆荣将营长苗逢安就地正法，以给作战不力，指挥无能者戒。后经袁师长力保，才准其带罪立功。

旧城战斗持续到二十一日中午，因广胜西的敌人在九十五团和宋海潮团的联合攻击之下向东逃窜后，旧城敌人见势不妙随之弃城而逃，我团终于攻占了旧城。与此同时我新编第三十一师，已将五原城内之敌全部肃清，至此五原战役基本胜利结束。

参加五原战役的各部队均伤亡甚众，据我所知师长袁庆荣负伤，团长贾宴如阵亡，宋海潮、王建业负伤；营长赵寿江、冯增波、阎梦云阵亡。可见此次战役非常的惨烈。

九十五团第一营营长赵寿江配属我团攻击广胜西战斗中，向敌人反复数次冲锋，中弹牺牲，最后全营官兵只剩下七人，依然顽强战斗。战后国民党中央授以该营“文虎旗”，以资

表彰。

当时全国报纸，均以显著地位，报道五原大捷消息，国民政府还犒赏攻城部队三十万元，并授予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最光荣的青天白日勋章，傅作义坚辞不受，给蒋介石发去辞勋电报，其大意是：我身为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而全省父老仍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本应引咎自责，岂敢妄自受勋。其次，五原战役的胜利主要是全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英勇苦战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获得的，不能把他们的功劳窃为己有。再次，五原战役的胜利，仅仅是攻克一个小小县城，竟给我以最高荣誉奖赏，将来全国反攻时，对收复北平、天津、武汉、上海等大城市之诸将领，又如何对待？为此不能受勋。后经蒋介石再三专电嘉慰，说明国家授予他勋章的理由，傅才勉强接受。后来有人对傅作义辞勋一事，作了分析揣测说：当时傅作义率三十五军抗日，转战晋、察、绥和日军苦战将近三年之久，而国民党中央没给三十五军补充过任何武器弹药。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之

后，因丢失武器很多，三十五军部分士兵只好手持铁锹当作武器，仍得不到适当的补充，究其原因，是蒋介石认为三十五军是异己部队，傅作义对此非常不满，因此辞勋。

五原战役，日蒙伪军全军覆没，除俘获大批日蒙伪军官兵和武器装备外，还击毙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日军因水川是皇族，下落不明，故于三月二十四日又调集精锐部队并附大炮数十门，再次猛攻五原，我一〇一师在乌加河畔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众。傅作义认为五原战役已经取得胜利，而且我军伤亡过重，若再死守五原，必付更大代价，因此命令各部做好空室清野后立即转移。于是敌人于三月二十五日再度占领五原，但由于我军主动转移，敌人非常担心，迅速寻找了部分日兵尸体火化装袋，翌日便又仓惶窜回包头。

由于五原战役给予日寇毁灭性的打击，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为止，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不敢再向河套地区越雷池一步。因此绥西河套一带人民，才逃脱日寇铁蹄的蹂躏。

五原战役时日寇绥西联军总司令大汉奸

王英，只身逃出五原城，丧魂落魄地连夜逃到西山咀附近，他听说沿退水渠及桥上均有傅军守卫，认为难以逃脱，只有死路一条，后来打听到守桥部队是安华亭的步兵第五旅，这才转忧为喜。因为安华亭是王英的老部下（一九三六年冬，傅作义进攻百灵庙日军时，王英部下安华亭和石玉山，率部起义投奔傅作义。）王英因有这样的旧关系便给安华亭写信，哀求放他一条生路，日后当有重谢，安华亭见信后，置傅长官之将令于不顾，将桥上哨兵撤走，是时王英惶惶然如露网之鱼，茫茫然似丧家之犬，逃回包头，后来此事被傅作义发觉，利用军政干部在八岱干训团学习机会，将安华亭和石玉山逮捕法办，直到日本投降时才将他二人释放。

（五）

包头、绥西、五原三个战役，当时日军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我军，为什么我们能取得象五原战役这样辉煌的胜利呢？答案是：战争性质决定战争胜负，日寇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不但全国军民反对，世界有正义感的

人反对，就是日本国内的劳动人民也是坚决反对的。其结果必定要失败；而我军虽然从各方面来看，都远不如日军，但我们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不但获得全国军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而且得到国际间的赞助与同情，因此必定取得最后胜利。在上述三个战役中绥西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军的有力支援，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包头战役我军仓促撤退时，有的伤兵未能及时转运，附近乡亲们将伤兵隐藏起来，并且设法送回部队，真是感人肺腑铭记心田。我们连一个副班长在包头战役中，胸部负重伤不能行动，西脑包一个老乡发现后，立即藏在他家大木柜中，并设法给他治疗。十几天后，日军放松了搜索，他和儿子把伤员偷偷地送到西山咀我连驻地。傅作义知道此事后，亲自由五原来到我连慰问他们父子二人，而且还请他们到各部队讲话，介绍他们如何隐藏和转送伤兵情况，部队官兵很受鼓舞。最后傅作义奖给他们父子五千元返回包头。

在这三个战役中，很多乡亲主动地给我军

侦察敌情、带路、用牛车运送弹药给养，抬担架，甚至有的小脚妇女也抬伤兵，还有的乡亲在日军溃逃时机智地把他们消灭掉。河套出名的民族英雄“王大虎”用铁锹把三个日兵劈死在乌加河畔芦苇滩内，傅作义授予他“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

新安小学师生

痛打警察始末记

陈建盛

秋天是农作物成熟的黄金季节，是欢庆丰收的季节。农民精耕细作，披星戴月在田间劳作一年之久，就是盼着丰收这天的到来。原安北县全县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不仅盼来了果实累累的秋天，而且盼来了大救星共产党，盼来了中国的解放。这咋不叫人欢欣鼓舞，咋不叫人心花怒放！为了庆祝胜利、庆祝解放，决定于十月一日在县所在地新安镇举行骡马大会。

当时安北县的军政各界，尽管参加了“九·一九”起义，照常工作，但仍执行旧的政令，只不过是赞同起义通电，接受共产党领导而已。旧军警人员没有进行思想改造，劣性未改，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但人民已从政治上挣脱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心跟着共产党，铲除旧政权，扫除害人虫，建设新中国。文中所叙师生痛打旧警察事件，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件事是人民群众千百年来积压在心底的反抗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的必然结果，而殴打警察仅仅只是革命风爆到来的导火线而已。

历年大会，会期只有两三天，而且活动内容单调一般，只有牲口交易场所，偶尔也有外地来的戏班参加演出，但参加人数很少。贫穷农民终年不得温饱，哪有闲情逸致逛骡马大会呢？一九四九年的骡马大会与往年相比不同凡响，会前有准备，会议期间有组织有领导，会期长达半月之久。与会群众远道而来，因此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在县府召开的预备会上，决定了会费的筹集办法和大会组织领导。会费筹集办法是：县财政拨款与向富户摊派相结合的办法给予解决。大会由组织委员会领导。组织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县长冯铭汤担任；付主任委员两名，分别由县参议会会议长韩士甫和商会会长潘毅生担任。组委会下设总务、治安和剧务三股。总务股长由县财政科长程子华担任，负责筹措大会的一切费用；治安组由警察局长丁凤山担

任，负责维持大会秩序和保卫工作；剧务股由教育科长陈建盛担任，负责审查剧情和安排演出节目。与会群众不论青年男女、妇孺长者，人人衣着整齐、精神焕发，喜悦之情溢于眉宇。

大会中心在桥南中山堂广场。会前在广场中心搭了一座宽敞、别致，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台。戏台正面用红黄绿兰各色彩绸，装点得分外艳丽。整个会场成了人的海洋，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由归包请来名伶，演出古装晋剧，由于剧目全系传统连本戏，因而剧场座无空席。此外，耍猴卖艺的、跑马爬杆的、拉洋片的、说古书的等，应有尽有，群众兴致勃勃，喝采声、鼓掌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的货物品种繁多，花色齐全，招徕顾客的叫卖声悦耳亲切。搭棚设摊出卖的炖牛羊肉，水饺等散发出扑鼻香味，来往顾客垂涎欲滴。农付产品应有尽有，马、牛、羊、驴、骡的桥市更是拥挤不堪。品评赞美声、讨价还价声和桥牙子的笑骂嬉闹声混在一起，使人应接不暇闻不胜闻。

从四面八方，徒步行走、骑驴乘马，或坐铁轿车、二饼牛车的群众，象潮水一样涌向新安镇，汇集在露天剧场上，先来的观众坐在广场中心，后来者站在外围，赶车的则站在车上。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中间低四周高的看台，急切地等待大戏的开演。

(二)

大会进入第三天（即十月四日）新安小学决定停课一天让全校师生看戏，与群众共享解放的欢乐和幸福。

当日午时，全校师生整队进入会场。教师指挥学生按年级班次的先后顺序就座。但是大会予先留下的地方已被先来的班级坐满，后来的几个班没有地方可坐，只得与后边的群众挤在一起，等待着安排座位。带队教师还没有来得及与大会负责人交涉好座位时，就有好几个警察强令学生走开。而学生只听老师的安排，不理警察的瞎吵嚷，乱指挥。这样一方叫离开，一方站着不动，双方争执，气氛紧张。这些警察认为学生不听指挥，是违抗命令，自认

为在人稠广众之前大失其尊严；再加他们动辄就打，开口就骂的本性未改，哪容学生来顶撞呢？于是，挥舞着红柳鞭杆和棍棒向学生劈头盖脑打来。这些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孩哪能经得住如此毒打？只得抱头大哭东藏西躲。坐在广场上准备看戏的乡亲们，此时此刻都很气愤，齐声呼喊：“不准打孩子们！”“为什么随便打人？”“打黑狗，揍他妈的！”随着正义的反抗呼喊声，土块砖头也从四面八方飞向这几个警察。六年级的边俊锋等几个大一点的同学，首先冲上去和打人凶手扭在一起。这时，王志远等几位老师也呼喊着手，带领学生一齐动手，向警察冲去。这些孩子们有拉手扯足的，有抱头搬腿的，有扑上去揪头发拧耳朵的，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几个警察打翻在地象杀猪似地嚎叫着。

正在孩子们打得痛快起劲的时候，突然又跑来几十个气势汹汹的警察和百十多名保警队，看样子要大打出手，准备报复。一场流血事件迫在眉睫！这时全场观众都“哄”地一声站起来，堵在了学生们的前边，并且呐喊叫

骂着给学生们助威。准备痛打学生的警察和保警队，看到这个阵势后，感到抢先动手未必能占便宜，众怒难犯，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站在一边不停地跺脚嚎叫着，谩骂着。正在这一触即发之际，我和警察局长丁凤山赶到了（事情一发生即有学生报告了我，我找到了丁凤山一齐来的）。我们分别喝退了警察和学生，一场大的流血事件才得幸免，可是会场已混乱不堪，本场节目只得停演。

（三）

事后统计学生轻伤三人，只是擦破些皮，有少量的出血现象；警方伤九人，其中受重伤者三人，有一人当场站不起来在别人搀扶下才回家。为什么警方比小学生反而受伤较重呢？究其原因是警察以往凶恶至极，横行霸道，而今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小学生，激起了民愤，一旦警察被打倒后，人们都偷偷地你打一拳，我踢一脚。这样就是铁铸的也会踢打瘪了，更何况是人呢！

为了平息纠纷，县长冯铭汤召集警察局长

丁凤山，保警队长韩凤礼，教育科长陈建盛，新安小学校长赵新民及个别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解决办法。警方说，学生不听指挥，不遵守会场秩序，违犯了社会治安与大会要求，要严办。警察在维护秩序中，竟受伤者多人，应予抚恤。老师更不该带领众多学生来打几个警察，应追究老师的责任，向受伤警察赔礼道歉，承担一切医疗费用，并要查出主谋老师严惩不贷；而校方则说，学生整队看戏，事先已得大会许可，并答应给学生留下特定位置，由于你们工作马虎，留得地方太小，有一半学生没有坐处，又不及时纠正错误，妥善解决，反而摆出过去那套强迫命令的架势，竟随意打骂不懂事的孩子。更为严重的是你们倾全局人马还不算，又勾结了保警队一百多人，想大打出手，欲置学生于死地，岂能让人容忍吗？事件起因是警察首先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动了手，你们不但要向受伤学生赔礼道歉，还得向全校师生赔礼，负担全部医疗费用。而警察受伤则是咎由自取，活该！会上警方蛮不讲礼，不尊重事实真象，妄想倒打一耙，因而久议未决。

我与校长赵新民看到警方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非常气愤，于是共商议定：一、向各单位散发传单，说明事件起因及经过，使群众知道真象，以求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二、发动学生到县政府请愿；三、罢课。

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行动，使这件事的真象大白，引起了民众对警察的愤慨，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不少学生家长，特别是挨了打的学生家长和社会知名人士，到县政府找县长和教育科长质问：为什么打学生？学生犯了什么法？学生的罢课请愿，闹得县长坐卧不安，应接不暇，对种种质问又解答不清。在强有力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县长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警方不再象以前那样蛮不讲理，很顺利地通过了决议：一、事件的起因错误全在警方，学生无错；二、警方应向受伤学生、家长和全体师生赔礼道歉；三、警方负担受伤学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并探望受伤学生。

虽然会上商讨出较为正确满意的解决办法，但会后警方又以警士受伤严重为由，拒不执行决议。最后县长冯铭汤不得不亲自代替警

局慰问了受伤学生并向全校师生赔了礼，道了歉。当县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道歉赔礼的话还没有说完，全体学生情不自禁，当场鼓掌拥抱，高呼“我们胜利了”，“正义伸张了”等口号。会后学生们拍着小手，学着县长讲话的腔调，口里念着县长赔情道歉的只言片语，争先恐后地在各个街巷里奔跑着，说笑着。他们幼小的心灵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

日寇入侵河套经过安北的前前后后

许贵德

(一)日伪逞凶进河套、门(门炳岳)军英勇战豺狼。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三深夜,日伪蒙军兵分两路,由前山向河套进犯。一路由包、五公路经官牛旗、公庙子、小庙子、西山咀进入套内;一路由黄河西岸经昭君坟、王发营子、二圪旦湾、碱柜、马七渡口过黄河进入套内。当时国民党军在前山和河西阻击日寇的部队是骑七师,由骑六军军长门炳岳直接指挥,由于这个部队每个士兵都戴一顶钢盔,所以老百姓叫他们是“铁帽兵”。由包、五公路进犯的日、伪、蒙军,因傅部在沙脑包段公路上挖了很多深坑壕沟,又有西山咀退水渠阻隔,日寇的汽车队在骑七师一个团兵力的阻击下不能前进,遂南渡黄河又从马七渡口进套。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河流已被坚冰覆盖,

日汽车队进套经由塔布沙拉、杨高明圪旦、六大股直到五原。当时由于“铁帽兵”是蒋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也很强，虽只两个骑兵团的兵力，却阻击着二百多辆满载日军的汽车以及伪蒙古军、伪鄂四儿和陈炳义等的骑兵无法前进，在腊月二十四日激战一天，于傍晚大量杀伤敌人后，终因敌众我寡，“铁帽兵”相机向西转进，边走边打，使敌军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很大代价。

当时日军的战术是：二百辆汽车一辆跟一辆，每辆车上配有火炮、轻重机枪和数十名士兵，在前进道路上遇上村子就停车先炮轰一顿，然后再用轻重机枪扫射一阵，若村子里没有动静，才敢开车进村，盘查有无国民党的兵。就这样，走一阵、打一阵的前进着。

当敌人的汽车进至杨高明圪旦时，遇到“铁帽兵”一个骑兵连，借着塔布渠渠背作掩护将日军阻击。该连配备有两门平射炮与轻机枪、步枪，组成密集火网，使敌人将近一天不能前进，击毁敌人汽车数辆，杀伤了很多敌兵，直到傍晚，日军派来一架飞机助战，

该连“铁帽兵”被迫转移，日寇才敢向西进犯，直达五原。

在日军的汽车队全部通过后，晚上紧接着又来了伪蒙古军的骑兵部队。当时我正逃难到了鸡儿蛮太（即现在的六大股南边的一个小村子），看见伪蒙古军一进村就放枪，挨门挨户地刁抢老百姓的金银财物、衣服吃食、猪羊牛肉、牲畜马匹、鸦片烟等，连老百姓的猪油罐子和过春节剩下的炒米都被抢掠一空。如搜不到东西时就打人，还抓上男人给他们铡草、蹾马、喂马、侍候他们，抓上妇女给他们做饭。由于这帮匪徒无所不为，闹得村子里鸡犬不宁，提心吊胆大哭小叫，一派恐怖气氛。老百姓对日本侵略军、伪蒙军恨之入骨，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只好背井离乡到处逃难。

（二）河套人民遭涂炭，巧布疑阵斗敌顽。

入侵河套的另一路日伪蒙军，在民国二十九年正月间（即一九四〇年二月间），由西山咀退水渠沿包五公路西犯。这时，五原已被南

路日军占领，进入新安镇的是鲍贵廷师的蒙古骑兵和部分日军汽车部队。他们一来，就大刀大抢、拉扶抓差，整日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附近村庄抢劫虏掠，奸淫妇女，致使群众咬牙切齿万分痛恨。

在日军占领河套期间，他们仅仅盘踞着公路沿线部分乡、镇，广大的农村则经常有傅作义所属的安五旅（即安华亭所部）出没，利用有利时机袭击敌人，使日伪军不得安宁。

伪蒙古军进驻新安镇期间，司令部设在耶和華（耶穌）教堂內。在东西树园子、桥西及附近村庄驻着伪蒙古军的汽车队及骑兵。有一天半夜，一小股安五旅的部队，趁日伪军不备之际，插入新安镇和桥西的中间，向两面打了一阵枪，放了几个手榴弹之后立即撤离，致使敌伪军误会，互相猛打起来。激战半夜，双方伤亡甚重，直到天亮才看清是自己人，始停止了战斗。

某日，伪蒙古军的汽车队要到五原去。从新安镇出发，沿公路经过西槐木村时，当地老百姓都按照上级指示，实行了空室清野撤至村

外。敌人的汽车进村后，突然遭到密集的枪弹和手榴弹的袭击，刹那间敌伪军被打倒很多，这一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仓慌退回新安镇。由于敌人在进河套后，到处受到傅部偷袭伏击，寸步难行，被迫撤退到西山咀退水渠以东去了。此后，有一段时间新安镇既无日、伪军，也没有傅作义的部队，成了真空地带。

隔了十多天的一个下午，忽然从新安镇的九号东南来了一股敌伪骑兵，与此同时，安五旅的骑兵也从乡下赶来阻击这股伪军。双方在新安镇桥南激战一下午，终因寡不敌众，安五旅在太阳落山时撤离新安镇。当晚新安镇又落入日伪军邬四儿、陈秉义骑兵师的魔掌。

（三）、日伪溃退向东窜、歼灭残敌齐向前。

一九四〇年三月末，傅作义将军率部一举收复五原。溃退的日寇由于我方趁河流解冻的有利季节，采用向各个渠道开闸放水阻滞敌人的策略，致使敌军汽车无法行驶，都被陷进红泥滩里。敌人无奈只得弃车向东仓慌撤退，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

神话。再者由于他们入侵河套后，作恶多端，罪恶深重，老百姓恨之入骨，当三三两两的零散日军到村里要吃要喝时，即被老百姓趁机击毙。如在新安镇南点力半斤附近有一个叫杨四招的老乡，一人就击毙零散溃逃的日本兵三名，以报其家破受辱的深仇大恨。五原日伪蒙军溃逃下来时，驻新安镇陈秉义、鄂四儿部派出一部分骑兵，到新安镇桥西附近公路岔道口，阻拦溃退下来的大股伪蒙军，不让进入新安镇，让他们绕路直达西山咀。但十个、八个、三个、五个零星日伪蒙军，可以由新安镇街上通过，这些溃散的日伪军来到新安镇街上已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有的日本人甚至只穿一只鞋，到饭馆要吃饭。当他们正要吃喝时，被陈秉义的伪军把他们的枪缴了，捆起来从饭馆的后门推走了。据说，这些被缴了械的日本兵、蒙古军都一窖一窖地在夜间活埋了。在新安镇附近的巴总圪梁和葛蛇就埋了不少，从敌人内部互相火并倾扎惨杀来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日伪蒙军占领新安镇期间，街镇的买卖

商号和附近的老财地主均已逃走，只剩下赤贫如洗的百姓，无处可逃。日伪蒙军成天向他们要吃要喝、要草要料，要地方上组织维持会，摊派食品杂役。当时公推李书顺负责和各村地主大户联络供应上项摊派杂役。

日伪蒙军想长期占据交通要道，城镇进行固守。但是，由于傅部实行了游击、伏击、突击等战术，使敌军坐立不安，人心惶惶。日、伪蒙军由新安镇撤退的前一天下午，一架日军飞机在新安镇上空，低飞盘旋了几圈后，扔下一个红布袋来被李书顺捡到藏起来。次日，日伪军便撤退到西山咀退水渠以东去了，在撤退时还捆走了很多无辜老百姓。

日本侵略军全部撤出河套后，傅作义司令部驻在五原，派员到各县清查给日本人办过事的人时，将李书顺押送五原军法处，要按汉奸罪判处死刑。在审讯中，李书顺交出他捡到日本飞机扔下的红布袋才免于死，被管押了一年多释放了。事后听说，此袋内装着驻包头日本军指挥官给新安镇日伪军下的“坚守新安镇”的命令。

(四)、必经之路打伏击，抗日健儿显神威。

刘石匠圪旦在现在的西山咀乡境内，离退水渠很近，附近到处沙丘起伏，遍地长着一人多高的芨芨，是日伪蒙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在大量的日伪蒙军从五原向这里溃退过来时，傅作义指挥的安五旅就埋伏在这里袭击敌人。当敌人的部队进入伏击圈后枪炮齐鸣，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本来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一接火，就抱头鼠窜，东奔西逃，伤亡惨重，死人死马到处皆是。在日寇进套时，太阳快要落山了。群众议论说这预兆小日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很快就要失败，这叫“日落西山”（此意即由日本国国旗太阳图案引伸而来）。从此之后，日寇的铁蹄再也没有踏入后套半步，广大的老百姓才从水深火热之中挣脱出来。

朱霁青在河套倡办垦区农场

边蔚平 李博岩

乌拉特前旗新安乡扒子补隆村，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一个“安北农场”（因在原安北县境内而取名），又名和硕公中。创建人朱霁青是辽宁省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顾问等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当时有志之士，激于义愤，群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与日寇周旋。东北义勇军是当时最大的一支抗日军队，朱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总监，领导部队转战各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著有战功。后来得不到必要接济和支援，孤军奋战，伤亡惨重，难与日寇相持，终于成为久疲之师，残部各自流散，转入内地各省，过着流浪生活。朱先生只身返回南京，国民党当局不但不念朱抗战有功，反把朱视为不受欢迎之人。朱氏十分伤感，同时想到旧部官兵，流离失所没有归宿，内心深感不安，于是

凭借个人声誉，向垦务部门，请准拨款银币四万元，于一九三五年通过绥远省地政局在河套划拨土地一部，另外价购蒙旗公田一部，共为百顷之余。在东起乌梁素海，西至盐海子陶来图，南界郝境沙，北抵民复渠的一片土地上，创建了“安北农场”。

在一九三五年，朱先生收容了流散在北平、天津等地的原东北义勇军成员及家属和部分山东移民，约四百人左右，先后来到安北县，故当地群众也称农场为“移民新村”。垦区成员以东北义勇军及其家属为主体，故又名曰“东北新村”。当时因陋就简地修盖起仓房、马厩、住房等建筑物，于同年四月一日召开垦区成立大会，宣布成立绥远省和硕公中垦区办事处。

垦区办事处设主任一人，由朱自己担任，掌管全场工作。由任作田任总干事（任是东北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汪春亭为付总干事，协助主任总揽场内外事务。下设农垦股、水利股、总务股、园艺股、保管股、文教股、警卫股。股下设若干班组，每个组设组长一人，干

事五至六人，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领导管理机构。

垦区总部建筑三栋房舍，共有一百七十余间，围以土墙，四角设更楼，远远望去，俨然象一座军营。院内有办公室、宿舍、图书室、俱乐部、医疗室、合作社、小学校等。

在安排生产方面，各组自行制定制度，编造计划，经场部核定后执行，但灵活性大，随时可以修改。垦区农作物，以糜、麦、豆类、葫麻为主，兼种土豆、萝卜、蔓菁等。因新垦田地，缺乏粪肥，青壮劳力多投入垦荒、挖渠、打堰，影响田间管理，土地不能全部种植，只好将一部分土地轮歇，另一部分土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每年粮食总产二万五千余担。与此同时，开展了植树造林、饲养牲畜、榨油、做豆腐、养鸡等付业生产。为了扩大生产，于一九三六年购进割草机一台，因同工及乡民们，初见农业机械，非常新奇，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此外，建有鸽舍、鹿舍，饲养通信鸽二百只，灰色麋鹿四头，聊供玩尝。

为了保证水利灌溉，在建场第二年（1936

年)自力开挖引水渠一道。从黄河开口,全长约四十余华里,为农场专用渠,命名曰“移民渠”。在渠道通过包宁路的交叉点,架设木桥一座,以便车马通往场部,名曰“移民桥”。另开挖支渠若干条,全长一百五十余里,纵横交错,以保证水利灌溉。

垦区农场内部人员,不论尊长妇孺,不分职务高低,彼此都以“同工”相称呼。视本人专长和体力强弱,分别编为若干组、队,一律参加劳动。老弱病残者,也安排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人人有工作,按劳定分,依分取酬。日用生活必需品,如油、盐、蔬菜等,一律按人分配,基本上执行着供给制。

场部设立小学一所,不收学费。吴涛曾任过校长,王育洪、王玉(女)、李清等八人任过教员。凡属“同工”子弟适龄儿童,一律强制入学,还招收一部分农民子弟入学。全校有学生百余人,分两个教室授课,采用复式教学。学生愿住校起伙者,每月交糜子一斗、烧柴一车,无力交纳者,也可减免。学校使用全国统一课本,学习用品如铅笔、纸、墨等统由

学校供给。在第一学年，免费发给每个学生兰制服一套，第二学年，每人发给童子军服一套。由于教学质量高，学生成绩突出，对学生生活关切周到，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和拥戴，在河套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起过一些示范作用。朱霁青对学校很重视，曾经一度外出，回场后首先对学校做了检阅，奖给学生皮球、香蕉等物。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十月间，绥包铁路沿线主要城镇相继失守，危及河套，学校部分师生，渡过黄河迁往陕北。当时，只有六年级一个班毕了业。

垦区农场建场初期，在东北、北平、天津等地前来的爱国青年中，有不少是大学生。他们来场目的，不尽然是为着开荒耕种，还为了革命。当时场内共产党地下组织，为党罗致优秀青年，壮大抗日救国力量和培养革命幼苗的成长，建立革命基地，随时寻求抗日救国、献身革命的时机，所以场内革命气氛浓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据说以吴涛等同志为首，发动了农场暴动，夺取了警卫股全部武器，率领着自愿参加革命的青年们，辗转到了延安，走上革

命道路，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在此之后，日寇占领了包头接着又攻打五原，并在大余太设防驻军，战争波及到安北，在此兵慌马乱之际，人心惶惶终日不得安宁，垦区农场“同工”也四处走散。从此该场便一蹶不振，房舍倾圮，生产工具日渐损毁，田地荒芜，经历了七八个寒暑之后，全场仅剩下六十余人。一九四六年，朱霁青想收拾旧摊子，重振旗鼓，再展宏图。他由北平带来王开文、黄子元、朱自诚等三十余人。在他们途经归绥时，受到董其武主席的热忱接待，并派警卫护送。回场后，根据当时场部条件，设置三个组管理业务：农林组掌管农、牧、林、水；总务组掌管会计、基建、学校；保管组办理米面加工、蔬菜种植。由马国瑞代理总干事，郑德生负责对外联系及收敛地租。学校成立两个初级班，由魏学孟、司欣柱任教员。

农场经整顿，虽初具规模，但经费无来源，生产上不去，又值连年遭灾，收不敷出，不得不分向外地求援，维持“同工”吃大锅饭。每人每月仅发零用钱数元，按劳付酬制

度，形同虚设。由于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同工”不安心工作，争相外流自谋生计。去附近农村安家落户者，日益增多，农场恢复旧观，只是一个奋斗目标而已，至解放前夕，全场职工仅有百十人。

朱霁青平易近人，无官僚习气，自奉简约，不尚奢华，布衣粗食，酷似老农。每日六点起床，巡视马厩、猪圈、园圃一周，数年如一日，风霜无阻，他常把当地面葫芦挖空，装入糜米蒸熟作主食，与“同工”同甘共苦，待客点心，也只是烘干馒头片而已。生活艰苦人皆称赞，其性格刚直，主观自用，不易接受别人意见，平日深居简出，不善应酬。他用一哑童为勤务，每外出时，乘一劣马，哑童随侍，绝不似高官厚禄之人。

一九五〇年五月，新政府工作团来安北县，团长王正大到农场会晤了朱先生，商定由朱霁青造具移交清册，安北县人民政府接管。移交后，王正大团长安排一辆马车送朱东去。

安北基督教会史略

董玉奇

清王朝末期，朝政废弛，腐败落后，内不能强国富民，外无力抗强御暴。因而导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侵略，妄图把我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瓜分中国之目的，曾向我国进行过多次侵略战争，如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战争，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战争等等。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历次战争均告失败。清王朝的皇亲国戚，官吏幕僚，只贪图安逸享受富贵，从不顾及丧权辱国，鱼肉百姓的悲惨境况，于是先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包括赔款割地、五口通商、租借土地、“洋人”在华驻军权、领事裁判权、经营企业权、开设银行等等为内

容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准许“洋人”来华传教，办学校等麻醉和毒害我国人民思想精神的文化侵略特权。

一八五六年，英、法、美、俄各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先后签订了三个“天津条约”，规定俄、英、法、美各国，在我国内地各处，有传播天主、基督教的特权，从此“洋人”打开来我国传教的门户。除帝国主义国家以外，象瑞典、荷兰、比利时、芬兰、挪威等国也纷纷派遣牧师、教师（女性称教师）来我国内地以及边远地区，修建教堂，传播教义，煞费苦心，广收教徒。

凡来我国传基督教的牧师、教师，因其信仰相同，目的一致，故表面上互相支持，彼此友好，然实质上由于他们的国家不同，主张有别，意见分歧，于是形成各种支派，其名称竟达数十种之多。若从其活动地区范围划分，则有“内地会”、“协同会”之别。

“内地会”，设“内地总会”与“内地分会”。总会设在各来华传教者的国内，分会设在我国内地各省、市、各地区。总会向分

会派遣牧师、教师，在所确定的地区内传教，其对象以汉人为主。

“协同会”由美国和瑞典等国联合举办。“协同总会”设在美国。他们派遣牧师、教师，来蒙古族地区（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内）传教，以库伦（今乌兰巴托）、昭和、扒子补隆（原归五原县管辖）、宁夏定远营等地为传教基地，传教对象以蒙古族为主。

“协同”的含意有二：一是美国与瑞典等国协同传教的意思。因在义和团起义时，曾杀死了些瑞典来蒙古传教的牧师、教师，而在举义失败以后，瑞典人凭恃美国的势力办理赔偿损失案，这不仅双方捞到意料不到的经济利益，而且美国人更扩大了势力范围。可见“协同”行事获利非鲜，故继续“协同”起来，派遣牧师、教师来我国传教；二是与“内地会”协同传教的意思，因“协同会”向荒凉落后人烟稀少的蒙古族地区传教，无论在物质生活、语言文字、传播教义、交通工具等方面困难多端，需要得到“内地会”的支持。而“内地会”为了传播其共同信仰的宗教，也乐于大力

协助。如在蒙区传教需用蒙文圣经，则由“内地会”协助印刷出版，署名“内地协同会印”。所以“内地会”、“协同会”是同一信仰，不同后台，既有合作，又有区分的两种教派。原安北扒子补隆的基督教会，属于“协同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扒子补隆教会牧师费安河（又名费尔灵顿）借杀死牧师、教师为由，向清政府索得四百二十五顷赔款地，民国十二年（1923年），又向达拉特王爷骗得永租地四百顷，从此费安河经营农副各业，收入累年增加，传教经费十分充足，因而在内蒙古地区的基督教会中享有盛名。现将“洋人”传教，杀害牧师、赔偿土地，修建教堂，兴办水利，经营各业、争权夺利，教会分裂、外人绝迹，以及安北基督教会的正式成立等等概况，分别记述如下：

（一）洋人来华 传播教义

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间，瑞典国即派基督教牧师，来我国传教，他们从瑞典

出发，长途跋涉，来到蒙古地区的库仑，然后分头经过茫茫无际的草原，越过绵绵无垠的沙漠，到各地流动传教。以马××（名不详）牧师为首的三名传教士，是最早来原三公旗后山及大余太一带传教的牧师。因他们没有定居下来，修建教堂，长期传教的打算，于是不久便转移到他处。

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会中的上层人物，也积极掀起到国外传教的热潮。他们鼓动青年人“立志到东方未开化的民族地区传道”，“在这一辈子把整个世界基督化”。教会中许多中坚分子，响应了号召，服从了调遣，离开舒适的生活条件，远涉重洋，来到广阔辽远的蒙古族地区传教。费安河便是最早来到执子补隆定居，修建教堂传播基督教的牧师。

费安河系美籍瑞典人，他出生在一八六五年元月，十六岁时信奉基督，随着年令的增长和信道的虔诚，成为教会中的骨干，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接受派遣，告别亲友离开美国，飘洋过海，踏上我国领土，首先在张家口“内地分会”（又说在协同分会）学习蒙汉语

一年，为到蒙古族地区传教作了准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费安河来到旷野草滩中的扒子补隆，住在蒙古包里传教，以后修筑了茅庵三间，一作卧室，一作厨房，中间作为礼拜堂讲经传道，另外由于他身穿中式服，头蓄长辫发，能讲蒙古语，会说汉人话，举止言谈，与农牧民群众无甚差异。在极易接近群众进行传教活动的情况下，以完成其上司派迁的使命。

（二）杀死牧师 赔偿土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军所到之处杀害洋人，焚烧教堂。与费安河同来河套一带传教的牧师沙立、曾脱，教师安得生、卡拉辣等四人，被杀害于大余太一带。埋葬于萨尔沁村西及萨拉齐城东二处。费安河侥幸露网，保住性命，只身逃往恰克图之北的俄国境内，为俄人工作，与此同时，他苦学苦练俄语蒙语。当他转赴库仑担任英商翻译员时，仍然继续从事其传教活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洋人纷纷向清政府提出解决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问题（名曰教案），强迫赔偿损失。费安河风尘仆仆，来往于京、绥之间。他在美国人出头支持下，以杀死“协同会”四名传教士为由，强迫清政府赔偿损失。光绪三十年清政府竟将原五原东，达拉特旗的四百二十五顷土地，赔给费安河了事。

费安河捞到如此多的土地所有权后，重返扒子补隆，除雇工耕种一百多顷土地之外，其余全部划等出租，收以租金，从此扒子补隆基督教会大发其财，传教经费，生活费用极为充足富有。

（三）大兴土木，修建教堂

费安河以庞大的资财费用，聘请萨县手艺高强的泥瓦匠，在扒子补隆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可容二百多人祈祷的美式礼拜堂，还为其修建了宽敞明亮舒适的住宅，从此，传教、居住条件大为改观，不用再挤在茅庵里传道了。

接着他又在其住宅的东侧，建筑起柜房、

库房、厨房，以及座西向东的备用房；座南向
北的牛圈、油坊、碾磨坊；座北向南可住二三
百人的兵房（原住蒙古兵，以后房屋倒塌，惟后
墙犹存）；座东向西的长工住房、马棚、存草处。
这样四周均有背墙拦挡，形成一个防御匪患保
卫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城堡，村民称为“堡子”。
堡子正南正东各开一个大门，西侧开两个便
门。陌生人不能随意入内，零星股匪也不敢为
所欲为，就连拥有五百多人马的卢占魁匪部，
在其它地方十分猖獗，而经过扒子补隆时，教
堂只给了他们些粮草，堡子内竟没有受到骚
扰。

另外，在堡子的东西两侧和西北端，开辟
了三个树园。西树园植榆树，东树园植柳树，
北树园四周植杂树，中间培育各种果树和种植
蔬菜。如今笔直挺拔，粗壮古老的通天杨，即
为当时的长工牛双靠所植。随着岁月的流逝，
各个树园现已不复存在，惟原安北县府院（今
新安乡乡政府院内）犹残存着教堂的痕迹。当
时的教堂与今日的礼堂比，相形见拙实在微不
足道，然与清朝末年，农牧民居住的简陋茅庵

相比，可谓豪华壮观，风景优美，堪称优雅之所，故人称此地为“洋堂”或“福音堂”。

（四）兴修水利 综合发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费安河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收入，决定在其获得的土地上开渠，引水灌溉，于是请后有开渠经验的王同春，实地勘察设计后决定，从塔布渠以南六十里的布袋口子，天生壕下凹地西边黄河岸开口，由西向东到二顺才圪旦开渠，在哈惠桥以东即乌梁素海子西海畔入海。渠口上宽为二丈四尺，渠下宽为二丈，渠深四至五尺，渠长共五十余华里，为了保质保量早日竣工，费安河出重资雇用保德人童二娃，山西人樊桂、托县人耿二喇嘛等三人为领工头，按照王同春的设计，带领工人破土挖渠。

当时开渠，完全靠招雇工人，用铁锹、箩头、扁担等工具承担修挖任务。费安河筹划周详，手腕也很高妙，他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从五原、包头大量购置上述工具，贮藏备用；

对工人的住宿问题妥善解决，锅、碗、瓢、勺等炊爨用具应有尽有。工人人数极盛时达千人以上，为了鼓励多出劳力，工资报酬较高。平日的吃喝较好，每礼拜还搞赏一次馒头猪肉烩菜，所以工人劲头足，施工进度快，工程质量也不错。开这道渠，绝大多数农民赞同拥护，个别人也有反抗者，如在和硕公中种地多年的朱庆林，原籍河北人，本人生性耿直，因开渠损毁了他的点儿土地，便愤起反抗。一天，费安河亲自巡视工地时，与朱庆林相遇，朱挺身而出向费安河扑去，并大骂费为“羊杂碎”要用铁锹劈死费安河。费见势不妙，急忙躲避，并说：“这是个疯子！”由于朱庆林势单力孤，同时开渠乃是一件好事，他终于无可奈何地罢了。

光绪三十三年春（1907年），全渠基本竣工，人称“洋人渠”。为了浇灌有序，实行由口到梢或由梢到口轮浇办法。从此，四百多顷土地可以及时灌溉，产量逐渐提高。费安河对其出租的土地地租，因地而异，每顷收白银六两、十两、二十两不等，以每顷平均收十两

计，每年可收租金三四千两银子，由于他除向佃农收以地租外，再无其他摊派杂役，所以农民感到种“洋人”的地利索。于是来“洋人渠”流域种地落户者逐渐增多。

按照费安河的意愿，除出租地外，在教堂附近雇工耕种了近二百顷土地，种植小麦、糜子、薯类、菜蔬、葫麻等作物。小麦亩产达九斗（二百七十斤）以上，若平均亩产以二百斤计，年产量达三四百万斤之多。于是他在扒子补隆修建了二十多个库房，贮存粮食，还在教堂附近设立十个耕作区，每处都设有场面和临时存粮的地方，编为一至十号。如今“七号”、“八号”、“九号”等村，即原来的第七、八、九场面所在地。

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产积累，费安河还经营了其它各业，设油坊一处，雇工榨油，经常储存食油两大柜，约达二千斤左右；开磨坊一座，加工粮食以供食用；设专人放牧，计有马三百匹、牛二百头、羊一千只；设专人育树种菜；设专人打柴、做饭、侍俸牧师等等。各种农工、技工、杂工及侍俸费安河本人的仆人

等，最多时达二百人以上。

费安河在“家业”扩大后，设立长老一人，由萨县人所谓“道深名高”的段世斌担任，负责协助牧师进行传经讲道等教务大事；设执事一人，由白锦玉担任，负责协助牧师办理有关教会事务、杂务等事项；设记帐先生一人，由王瑞担任，人称“坐柜先生”，负责记载收支帐目；设总管家一人，由教老虎担任，负责督促榨油、碾磨、放牧、打柴、做饭等工头认真工作。至于费安河本人不仅是传教，经营各业的主宰者，而且是现金财物的保管支付者，故人们称他为“掌柜的”。

在“掌柜的”主持下，每逢礼拜，对所有到会的教友和非教徒，一律招待一顿美餐。所谓“礼拜礼拜，卷子（花卷）烩菜”即由此开始并流传在民间的。由于给吃一顿饭，信教人数从此逐渐增多，接着他向五原、大余太等地派人讲道，继而设立分会，其传教活动的地区范围逐渐扩大。

（五）兴办教育 抚育婴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来到“福音堂”所在地——扒子补隆居住的人口更为增多，费安河为了推行宗教教育并从幼年起即培养具有信仰基督的心灵，于是聘请二王先生为教师，招收十几名学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圣经中的一些警句，这是扒子补隆有史以来最早的学校。

民国三年（1914年），费安河成立了由教会主办的“育英小学”，按蒙汉分校授课，汉校男女生分班学习，校长由费安河担任（民国十一年由安牧师担任）。蒙校先由二王先生负责并教学，后于民国八年由蒙藏学院毕业的韩文源负责教学，汉男校由程自铨负责，由程及其他四位教师教学；汉女校由毛安乐负责，由毛及王洲馨等教师教学。蒙生以学蒙语文、算术为主，汉生以学国文、算术为主。蒙生约二三十人，汉男生八九十人，汉女生二三十人，共一百五六十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变革，改为县立小学，学生大为增加，学制

为“三、三”六年制。这是扒子补隆在“育英小学”基础上，演变成当时比较正规的小学校。

“育英小学”所需要的教师工资，学生课本、文具用品等各项费用，全由教会负担，凡学习成绩优良者，由教会花钱送往外地深造，计送往北京者有小乌力吉巴雅尔、乌力吉巴图；送往西安者有段子高、毛静斋、路鸿德；送往张家口者有段子光、侯升阁；送往归绥者有曹继贤、王世英、崔继章；送往萨县者有王明德等人。

教会学校不仅培养出许多忠实信徒，成为传教的骨干力量，而且也确实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据统计从育英小学、扒子补隆小学毕业，转赴外地逐级深造，而今担任部长级、师团级、总工程师者不乏其人，任科局级和一般干部者更为数不少，总共参加了革命工作者达一百五十多人。

在办小学的同时，费安河于正庭后面，修建了婴儿院，由他女人詹尼·玛丽亚，收容了六名孤儿尽心抚养。所需的衣服、被褥、吃食、

杂用等费用，全由教会负担，他们从小就培养孩子信奉“上帝”，以期长大成人后，成为一名忠实信徒，孩子们与费安河的女儿威望，一块学习玩耍，生活的到还愉快。由于他们都无父母，故个个赐姓为费，费兰香、费素兰、费汝香、费素香、费女儿各玛、费梨香等均为当年的婴孩。

（六）费安河歿 牧师争利

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费安河长途跋涉，去张家口接其女儿威望返扒避暑时，染斑疹伤寒症，医治无效，逝世于张家口，生年五十五岁。其女人詹尼玛丽亚，由于悲痛忧伤成疾，于民国十年（1921年）夏病故。他夫妇二人合葬于西树园，其女儿威望回国。费安河来华传教二十余载，他以“谦虚和蔼，不骄不躁，任劳任怨，赐人恩惠”等巧妙手法，骗得不少蒙汉人民的好感，所以在其死后吊祭者约近千人，其信徒靳春圃、王卓甫、段世斌等多人，于民国九年岁次庚申菊月中浣立碑以示悼念。

民国十年（1921年）冬，美国“协同总会”认为扒子补隆教会不能无人主持，于是调遣曾在甘肃、兰州传过教的瑞典人郭发兰，到扒子补隆教会任牧师。

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协同总会”又调派曾在陕西西安一带传过教的美籍瑞典人旦乐森（又译为旦尼尔森），也来到扒子补隆任牧师，由于他身材很高，人称“旦不浪牧师”。同年夏天“总会”又从美国选派安××（有人称安德森不准确）也来到扒子补隆。

他三人先后到扒子补隆后，为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闹得长期不和。郭发兰认为他奉命主持教务，掌管财经大权名正言顺；旦乐森、安××牧师，也认为他们掌管支配这个教会的一切理所当然，各持己见，各有道循。后来由于旦、安二人勾结在一起，拉拢教会中的一些华人，共同排挤郭发兰，企图逼迫郭发兰自动离扒而后已。谁想郭的为人耿直，性格倔强，他坚持按“总会”的调遣办事，纵然掌不了权，仍然要坚守岗位，至死不离扒子补隆。于是郭

一人住在大庭后院，由阎四牛当佣人。他按时参加礼拜，平常给人看看病、传传教，与此同时，接二连三向美国“总会”上报告打官司。可能因路途遥远，也可能因“总会”内的意见分歧，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

旦乐森上任以后，把他的女人（系大夫）及两个小孩，安置在教会里居住，不久安××牧师与山东教会的一位教师结了婚以后，也住在教会，他们觉得住宅窄小不舒适，于是大兴土木，在正庭后面又修建了东西两个庭，美国式样，砖木结构。东庭由安××牧师居住，西庭由旦乐森牧师居住。此外在他们的宅后，挖了个冰窖贮存冰块，以备夏季冰镇食品。

民国十二年（1923年）安牧师因病逝世，葬于扒子补隆，其女人以后回国。美国总会派美籍芬兰人聂尔门来扒子补隆任牧师，他到任以后，仍然为主持教会的大事者，郭发兰住在后院，无权过问一切。

聂尔门为了再扩大其财政收入，曾请示“总会”批准，向达拉特王爷租得五原以东水地四百顷，连同赔款地四百二十五顷共达八百

多顷，实际亩数约达千顷，他把租到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仍然索收租金，归教会享有。

这年“洋人渠”因黄河泥沙沉积淤塞不畅。如果疏挖渠床，工程繁重，费用庞大，聂尔门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却有高深的文化水准，（美芝加哥大学肄业）。他到渠口引水处用水平仪进行了测量勘察以后，决定在原引水口的下游处重新开口，以倒扬水法引水入渠，当时许多农民和对开渠有经验的人都不同意，结果按聂的设计施工引水以后，因新开口处水位高，聚水深广，果然畅流无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总会”派普博爱来执子补隆任牧师，仍与聂尔门合为一派与郭发兰对立，本年旦乐森回国。

民国十六年（1927年），聂尔门也回国，由普博爱主持教务大事。

（七）教会分裂 放垦收地

民国十八年（1929年），广大贫苦群众，有了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于是在达拉特旗呈报放垦土地以后，驻五原县的第五垦务分局，将

原安北境内“洋人渠”域的土地，除留给教会数顷外，其余分等定价，宣招人民购领。原租种教会土地的教民，都认为地属教会所有，“耶稣至上”，官庭岂能中途撤收重行丈量？深信有“主”保佑，徘徊观望，不肯向垦务局登记购领。而普博爱也不许教民购领，惟恐丧失其拥有大量土地的特权。结果大部分土地尽归非教民购领而去，教民求救于牧师，牧师无能为力，祈祷主耶稣，耶稣也不显灵。从此“洋人渠”改名为民复渠，由绥远省包西水利管理局管辖。

普博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到绥远省交涉阻挡放垦，要按满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办事，然时日拖延长久不见端倪，十分沮丧。后来普博爱又去张家口分会，申请美国驻华公使，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企图挽回败局，恢复旧规定，结果仍如石沉大海，他只好垂头丧气，重返扒子补隆。

接着普博爱以任期已满为由回国。在国内结婚以后，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带其女人又踏入我国领土，来到扒子补隆领上乌力吉

巴图、毛生银二人前往宁夏定远营神召会上任。

民国十九年（1930年），美国“总会”派 昭和教会的李德洪，来扒子补隆任牧师。他在途中疑神疑鬼，惟恐不安靖发生意外，结果走到包头至安北之间，果然遭到抢劫，所带财物被掠一空，十分惊惧，他为能留下一条活命感到万幸。李德洪上任之时，正值官府收地放垦无法开脱之际，达拉特王爷提出，要收回教会租种的四百顷土地，李德洪以原系“永租地”许退不许收为由再三不退，旗府札萨克坚决反对，他只好把租种地如数退归达拉特旗处理。

另外教会中的一些华人，鉴于形势转变，如不购领些土地，一旦被非教徒全部购完，他们将无地生产无法生活，于是也向垦务局登记购领了部分土地。谁想李德洪到任以后，仍坚持四百二十顷赔款土地归教会所有的立场，强迫教徒们把购地执照交出，他准备去国民政府，换成外国地照。购地的教民，向五原垦务分局讲了这些事实以后，垦务局为了维护放垦

土地的合法权利，便查照存根另开了证明文约。这时，约一百多名教徒，与“洋人”离心离德，当李德洪准备坐汽车进京之际，被大家挡住他没有走成。

从此，教会内出现了两派，一派为“西差派”即以洋人为首，坚持按清政府条约办事，认为四百二十五顷土地归教会所有。在这一派中又可分“神召会”“安息日会”等等。另一派可谓“中华派”，全部是华人，主张按国民政府规定办事，认为洋人可以传教，但不应掌管财经大权。这一派中又有“中华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耶稣家庭”、“聚会处”等等。

教会分裂之后，李德洪为了维护其总领地位，进行改组。即在牧师下组成委员会，设委员七人，其中一人任委员长，委员长在牧师支配下，总揽一切生产、事务、财经事宜。而“中华派”反对这种作法，坚持仍设长老、执事制办事。长老由毛安乐担任，执事也更改了人选（名不详），其矛盾日益明显激化。

（八）洋人绝迹 教会独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扒子补隆开始有个别户盖房作小买卖。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大部分教民和非教民，在扒子补隆桥北大路两侧，修建商店住房，但又遭到李德洪无理阻拦，有的户已盖起半截房子，还被李德洪推倒，其理由是认为在教堂的地界内进行建筑，有损他们的利益，这一举动遭到群众的反对，教徒李书顺出头去归绥告状，省城派人实地调查并清丈了土地，结果宣布群众的占地与购领的土地面积相符，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房舍铺面，完全合理合法，闹得李德洪十分尴尬，束手无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李德洪带上其女人及两个孩子（叫达尼、地地）去宁夏定远营投靠神召会，并把夺得教民的购领土地执照带走，妄图待机再向政府换成外国地照。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寇投降后），美国总会派巴××牧师（名不详）来扒子补隆，办理交接手续，然这时教会财产无几，因

为民国十五年被国民军军长胡经义抄走二百多匹马，屠杀吃掉数百只牛羊；民国十八年以后，除扒子补隆附近约留五顷多地外，其余赔款地，重新丈量放垦种；租种地四百顷归还达拉特旗；仓库存粮，因闹荒年借给农民吃了二年。当时仅留下二十多匹马，少数牛羊托人代牧，以后逢年过节，逐渐宰杀吃掉，所以没有移交了多少财产。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美国总会派耿赛尔牧师，乘坐他的汽车，带上女人及小孩和奶羊，由昭和来到扒子补隆，调解郭发兰告状打官司一案，动员郭发兰回国，不要再闲住生气。谁想郭发兰理直气壮，坚持己见说：

“如让我回国也可以，但美国总会必须公开道歉认错，还要赔偿数十年的损失，否则宁可死在扒子补隆也不回国。”耿赛尔无奈，只好到处游览一番后他去，郭发兰仍住在扒子补隆。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在解放前夕，耿赛尔全家和包头教会挪威人教师白××（名不详）相随，企图逃赴兰州设法回国，结果耿赛尔一家买上飞机票，飞往香港然后回国。

白××教师没赶上坐飞机，于是她又骑上毛驴由伊盟绕道返回包头转去北京，解放后遣返回国。

这年，郭发兰病故，由包头内地会瑞典人瑞××牧师（名不详）来扒子补隆治丧，投标拍卖了郭的衣物财产，把变价款连同遗书寄回国内，郭发兰葬于西树园。从此在扒子补隆再见不到一个洋人传教了。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省起义以后，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安北的“中华基督教会”、“耶稣家庭”、“聚会处”照常进行礼拜活动。

一九五〇年，“中华基督教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整顿改革工作，把个别不纯分子且在教会内担负重要职务者清除出会，以民主讨论的方式，解决教会重大事务。这年随着新政策的颁布执行，教会内的师荣庭在取得大家的同意后，做了三项工作：

首先在政府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教会主动提出对出租的土地，一律不收租金，把五顷多可耕地连同地契，全交给农村，为土改工作

创造了条件。

其二是对外国传教士留给教会的桌椅、用具以及医药器械，详细造册一式三份，报送安北县委、县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是建议党政领导批准，以外国人留下的医药器械为基础，开办卫生所，得到领导批准，于是把所有药物器械移交卫生所使用。

一九五一年，师荣庭被选为执事长，他觉得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教徒，但却有“中华基督教会”、“耶稣家庭”、“聚会处”等名堂，不便于传教和领导，于是倡议三个教会合并起来。经过作了一定的工作和商讨以后，取得一致意见，三个教派实行合并，改名为“安北基督教会”并对七人的执事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吸收了“耶稣家庭”、“聚会处”等教派中的领导人参加。从此，“安北基督教会”正式成立，它是不受外人干涉把持的独立自主的教会。特别是在河套地区建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后，安北基督教会和其他教会一样，向反帝爱国的大道上迈进。

注：本文根据曹继贤、赵国治、乌力吉巴图等知

情者的讲述,参照高瑞新、刘静山二位的有关记载撰写的,对互说不一之处,虽进行了核对鉴别,但仍望其他知情者补充更正,以求详确。

附来扒传教教士简况表。

洋人来扒传教教师简况表

姓名	国籍	来安年月	大事纪要	离去年月	去向	备注
马××	瑞典	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他与另外两名牧师，由库仑带来安北，在后山、余太一带传过教。	不详	不明	来安年月 为大约期
费安河	美籍 瑞典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三年到张家口，学习蒙汉语一年，二十四年来扒。义和团起义时，杀死往传教之北俄国人，他身到库仑任翻译员，光緒二十八年办教案，获得赔款地二百二十五顷开“洋人渠”，扒时染病死亡。	民国九年 七月 (1920年)	死亡	其女人詹 玛丽亚，国 于民国故 十年病故 与费安河 合葬于扒 补子女儿回 国。
沙立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在安北北山及余太一带传过教，被义和团杀死。	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	被害	
曾脱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安得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系女教师
卡拉辣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郭发兰	瑞典	民国十年冬 (1921年)	原在甘肃、兰州一带传教，协同总会其他牧师来扒，遭到其他牧位打反对，他坚守死亡。官司，直到死亡。	民国三十 八年秋 (1949 年)	病故	葬于扒子 补隆
旦乐森	美籍 瑞典	民国十一年 春 (1922年)	原在陕西西安一带传教，协同总会调遣来扒，带孩子及两个小西庭。	民国十三 年 (1924 年)	回国	有名译名 为旦森尔 森者
安××	瑞典	民国十一年 夏 (1922年)	由协同总会调遣来扒，与山东教会东庭结婚，修筑后院。	民国十二 年 (1923 年)	病故	有人称 安森扒 葬于补隆 其女回 国。
聂尔门	美籍 芬兰	民国十二年 春 (1923年)	由协同总会派遣来扒，向达拉特王爷租地四百顷，改修过“洋人渠”渠口。	民国十六 年 (1927 年)	回国	
普博爱	瑞典	民国十三年 春 (1924年)	由协同总会派遣来扒，阻挡华人收回赔款地，民国十八年回国，结婚后经扒去宁夏定远营入神召会。	民国十八 年 (1929 年)	回国	

李德洪	美国	民国十九年春 (1930年)	原在昭和传教，奉协同总会调遣来扒，带女人及两个孩子，维护群众住房、商店。不许赔偿。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	宁夏 定远营
巴××	瑞典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	奉协同会之命，来扒子补隆地办理交接手续。	不祥	回国
耿赛尔	美国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	奉协同总会指示，来扒子补隆解决郭发兰的问题，自备汽车一辆，每去一处都带女人，小孩及奶羊，民国三十八年家逃往兰州飞香港回国。	不祥	他处 传教
瑞××	瑞典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	为郭发兰治丧，拍卖了郭发兰的衣物财产，寄回本国后返包头。	来安不久	包头
白××	挪威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	随耿赛尔去兰州，准备回国，耿赛尔一家飞走，她没赶上飞机，又经扒返包头，解放后回国。	来安不久	包头 系女 教师

三湖河灌区水利概况

葛昌龄

(一)

解放前三湖河灌区形成的经过

三湖河是古代黄河乱流期间的一条故道，而三湖河灌区是乌拉特前旗的牧场地。由于三湖河向东流经路线较直，其流程比黄河稍短，因而三湖河的坡度大，流速快。后来中滩段的黄河逐步南迁，但三湖河仍能吸引黄河的一部分流量，成为黄河的一条支流被保留下来。

三湖河的故道，自进水口的三湖口村，流经白二渡口、高留宝圪旦、划子补隆、西坝头、李兰保圪旦、根子场村（即现在的分水闸）、李三林圪旦房后、杨二红圪旦房后、阎虎狮圪旦房后、骆驼卜子，至三岔口注入黄河，全长约二百华里，约比黄河流程近二十余华里。

在三湖河流经的地段是古黄河的冲击平原，称为中滩，这块肥沃的土地是未开垦处女地。再者由于地势平坦易于耕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它成了垦荒创业的良好场所，所以关内农民纷纷涌来垦种。

过去，在三湖河流域的黄河地段，没有建筑防洪堤坝，在草场地中的零星耕地更没有渠道地堰。每年春冬黄河开河封冻时期，河闸水出岸漫流，转眼间，肥美的草地便成汪洋一片。在春季黄河归槽以后，人们选择适宜播种的空地进行耕种，其地点不能固定，其地块大小也不等。冬季河闸水漫灌，也为次年耕种打下良好基础。河闸水泛滥过后，虽对生长牧草和耕种有一定的好处，然绝非根本良策。

秋季洪峰到来季节，则与春冬河闸水截然不同，黄水滔滔，一泻千里，房屋倒塌田禾淹没，农民们辛勤耕耘终年，颗粒不收，十年就有九年灾，人们只好听天由命，祈祷河神保佑，平安渡日月。

清末民初三湖河流域由垦务局办理放地开垦事务，王文景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即来绥远

省任垦务局技师兼测量队长，任务是在中滩地区进行测量放垦工作，据说赫赫有名的“升恒号”，也于民国初年，迁来中滩，边经商、边垦荒耕种。

据了解“升恒号”原系山西人马子华、马树衡的祖先，于清朝末期在北京开设了一家银号名曰“升恒号银号”，专门以放债收利为业。当时西公旗的王爷们，每年进京朝贡时，大肆挥霍浪费民脂民膏，当用费不足时，即向该银号贷款行息，年复一年，拖欠累累，最后结帐本利相加欠债甚巨，不能以白银偿付，为此由“升恒号”朱老板、王老板等人出首与王公贵族达成协议，以四百顷土地折款还债。土地四至为：东从王春圪旦大堰子起，西至段根丸大堰子止，南临黄河，北濒三湖河。从此，“升恒号”即招雇贫民开始垦荒。

民国初年，在三湖河灌区的土地开始放垦时，三湖河的旧道和乱流情况，才被人们重视，设法控制与利用。民国七年由西公旗投资开挖了西官渠，并在西坝头村西，三湖河旧道上做了一座拦水土坝提高水位后，把三湖河水

引入地势较高的西官渠，流至李兰保圪旦又复归三湖河，渠程全长约十华里。通过这样改水引流，把河水由低地引向了高地，故南岸的沙圪旦、陈河渔之耕地，北岸西坝头村，王春圪旦，敖二圪旦之土地都能得以灌溉。

民国八年仍由西公旗投资开挖了全程长约十四华里的和硕渠一道（亦称合少渠），即现在的公益渠上段。它西从分水闸开口流经三豹圪卜后转入旧有天生壕，最后通三岔口入黄河。

民国十二年由绥远省垦务局开垦务渠一道（即现在的东渠），在李三林圪旦村西的三湖河上做一座拦河坝，截三湖河水入垦务渠。该渠由李三林圪旦起流经三岔口后注入黄河，全渠流程长约八十华里，它可灌溉黑柳子、白拉牛、李慧泉、赵三咸盐圪旦，李三林圪旦、杨二红圪旦、阎虎狮圪旦、骆驼卜子等村的土地。

由于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几年里，大小渠道的开挖、土地的开垦，外来移民，逃荒农民逐年增多，所以土地开垦的面积亦逐年增多，牧

民只得逐渐迁往旧三湖河以北之地区放牧。

当时的浇水方法是大水漫灌，无论耕地与牧场，灌水深度均达一米左右。各条干渠均无提水设备和拦水截流闸门，浇水时用柴土结合的座坝方式拦水，浇水口是在两岸渠背上扒口，口宽达一丈至两丈，开口后任水自由漫流。在浇地时，黄水滔滔汪洋一片，不知情者还真以为是河堤决口，黄水泛滥成灾呢！这种深浇漫灌的落后方法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之后仍无彻底改变。

公济渠原是三湖河的一条支流，流至三顶帐房南复入三湖河。后来因三湖河北岸的土地被开垦，但地势较高不能灌溉，为此赵柜、圪旦、土黑麻淖、全巴免的地主联合疏通了旧有的天生壕，并座坝拦住了三顶帐房正南流入三湖河的退水口，这才成了人们称之为的公济渠，使夹道子、刘虎儿圪旦、赵柜、鞋匠店、段四圪堵、土黑麻淖、全巴免、骆驼卜子地区的土地才得以灌溉，全长流程约一百华里。

关于渠道的水权问题，名义上是由水利社所掌握，按土地多少分配水期，轮流灌溉，而

实际上则为当时的大地主、大官僚所操纵，他们强迫贫苦农民打坝，自己却先浇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绥西联军司令王英手下的师团连长多为中滩人，于是三湖河的水利大权从地主官僚之手转由王英及其部下所操纵，如王万福、赵炽昌等随意座坝并派军队看守，为了自己浇水动用武力，擅自放开群众正在浇水的拦水坝，有的群众一旦阻拦，就用枪托戳在河里，贫苦农民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绥远省水利局长王文景即派赵秀峰到三湖河，成立了三湖河管理委员会。包头县由马树衡任主任委员，西公旗由朝克点力格任付主任委员，其他委员仍由当地的地主所担任。

一九四六年绥远省水利局，为改善三湖河的浇灌条件，又派赵秀峰到三湖河协助管理委员会，在“升恒号”修建分水闸一座，在西官渠的陈河渔村北修建提水闸一座。这两座大型草闸均为水利局投资购料兴建，这样不仅可以秋浇而且部分地区还能灌溉青苗。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只会搜刮民脂民膏，而不关心群众生

产,始终未成立三湖河的国家管理机构,水权仍由地方豪绅恶霸所掌握,因而渠道不断受到破坏和淤澄,不能充分利用已有的水利设施,发挥应有效益,真使人可叹呀!

虽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设施不能彻底为民服务,但通过贫苦农民年复一年的辛勤劳动,修挖堵截、疏通淤澄,使中滩初步形成以三湖河为依托与四道干渠相配套的三湖河灌区,为开发中滩农业生产,畜牧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

(二)

解放后三湖河灌区的发展概况

1、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和平起义后,绥远省水利局局长仍由王文景担任。他组织人力开始测量三湖河的地形,勘查黄河的形

势，规划了三湖灌区防洪坝设计方案，并报请中央水利部批准修建。中央水利部批准后，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在省水利局的领导下成立了防洪坝工程处，由刘建勋任处长，于五月一日开始动工修建。西起刘和仁圪旦东到三岔口一段，首先由起义部队改编的人民解放军担任兴修任务，工程进展很快。

2、一九五〇年八月，为使三湖河灌区完成秋溉任务，特将春季开河时洪水冲坏的三湖河渠背加以修补，使秋灌顺利进行。省水利局派葛昌龄到三湖河水利委员会做技术指导。我上任后于八月份，在“升恒号”召开了三湖河水利委员会会议。与会人员有主任马树衡，付主任朝克点力格，委员有阎五老虎、王玉同、史福挠、陈八、吴中发、王明保、段来红、柳七等十余人。会议决定：1、从包头县银行贷款三千元，做为整修三湖河决口的渠背、东大渠决口的渠背之费用；2、派人与中滩农场取得联系，请求中滩农场用拖拉机翻松公益渠至复盛西段渠底，再用猛水冲刷泥土，以便增加进水量；3、将公益渠下游淤澄的天生壕废弃不

用,在东傅家圪堵东边的傅大房后至李松树段另开新渠,这样使公益渠路缩短,流速加快,高地得以灌溉,并使公益渠水进三岔口入黄河。当时设计要求:渠底宽五米,边坡1:1,平均深一点三米,旱台宽为五米,长约一千五百米,土方总量为九千四百五十立米,按每立米支付土布一尺计算需土布二千四百五十尺。由于报酬合理,只用二十天即完成此项工程。

三湖河灌区在人员编制方面,计有管理员一人、会计员一人、办事员一人、伙伕一人、渠巡人员二十人。渠巡员由张宝成任班长,赵雨生任付班长,由苗狗儿看管进水口,观察三湖河进水情况。改挖修整后的三湖河灌渠,当年即完成浇秋茬地十万亩的任务。

3、一九五一年三月,在绥远省水利局直接领导下,在包头县长罗温如同志和中共乌拉特前旗旗委书记赵戈锐同志的指导和支持下,三月十五日在分水闸成立了包乌水利局,并以支渠的灌溉范围成立了支渠委员会。从此,深受水害的贫苦农民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管水、用水、治水的权力,使水害变成了水利。

4、包乌水利局的人员是由省水利局，包头县水利局和乌前旗水利局三方派人组成。由绥远省水利局派武善立任局长，葛昌龄任管理股长；包头县派梁仲杰任总务股长，朱建希任管理员；乌前旗派王凤仪、王治帮任管理员，水利委员梁玉栋仍任管理员，张延威任会计，并着手实施是年所决定的工程项目。

因武善立被捕未到任，工程又紧迫，省水利局管理科长王琨来信令我代行局长职务着手实施各项工程。

在成立了包乌水利局后，即作出决定：在包头县银行贷款五千元，于三湖河兴建草闸五座即：白二渡口为第一闸，高刘保圪旦村西为第二闸，划子补隆为第三闸，陈河渔村北为第四闸，“升恒号”为分水闸。

除在兴建闸口方面投资外，还在渠道方面兴建多条支渠，以便与干渠配套。在三湖河北缸房圪旦乡段开挖第一支渠，浇缸房圪旦乡土地。在划子补隆村开挖二支渠和三支渠，用以浇灌西坝头，老杨三圪旦、陈八圪旦、邬兴发圪旦的土地。在白金保圪旦开挖了民生支渠，

用以灌溉安北县的赵柜圪旦、白金保圪旦及乌前旗的南北水桐树壕村的土地。民生支渠的口闸和渠道土方的开支，均由包乌水利局投资，并由包乌水利局主持成立支渠委员会，主任由杨红世担任。在三湖河南岸的张润保圪旦开挖了张润保圪旦支渠，在高刘保圪旦村西的三湖河上开挖了第四支渠，这样使三湖河灌区百分之六十的青苗得以灌溉。

五一年的工程在旗县领导重视下，经省水利局验收工程质量全部合乎要求标准。支渠配套工程完工后，可浇青苗七万亩，浇茬地在五〇年十万亩的基础上，增到十八万亩。

5、为了充分利用发挥三湖干渠的作用，使中滩的土地得以全面合理地开垦、浇灌，特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份成立了三湖河工程处。处长为王家驹、付处长为孙彬、郁传义，处下设四个工段，第一段段长为王景，主办建造处办公房舍和李兰保村北的桥梁工程；第二段段长为葛昌龄，负责五支渠的支渠洗挖工程和分渠定线开挖工程；第三段段长为谢美祥，负责四支渠的定线及分渠实测任务；第四段段长为赵

广信，负责四工段房屋建设与河口定线工程。因进水口的水量不足，在支渠主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灌区实际情况，作物分布情况，渠道的状况等，提出分片种植，节约用水的要求，得到王处长与支渠委员主任们的同意和支持，使当年的小麦灌青两次，仅此一项措施，单产就提高百分之五十。据调查福盛西张硷种的葫麻，亩产达高二百七十斤。同年七月，工程处增设了灌溉管理科，调葛昌龄任科长，专管三湖河灌溉管理工作。

由于浇茬时黄河水位下降，三湖河口进水量不能满足灌溉的需要，在王处长的支持下，采取了洗挖七里生工的措施。从沙脑包西羊场房开口，经王留子壕至傅家圪堵再入三湖河。这样引来乌梁素海之水，以补三湖河进水之不足。由于采取这一措施，使三湖河灌区的灌溉面积扩大至二十四万亩。

6、三湖河灌区开垦后，土地使用种植和浇水情况是这样的：

公庙子以西地形高多为红柳芨芨生长地带，农民所开垦种植的土地多为沟壕地和河

头地。头一年经洪水淹没后，第二年为防止洪水淹没青苗，多以种植夏田早收作物为主，如小麦、大豆、葫麻、黄芥等，有的少数土地是三湖河洪水出岸淹没的沟壕地，多种糜黍之类的作物。

毛利特老亥以东至王春圪旦以西河头地种植黄芥、葫麻为主；张楞圪旦以北以种小麦为主，开垦的高地以种糜子为主，一百亩左右为一块打一围堰。采用轮浇轮种方法进行种植。至于浇水方法多采用大水漫灌。其作法是在大渠背扒口，八至十天后再去打口。土地浇了多少，水深多少一概不问，因此，浇水深度低地达五至六尺，高地也有二尺左右，有的地段黄水漫漫，水面达二十顷之大。远望村落已成汪洋中的孤岛，村与村之间的交通阻隔不得通行。

王村圪旦以东地区，在垦务局放地时定为五百亩为一大块，五十亩为一小块，每块都有大堰围绕，面积较小，浇水也方便，用水尽管较少，但水深也在二尺左右。

三湖河北岸，耕地与牧场地交叉，解放前

也无支渠，浇地方法纯系放水漫灌。西部缸房圪旦的土地从白二渡口放水，浇到菜园子村长达二十余里，东部由划子补隆开口浇至贾格尔气庙湾长达四十余里。每当浇地时，每个村落都得打护村坝不然村子就有被水淹没的危险。

一九五一年，成立了包乌水利局之后，开始挖了支渠，做了提水工程，并且发动群众挖毛渠、打堰子。水利局制定了确实可行的用水方案，在县旗区乡的督促指导下，由五亩十亩的地块逐步缩小到一至二亩的地块，每亩灌的水量也遂减少，禁止了过去从干渠、支渠上扒背放水浇地的粗鲁作法，开始了用毛渠放水入地的正规化方法。

(三)

三湖河灌区土壤碱化和改造措施

解放前三湖河灌区由于渠系不配套，大部地区不能浇青苗，每年依照传统的习惯，浇伏水、轮耕轮种或今年种植夏田，泡伏水后次年改种秋田用此种办法消除耕地中的杂草，中

耕、锄草、施肥不太重视，而对种植鸦片的土地，却精耕细作，实施严格的田间管理。其原因：一是因为鸦片可获高额利润，二是如若管理不当肥力不足，收成甚微或者干脆化为无有。

沿黄河一带地区，因地形较高，三湖河水不能浇灌，只靠黄河大水出岸洪水淹没后，第二年开始耕种，有的土地根本不耕，只用耢拉一遍即提耩播种。离岸较远的地区因地块太大不能浇灌，因而地下水位较低约在两公尺左右。高地不能上水，大水深灌迫使盐份集中于高地，因此当时种植的土地多为低洼壕地。

解放后由于人口年年有所增加，渠道逐步完善配套，使高地得以灌溉，荒地逐渐开垦，改变了以前不能浇青苗的现象，并且逐步由浇青一次变为浇青两次或三次。由于青苗的浇灌地下水的补给逐步增多，故地下水位由原来距地面二米上升到一米五至一米，因此高地的碱分逐步减少压聚于低地，故原有低洼良田变成了不易生长的碱地，而高地却在整平后成了肥沃的良田。

对于中滩地下水的流向,在一九五二年三湖河工程处成立后,着手由处下设的试验组进行地下水位观察。其方法是设置地下水观察井,派专人观察其升降并多次分析了它的流动方向。据测定数据表明,中滩地下水是由西北方向向东南方向流动。至于地下水的来源大体有二;一是灌水增多的结果,二是乌拉山的地下水渗入中滩。尤其是后者为较多。如乌拉山镇地下水长期出现于地表,水泉子湾的地下水到春季即以地下泉流出。由此可知,乌拉山对中滩灌区地下水的补给关系很大。

三湖河灌区的地势大致为 $1/8000$ 的坡降。由于黄河多年以来的漫流形成了地势局部高低不平的现象,因三湖河长期漫流淤澄,形成三湖河以北南高北低,南则较河北为高的特殊地形,造成三湖河南岸地形较高的原因是黄河出岸泥沙淤积造成的结果。

一九五三年三湖河灌区因无排水工程,地下水不能排泄,加以浇青浇茬的灌水量逐年增加,因而土地碱化现象日益严重,低地的地下水位距地面更近;高地经过平整种植,灌水

后,使地表碱分随水下沉,逐渐渗流进入低地,故原有好耕地(即低地、壕地)碱分有所增加,产量有所下降,甚至壕沟地竟变成二阴地,不能长庄稼,为此,根治土地碱化采取了以下措施:

1、兴挖排水渠。

根治土地碱化首先必须解决乌拉山地下水的渗入问题,使其降到一点五米至二米以下才能防止水分上升。根治方法应顺着低地挖一排水沟到中滩东边送入旧三湖河废渠,再进三岔口最后入黄河。其次三湖以南地下水之排洪,可采取排灌结合。具体方法是应沿黄河堤坝挖一道通向三岔口的排灌渠,将水排入黄河。因该排灌渠西高东低,可以自流排水,不必搞提水工程。这样既可排除地下水,又可泄洪排涝,地下水位自然就下降了。

2、缩块平地、浅浇快轮。据调查实践证明,只有土地平整,灌水深度才能一致,可以避免碱分过分集中;只有浅浇快轮才能减少灌水量,地下水位自然会下降。如若采用畦灌,每亩用水只需大田的一半,产量反而可增

一倍左右。

3、施用农家肥去碱法：具体做法是在捉苗率不高的耕地内。加以整平，每亩施羊粪或驴马粪七千至八千斤，在秋翻时压入地内，浇以秋水，使碱性得以改变。其道理是粪肥发酵后产生大量酸性物质，与土壤中之碱性中和，进而变为能被作物吸收的养料。原中滩农民曾作过几次试验，使头年捉苗率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采用此法处理后，捉苗率可达百分之百，产量也显著提高。

4、以水压碱法：在中滩农场附近，曾使用这种办法排除耕地中过多盐碱。具体做法是挖排水沟排除渗出碱水，排入三湖河废渠再流入三岔口，最后泄入黄河。这样把渗到渠内的碱水经常不断地排出去，使作物得以正常生长。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滩农场直属队曾采用这一措施在场部院内种稻谷，亩产高达八百市斤，后在永丰城正北大面积种稻，采用此法其产量也很高。

(四)

防洪堤的兴筑及其防洪堵决

早在民国初年，农民从三湖河口至三岔口沿黄河一带比较平坦之地段，开始种植庄稼。为了保护耕地作物之安全，农民们自发地联合修筑堤坝或围堰，高仅一至三尺，顶宽二尺。此种防护坝在黄河低水位时，夏收作物不至于淹没，但洪水高峰到来期间，则无法阻挡，况且都是各自没有相互连接起来，故一旦洪水暴涨，全部庄稼几乎都被吞没，因而有“三年两灾”之称。解放后，绥远省水利局兴筑防洪大坝建议，得到中央水利部批准后，于一九五〇年在省水利局领导下设立了防洪堤工程处，由刘建勋同志任处长。为了便于检查和指挥整个工程，指挥部特设于包头市，并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初，首先在中滩段开工。该段全长约二百华里，但为了施工方便和保证工程质量，下边又分三个分段。东段以达不素太为中心，西至王恒圪堵，由王官保负责技术指导工作；中段

西至大河湾以西，以傅家圪堵为中心，由葛昌龄负责技术指导工作；西段从大河湾至刘和仁圪旦，以三应河头为中心，由王效卿负责技术指导。至于所需人工，由起义改编后的三个师分段担任，同时在当地聘请懂水利的人员任监工员。为使指战员深刻理解这一任务的伟大意义，绥远省政府付主席孙兰峰和水利局长王文景，于五月间亲赴中滩“升恒号”，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后因中段工程任务较重，又于七月初，增调乔汉魁旅共同施工，方便工程如期交付使用。

在洪水高峰到来之前，为了保证堤坝工程按期完成，工程处决定从包头县的五区发动民工二百至三百人，协助抢修中段工程，工程处又派技术员赵广信、玉景二人前来工地协助葛昌龄工作，这样才使中滩防洪堤的第一期工程按时完工。堤坝平均高程为一点三米左右，其断面前坡为1：3，后坡为1：2，顶宽三米，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又大量动用民工逐年加高、培厚、延长，始达到目前防洪堤之标准要求。

一九五一年七月份黄河洪水上涨,当时我已调到包乌水利局工作,因防洪是保证灌区生产之第一要务,故省局调我协助包头五区区长张毛有同志共同负责西傅家圪堵的指导防洪工作。为了保证安全不影响灌溉,采用由三湖河东水口闸引水,以缩小流量。

当时大部分渠工都分配各险工段协助防洪。一天,水利局长王文景和处长刘建勋接到包头指挥部电话:“据兰州水文站电报称,黄河流量已达到3800秒立米”。他们即以电话指示五区防洪段:“洪峰到达后可能超过现有堤坝顶零点五米,要加强防洪措施”。区长张毛有即刻调来五区全部和二区部分民工奔赴工地加高堤顶。但因五区段地形较低,而且堤外水深已达一米左右,因此该段堤内阴水深达一市尺至一点五市尺,加堤取土十分艰难,取土距离远约三十公尺以外,又因新堤土松,迎水面必须挂柴草面,以便保护冲刷堤坝浮土,所以很难达到堤坝安全之目的。在这紧急关头,五区指挥部电请绥远省驻包头临时指挥部迅速制定安全措施。指挥部回电将原方案改为在

堤顶加高一公尺，宽一公尺的子埝，以防黄河洪水超出堤顶。同时大如旺段因土质不好，背水面塌坡现象很严重，令水利局渠工班长张宝成带渠工数人，负责做柴草戳并以木桩打入土中，以加大抗力，这样才保证了大如旺段的堤坝安全。

在估计洪峰到达的前一天，子埝的高程仅加到三十至五十公分左右，这一严重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另谋良策，否则五区漫堤决口之灾将不可避免，全中滩人民的生命财产将会受到莫大的损失。这种局面搞得我昼夜不安心。经反复查看了堤坝的背水面渗水情况和抗水力，又经再三测算，提出了取堤坝背水面之土，加高子埝的想法，并与张毛有区长商讨，他说：“此法虽好，但万一决口责任重大，咱们是不敢这样做的。”我们打电话请示防洪堤刘处长决定。但他说：“想法很好，但责任重大，李直付局长在此可向他请示以做决定。”李局长听了我的报告后答复是：“我是外行，对技术问题不懂，此事事关重大还是请示王局长吧！”当我在电话上对王局长谈完我的取堤

顶背水面土，加高子埝的想法，并分析了当时工地情况和防洪堤的渗水状况后，王局长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以电话指示张毛有区长：“按葛昌龄同志的计划执行。大水到来前，继续加高培厚子埝，出了问题由我王文景负责；如大水来临，不能按此计划完成时，由你张区长负责”。经民工一再努力终于完成了顶宽一米，边坡1：1的子埝。在天黑前子埝刚完成，洪水即与原防洪堤顶涨平，至当晚十二时许超出原堤顶五十公分的地段就有二十余华里，其涨势持续在翌日拂晓。天大亮后，水位退至原防洪堤顶接着水位继续下降，才保住了中滩人民的生命财产。

一九五一年七月，洪峰到来时，李虎圪堵段大堤决口。其原因是坝基尚未沉实发生了漏水现象，防汛人员少，水位又高，防洪用的柴草没有及时运到，虽有技工李顺鱼赶去指挥抢堵，但未能及时堵复，以致酿成了大的决口事件。决口后，驻包指挥部当即调后套黄济渠长张卫士、晏江县水利局长周二马、包乌水利局葛昌龄、王根河等人，会同绥远省水利局长王

文景共同研究决定采用两岸卷扫棒堵决法。还决定从三湖河口调包乌水利局河柳五十万斤，人工由包头二区的民工和农场一部分犯人 共同协力完成。经过五昼夜的奋战始得堵复。

此次决口使中滩农场损失最大，李虎村与兰虎村也损失严重。整个坝内是一片汪洋，村庄形似孤岛。公益渠以南之禾苗均被洪水吞没，虽洪水后来从傅家圪堵北经天生壕入公益渠下稍退入黄河，但农场地较洼，割倒的葫麻尚未运回，只得在汽油桶上铺上木头，权做木船打涝运回场面，高粱均在水中淹死。李顺鱼因防御不严，犯失职罪，被包头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九五二年又在防洪堤大如旺段，农场兴建的渠口发生了决口事件。该渠口竣工后指挥部决定，在此地开口时，将原浇地之渠口，原群众利用之渠口，东西旧堰加高，必须与新筑之防洪堤高度一样方可放水。这个决定是会同农场水利干事王玉同和支渠主任委员郭红牛于五一年在包乌水利局决定的。文件由防洪堤工程处备案。大如旺渠口均由中滩农场投资，以

灌溉劳动渠和赵小仁圪旦农场之土地，并在防洪堤上做草闸一座以控制水量。这一决定因关系包头县与防洪堤之安全，农场曾与防洪堤工程处、包头县商定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始得开工。但放水前原决定之工程项目，农场未做外围防洪堤和外口进水闸，就与郭红牛商定放水。包乌水利局为此曾派支渠主任委员郭红牛，去农场谈了两次。回局汇报说，农场浇点菜地即关口，并且农场雇了大如旺村一个老汉在大如旺看口，不至出问题。

七月份黄河水势渐涨，农场不知。八月初河水猛涨，水利局派郭红牛速令农场堵死闸口，但该场未执行三湖河工程处的命令，并说还有一点菜地未浇完，再浇两天。

黄河水量增加，三湖河水位亦随之上升，为防进水过多，河口东水闸推进两个扫棒，用以减少进水，同时把李三林圪旦通往旧三湖河退水闸放开，以退东大渠过多的水量。但因退水闸水位高，放开闸后土面淘涮甚巨，我去中滩农场要了二十个人当即堵死闸口，同时派技工张宝成立刻去找郭红牛，将大如旺堤背之闸

口用土堵死。不料张宝成当夜住在分水闸，未去找郭红牛。夜间我与王根河到分水闸后，在五更天即催张宝成与王根河一同去大如旺。当时郭红牛主任已去大如旺共同防护，发动民工二十人拉死该闸，但并未用土堵死。当天晚上，王根河、张宝成去秦义滩村吃饭时，左码头发生裂缝，郭红牛见状感到不妙即令民工行碓，以图加固，不料反使裂缝增大，将到天明时，左码头被冲坏。此时他们虽向我作了报告，但已决口，一切措施都已无济于事。在我与工程科长何维钰前往决口地点的同时，五区区长曹庆明也赶到现场，农场干部也带领劳改犯人到如旺研究方案进行抢堵。可是因原决定加修之旧堤未动工，致使洪水漫堤而过，造成取土非常困难。经四方面研究决定在旧闸与新闻之间座坝，采取扫棒进行抢堵。不料在将近合拢时，又把东背冲坏。接着又研究决定采取加高旧坝的措施，进行抢险。为了保证这一方案的成功，我与包头县武装部袁部长下水探测旧口水深与水底土质情况，认为底子好可以施工。采取流水码头堵决法，经两天一夜的奋战

才将口堵住。

在排洪水方法上,为了避免少淹青苗,将大沙坝劳动渠背加高,把洪水由此渠引入公益渠内,再将公益渠口关闭,使决口后灌进来的洪水从公益渠下泄入三岔口后,进入黄河。大如旺以北则加高中支渠背,保护了中支渠北和大沙坝以东的禾苗。

由于我们工作疏忽,使人民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是今后应汲取的深刻教训。事后经内蒙监委查明,因农场不执行决定擅自放水,特给乔场长记大过一次。

一九五四年,防洪堤工程处将三岔口东西之堤坝全部连接起来,只有三湖河退水口未做,还留有两个退水口。一九五六年三湖河水利局局长杨富元和下游各支渠委员会主任共同研究,为了防止黄河大汛期间洪水倒扬,淹没田禾和防洪时东西通行不便,经局委会研究决定:在三岔口做一退水尾闸,将两个口合为一个退水口。此闸决定以扫棒铺底,下设底大梁,上设大梁两根,这样既可方便民工往来,又可在必要时控制倒扬水。此闸由技工史广瑞

和张蒙恩二人负责施工。竣工后验收质量合乎标准，但因草闸第一年总难免有下沉和漏水现象发生。在完工后我曾向杨富元局长提出建议要设专人管理以防意外。他说：“三湖河放水后，浇完青苗即行关口，没有多少余水下泄，暂时可不必设人专管”。青苗灌溉期间，我回旗参加肃反，交待旧社会的问题，重新审查。七月份的一天上午东大渠水利主任高风祥从柴脑包给我打来电话，说三岔口尾闸码头发生裂缝，应速来人抢救。我即向肃反小组长说明情况，要求到现场处理问题，经组长请示旗委未蒙批准，责成水利局另行派人解决。我还不放心又通知分水闸史广瑞快去三岔口抢救尾闸。当史到达现场后见到裂缝已延长扩大，闸上也沒柴草。他立即在骆驼卜子发动了群众运输柴草进行抢救，但终因柴草运送不及时，人力不足，抢救不力，闸被冲坏。此事教训我们水利工作者，在建筑设施竣工后，必须设专人管理，决不可忽视，不然会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五)

在灌溉与施工中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一九五一年就成立了三湖河管理灌溉局，因水量很小，不能同时浇青，支渠水利主任委员会议决定，今年口轮稍，明年则稍轮口，实行轮流灌溉制。各闸以土地多少，确定放水时间，但每次放口最多不超过十五天，要求各闸派一名技工具体实施此方案。

一九五四年经三湖河工程处整修三湖河后，设计进水量为40秒立方米，同时增为两个进水闸，这样使水量大增。灌溉方法经支委主任会议决定，采取了上下两段同时分水，即分水闸为一段，闸上为一段，同时浇灌，而每段仍采取上下轮灌制。

缩小地块，节约水量。

一九五一年每块为五亩至十亩；一九五二年为一亩至五亩；一九五三年为一至二亩，最大的为三亩左右。在浇茬地方面，由解放前每块几十亩的地块变为十至二十亩，逐渐变为

二亩至三亩。这样大大节约了水量。

深浇变浅浇。

在浇水深度上由原来深浇逐步变为浅浇，各渠道的灌溉均设专人管理。从一九五二年起，即成立了包浇组，建立初级社后，由社内指定包浇人员，逐步变为有计划的浇水组织。

分片种植分片灌溉的方法。

一九五一年引水口在三湖口村开口，是凭水位高低而进水。由于黄河水位是按季节涨落，因此在浇青时期进水量没有保证。由于青苗灌溉期无法按时供水，作物产量很低，为提高产量，节约用水扩大浇青面积，向灌区群众提出了分片种植，分片进行灌水，减少渗漏，杜绝淌荒节约用水的措施。在各级政府和支渠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灌区实行。按渠道系统，土壤分布情况，以毛渠为单位，由支渠委员分管各毛渠进行宣传，让夏田和秋田分片种植（即杂田分排的种植方法），使原先不能浇青苗的土地和地区，能够浇青了，原先仅浇一次的，能浇两次了，从产量方面说，由原来亩产小麦一百多斤的土地，提高到

一百五十至二百斤。从泡茬来看，夏田浇伏水不至淹秋田，而秋水可以浇秋茬，泡秋面积从一九五一年的十二万亩增至一九五二年的十八万亩。

由于种植作物按毛渠分片轮作，夏秋田分开种植大大减少了水量的浪费和渠道渗漏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减少了群众抢水浇地所引起的纠纷，决口现象也随之减少。

从各闸的浇水期看，由原先的三天，变成了两天即可全部浇完，用水期大为缩短。由于统一规划，浇水的人工方面也节约不少。因一九五二年是从互助组向初级社开始发展的时期，三湖河灌区仅有先锋的于占海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根子厂的王四老虎农业生产合作社，户数很少，其余灌区农民是以互助组和单干户的形式进行生产的。按照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渠道的条系为依据的原则，分片种植，组织了包浇小组。由原来的放口大家浇，巡渠无人管的现象改变为分片包浇的办法，大大节约了人工和减少了决口事件的发生。

由于当时农民分片种植得到了实惠，非常

拥护这一措施，因而也就成为三湖河灌区的一种长期施行的灌溉制度，到一九五八年仍然按照渠系土壤情况实行分片种植。我认为这种方法，今后仍可采用，既可节约用水，又能降低地下水位。

一九五三年三湖河工程处决定在三湖河实施改建工程。会议决定渠道土方工程由赵广信负责设计施工，计土方四十余万方，建闸工程每闸由一个主要技术员负责，自己设计自行施工。我担任了分水闸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全河共有大闸七座，其闸位顺序是河口上有两个进水闸，是张于驰设计；在白二渡口为第一提水闸，由高成云设计；在菜园子为第二提水闸，由张荣立设计；在毛利特老亥为第三提水闸，由郭淳设计；在陈河渔北为第四提水闸，由郑键设计；在“升恒号”为分水闸，由葛昌龄设计。总的工程负责人为郁傅义付处长和工程科科长庞北阁。改建渠道工程由中滩农场三个大队的犯人承担，闸工由前旗民工负担，每闸出民工五十至一百人，时间决定必须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放水前完成。在会议上王家驹

处长强调指示,谁设计谁施工谁负责。

三湖河第三闸是在裁湾取直的一段新渠中间施工,开工后有民工一百多人左右。当闸基挖到渠底以下时,闸底土壤系流沙组织。春季施工阴水大,一百余人担一天流沙糊糊,转眼间又被淤平。后来因箩头担不住沙糊糊,改用麻袋片向外担,但第二天仍然平了。民工们奋战多日,工程仍无法进展。郁付处长接到报告后,随即电话指示我:“你找上工程科长庞北阁,咱们一起去三闸共同研究解决闸底流沙问题。”我们到三闸后,先去工地共同了解了闸底和施工情况。郁副处长又召开了会议研究闸底流沙问题,会上有人提出改变闸址。经讨论这样做也弊多利少,原因是新闸址离原闸址近了不能改变闸底流沙情况;远了与支渠渠口引水有矛盾,照此做法势必增加支渠土方和减少原设计的灌溉面积。

我反复思考,认为不改变原闸址为好,可以节省人工,多浇耕地,可是闸下流沙如何解决呢?经与当地群众了解在流沙下一米五左右可能有一层红泥,于是我亲自用钎子进行试

探,果然流沙下层确系红泥。但如何挖去这层沙糊糊呢?因为挖一天后,四周的沙糊糊又流满了闸坑。我经过再三分析,认为采用扫棒做底,以扫棒驱沙的办法,进行施工较为妥善。

当天晚上,由郁付处长主持会议,我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和想法,大胆地提出了把原一层莫芄一层红泥碾实的方法,改为用“扫棒做底”的方法。有人说扫棒在泥沙中下不去,有人又提出另找闸址,还有人耽心这样做不坚固。最后我详细地阐述了实施此方案的具体做法:

- 1、扫棒长度与闸底相等,不许中间有接缝,使闸底前后连接为一体。

- 2、扫棒直径为一点二米,使扫棒下沉后低于闸底零点三米,上边再加一层红泥与哈木儿,碾实后再加笆子与底梁。

- 3、扫棒浮于沙浆上不能下沉时,可再加压力,将沙糊驱出,至所需深度为止。

会议最后由郁副处长拍板决定,天明采用我的建议施工,有什么问题到时再行研究解决。

第二天在郁副处长的主持下,上午即在北

岸做好扫坡碾下了第一根扫棒浮在流沙上约五十公分。当时我叫民工三十多人上扫棒齐跳加压。加压后的扫棒果然如事前所料，把流沙挤在南边，这样使扫棒的放置深度达到了工程要求标准。下午将南边的流沙挖出一部分后又随即推下了第二根扫棒，仍用前法上四十多人加压，将流沙驱出，达到设计标准。三闸整个闸底工程就用此法按时完成了任务。从放水后的效果来看，经过考验证明，无论拉死闸浇水或拉半闸浇水，均未出任何事故，说明这一方法是成功的。

一九五八年我已被划为右派，在三湖河水利局做挖树坑的劳动。当年春季公济渠在三顶帐房西南做裁湾取直工程一段，长约一千公尺左右。这段工程连接山梁地的一个高岗地带，开工后挖到五十公分处，即发现地下泉水，它与乌拉山的地下水相连，因此工程无法进行。这段工程由王明局长负责实施，在其无计可施之时，向我讲明现场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如何解决。第二天我们二人共同去工地勘查。当查清了地下水的来源后，我提出了利用水沟排

水的方法进行施工。具体做法是把地下泉水用水沟截流,引导入公济渠。这样水泄入公济渠后,施工的渠内变成干土,以便工程之实施。经王明局长同意后,即在渠内挖了小沟。每挖一层渠底,水沟也同时往下挖一层,这样水会向低处流出,不会向渠底漫流影响施工。通过此项措施,不仅按计划按时间完成了工程任务,而且还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

当时提此建议的理由是: 1、裁弯段的位置在乌拉山脚下,是地下水渗出的地方。2、渠深约2—3公尺,在五十公分处见水,势必越向下挖,水势越大。3、裁弯处在公济渠底的上游,因而公济渠之渠底,必须低于裁弯段之渠底,挖水沟排地下水可自流下泄。4、利用抽水机抽水耗费太大,甚至不能抽干,这样不仅浪费资金,又费时费工,因而抽水之法不可取,权衡利弊挖水沟排水,实为上策。

(六)

中滩的交通与通信设备。

解放前因为三湖河南北交通几乎不通,只

有几处可用划子过渡。上游为白二渡口、官牛犊、升恒号渡口；下游的东大渠、公济渠只用柴排过渡，牛车只能空车涉水而过，其它车辆行人一概阻绝。

一九五一年郭振义任区委书记时，在升恒号建木桥一座。桥梁设计与施工均由葛昌龄负责。并从陈河渔至根子场发动民工修了一条马路。中滩农场在李汇泉东大渠修桥一座，并在通往赵小仁圪旦场部的要冲地段修马路一条。

一九五二年，三湖河工程处在李兰保圪旦修木桥一座，修通邬兴发圪旦至工程处马路一条，是由王璟设计施工完成的

一九五三年农场修建通往各大队的马路，修建公济渠至场部桥梁和李三林圪旦东大渠桥各一座。以后逐年在各交通要道又建了一些通往防洪堤的桥梁与马路。

一九五一年在防洪堤上架设了由包头县通向该县二区、五区两个防洪指挥部的电话，二区设在达不素太，五区设在杨家圪旦。

一九五三年三湖河工程处架设了由分水

闸通往三湖口的电话线路一条，沿途一闸、二闸、三闸、四闸及工程处所在地均设电话。这条线路是由张凤歧同志负责架设完成，全长约四十余华里。

一九五六年三湖河水利局又架设东大渠电话线路一条，直通柴脑包沿途各闸亦均设置电话。此项工程亦由张凤歧同志架设完成，全长约三十余公里。

中滩农场于一九五三年架设了由场部通往李汇泉大队、赵小仁大队、白拉牛大队、永丰成大队、马营长地大队、兰虎大队六条线路。这样中滩已基本都通了电话。

一九五七年三湖河水利局迁往哈拉汗（今巴音花镇）办公，随即又架设了从哈拉汗到分水闸的线路一条，长约四公里，由张凤歧亲自架设完成。

贾士元的舞台艺术生涯

李志学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特别是在河套广大群众中，提起贾士元的名字来，人们并不陌生，公认他是二人台有名的老艺人。

贾士元从事二人台舞台艺术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生活经验和表演技巧，尤其在他后期的演出中有了明显的突破，对继承和发展二人台这一民间艺术是有一定贡献的。

贾士元出生在旧社会包头郊区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其父贾交其，因为穷困潦倒，无法维持多儿多女的生计，忍痛把在摇篮中的四儿（即贾士元）与包头一家米面商换些吊命粮，其母王风花听说把四儿换了粮食，一口气跑在那家商人大门前，哭得死去活来，要她的四儿。那家商人看她哭得可怜，才把四儿还给她。从此，父亲担着行李，母亲抱着四儿，一家老小住进包头转龙藏破庙里。白天出去讨吃

要饭，晚上回来，母亲还得在油灯下给人家缝缝补补，赚点微薄的钱，饥一顿，饱一顿苦度日月。“人说黄莲苦，我比黄莲苦三分。”这就是孩童时代贾士元真实的生活写照。

贾士元在这样一个极度贫穷的家庭里，却意外地得到了二人台的启蒙教育和薰陶。其父贾交其，是个“二人台迷，”他善长哨梅（即吹长笛），在乌拉山前的家乡——哈达门儿村，经常和一些二人台爱好者在一起打坐腔。贾士元随着年令的增长，经常随父到外村观看老艺人们演出二人台“转山头”、“打后套”、“走西口”等，久而久之，他耳听心记，能滚瓜烂熟地背唱二十多个二人台传统节目唱段。有时给乡亲们唱上两段，得到热情的鼓励和忠心的夸奖。

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独立队（土匪），误认其父贾交其赚了笔钱，把他请了“财神”（即绑票）用水蘸麻绳抽打，火烧柏柴烤，在这个可怜的穷人干骨头上榨出来的不是钱，而是血与汗。他放回来之后，已是奄奄一息，从此一病不起，在贾士元十四岁的那年可怜的父亲含恨离

开了人间，其母受此一惊一气染病久治不愈，生活更无着落，一家人几乎陷入绝境，年仅十四岁的贾士元，不得不担起生活的重担，踏上独立谋生的道路。

二

一九四二年贾士元万般无奈，只好搬着老母，离开家乡哈达门儿口村，这时的贾士元已是一个十七岁身强力壮的大后生了，他赶着毛驴进山砍柴渡日，开始了负重如牛的山汉生活。“买卖十三行，就数赶驴忙，走路吃干粮，坐下抠脊梁。”冬天进山砍柴，更是苦不可言，山道崎岖难行那且不说，一身薄衣，又怎能抵挡住穿山风的侵袭呢？有时实在冻得受不了，只好找一个僻静处，烧柴取暖，这“前面暑伏，后面数九，”的滋味更是难以言传。

八九年的山汉生活，苦没少受，艺也没少学，刚进山，不习惯深山老林，空无人野的寂寞生活，俗话说：“女人难活哭鼻子，男人难活唱曲子。”年青的贾士元赶着毛驴，天不亮进山，上灯后出山，他自然要唱曲儿，一来消

愁解闷，二来壮胆。日久天长，在山里结识了一些二人台爱好者，常常在一块儿对山曲儿，打玩艺儿。

山里练唱，空旷幽静，回声朗朗，自唱自听，自练自改，确实是个练唱的特殊环境。贾士元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练就了一副金嗓子。“砍山生活虽苦，苦中有乐，唱曲儿就是乐。”他现在虽年近花甲，仍然久唱不衰。爱好者们共同在一块儿“冬练三九”为的是年下进村办社火。年下办“社火”是各路民间艺人聚会切磋技艺的良好时机，他向老艺人们学习了不少东西。“社火”形式多样。如高跷，旱船、跑圈子秧歌、大头和尚、灯游会等。每种形式都有专调，如“九九图”、“调兵”、“掐蒜苔”、“十里墩”等等。贾士元在年下“社火”活动中是个积极分子，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优秀演员。每年正月十五以前，走村串户，表演技艺，非常热闹。

三

春雷一声响，
遍地鲜花开。
全国得解放，
艺人站起来。

解放后，贾士元结束了苦不可言的山汉生活。穷人翻了身，当家做主人。他积极地投身到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中。他把过去在一块儿打坐腔、打玩艺儿的戏友组织起来，在根皮庙成立了乌拉特前旗第一个业余剧团。剧团成立后，排演的第一场戏是“长工翻身”、“捉特务”、“童养媳妇诉苦”、“小姑贤”等节目。这些节目，演到那里，那里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五二年，乌拉特前旗第一次文代会在巴音花开幕，贾士元和其他各地老艺人、二人台业余爱好者参加了大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会后，贾士元又在点力素太积极筹办了业余剧团，当时参加的演员有：李忠、许计计、李润玉、白四仓、李锁牛等。

一九五四年，所有各村组织的业余剧团全体演员到大余太集中排练，这时，不仅演员阵容扩大，而且演出节目新颖、技艺精湛。在贾士元与其他同志的积极倡导和筹划下，于一九五五年正式成立了乌拉特前旗第一个民间歌剧团，演员有贾士元、王五，郭汉小、田地生、韩金枝、白五祥、何秀花、崔凤兰、杜明忠、郑玉英、袁志花、李忠、白四仓、许计计等三十多人。演出节目有：李富回到合作社、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方四姐、探病、牛郎与织女、离婚与复婚等。传统节目还有走西口、打秋迁、压糕面、水淹西包头、惊五更、送四门等。贾士元成功地在“牛郎与织女”中扮演了牛郎的嫂嫂，在“离婚与复婚”中扮演了海套儿红，在“方四姐”中扮演了“老余婆”，在“探病”中扮演了刘干妈。这些初步成绩的得来，主要是依靠自己刻苦的学习，当然也与虚心向名老艺人学习、请教是分不开的。

一九五四年点力素太业余剧团解散之后，为了提高技艺他便去包头求教于樊六、计子玉等老艺人。他在包头找老艺人们“打坐腔”，

通过“打坐腔”学习各个流派的唱腔，看老艺人的演出，学习表演技巧。进一步和老艺人白灵旦（樊二仓）、巴秃挠、周三、计子玉、樊六等共同在一起，互相念剧本，商榷唱腔、唱法。总之从手、眼、身、法、步的表演技巧以及霸王鞭、扇子、手绢、四块瓦到服装、化妆等，虚心请教，认真学习。“长工翻身”剧中他扮演王三，唱腔学巴秃挠。巴秃挠的嗓子宽、音韵纯，字正腔圆，清脆委婉余味无穷。“离婚与复婚”一剧中他扮演海套儿红，学张魁。张魁会用嗓子，唱腔能按照剧中人海套儿红的特点加以夸张、润色、浑为一体。“探病”中他扮演刘干妈，“方四姐”中他扮演老余婆，学樊六。樊六能成功地塑造年令不同、性格各异的妇女形象，把热心诙谐的刘干妈、蛮横凶残的老余婆的形象，塑造到入木三分、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再现在舞台上。著名戏剧家老舍誉樊六为“民间艺术家”。贾士元认准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名老艺人。从此拜他为师，系统学习樊六的表演艺术风格。他拜樊六为师的办法与众不同，一不用上课，二不要笔记，三不

用手把手教。而是用明学暗学的方法进行，所谓明学是他经常和樊六“打坐腔”、念剧本、观察其音容笑貌，牢牢地记在心。樊老也不把他当外人，经常一句一腔、一步一点都给予耐心指正。所谓暗学，即经常观看樊六演出的节目，观看最多的节目是“探病”，他深深地爱上了樊六扮演刘干妈的表演技艺，他从道白、台词、台步、服装、化妆仔细学习，认真模仿。看完戏，回家后自己再重演一次，用心揣摩，那里学的象，那里学的不象，一点一点地融会贯通，就这样，经过与樊六几年的求教，在表演艺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来源于孜孜不倦的学习。他积极探索，博采众长，终于获得“二樊六”的誉称。

四

一九五八年撤销安北县建制，原安北县民间戏曲团和乌拉特前旗民间歌剧团合并组成乌拉特前旗民间歌剧团，演员阵容扩大、演出节目除二人台传统节目外，还经常上演大型歌

剧，先后排演过“小二黑结婚”、“朝阳沟”“南海长城”、“贩马记”、“翠鸟衣”“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等。贾士元在许多戏中扮演的角色受到群众赞赏。但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探病”中刘干妈的表演技巧上。这个时期，贾士元演出的“探病”在艺术方面，有了独到之处，在广大群中有了较高的评价。

正在贾士元蜚声舞台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动乱，不仅剥夺了他的舞台演出权利，而且还把这朵民间艺术之花判为“黄色小调”打入冷宫。

打倒“四人帮”以后，这朵民间艺术之花——“二人台”也和全国其他剧种一样又获得新生。与此同时，贾士元以无比激动的心情，重新登上舞台，与久别的广大观众见面了。

一九七九年，贾士元参加了巴盟群艺馆在后旗东升庙举办的二人台表演导演学习班，“探病”又和观众见面了。贾士元扮演的刘干妈，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连演二十多场，场场满

座。一九八〇年，与高爱女，尹济民共同排演了新编二人台传统戏“二次探病”（编剧是本文的作者，现旗文联工作），代表乌拉特前旗参加全盟会演，从剧本到演员均给予高度评价。贾士元扮演的刘干妈，从艺术表演上更深化了刘干妈的舞台形象。一九八一年，他们代表巴盟总工会参加了内蒙职工会演大会，“二次探病”获得剧本优秀节目奖，贾士元获得了优秀演员奖，颁发了表演艺术奖状，受到内蒙二人台研究专家席子杰、韩燕如等同志的高度赞赏。一九八三年，年近花甲的贾士元与王建友合演《蒙汉两亲家》，代表巴盟参加了八个民族的“全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文艺调演会”，参加大会的中央代表团团长郝建秀在自治区主席布赫陪同下，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郝建秀团长慰问了贾士元，并且当场表扬他“你演得很成功”。

贾士元是旗政协二、三、四届政协常委，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为二人台贡献了最大的力量。研究和探讨贾士元的二人台舞台艺术表演技巧唱腔等，对二人台传统戏的改革、

发展是有益的。

五

研究探讨贾士元的表演艺术，首先要从传统节目“探病”说起。

“探病”一剧是席子杰老先生根据老艺人秦五毛眼口述“要女婿”“二姑娘得病”两个二人台传统小戏整理改编而成。经过席老的妙笔精心艺术加工，使“探病”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探病”的问世，造就了一代扮演刘干妈的名演员，如樊六、亢文彬、温吉祥、贾士元，他们虽然同是扮演刘干妈的，艺术风格，各有千秋。观众看了他们演出的“探病”之后，觉得是真正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

贾士元正式演出探病是在一九五五年，那时候，他虽具有二人台宽宏高亢韵味浓厚的金嗓子，但还没有真正掌握了二人台独特的表演手法，形体动作等艺术风格。

当时，由于一些演员对“探病”的历史背景掌握不准，对刘干妈人物个性、特征、身份认识不一致，所以在舞台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

刘干妈。有的演员为了招来观众，逗人一笑，不惜歪曲人物形象，添油加醋地把刘干妈扮演成不堪一睹的恶心人物。

贾士元早期扮演刘干妈时，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由于同样对“探病”这出小戏产生的历史背景了解不够，对刘干妈和干女儿陈翠云之间亲如母女的真挚感情理解不深，错误地认为刘干妈是一个能说会道油嘴滑舌的媒婆式人物，甚至认为只有把刘干妈扮演成这个模样，才能得到观众的好评。有一次在大余太演出探病时，他在化装和表演上都下了功夫，头上画个火罐印，插朵红花当头顶、脸上涂上灰扑粉、大红裤带连半身，走起路来一溜风、做起动作鬼抽筋，扭腰甩胯不成稳。当这样一个形象的刘干妈一出场，果真引起观众哄堂大笑，自己误认为观众很满意，已达到观众的要求。当演完之后，他向一些上了年纪的观众征求意见时，有的人说：“好是好，就是不象刘干妈。”还有的人说：“你把刘干妈演成这个样子，把翠云这个好闺女也给糟踏了。”他听了这些尖锐逆耳的评论，大失所望，扫兴到了

极点。回到家里，睡在炕上，反复思考，“不象刘干妈，还牵连了翠云？”“那么观众心目中的刘干妈是个什么样子？”“难道真的有人见过刘干妈？”，这一系列的问题象乱麻团似理不清，想了几天之后，他下决心要把“探病”这个戏的“根底”追查清楚。他不辞劳苦地走访于群众中，分析剧情，追究来历，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又求教于名老艺人樊六，观摩樊六扮演的刘干妈，用心揣摩，吸收其艺术营养，以便补充自己的不足，他终于找出个眉目来。

“探病”一剧所描写的背景是清朝末年，即整个封建王朝濒临崩溃的最后年代，剧本通过刘干妈和干女儿陈翠云两代妇女，冲破封建礼教、包办婚姻、宗法制度的精神枷锁，要求自主婚姻的故事情节，反映出广大妇女迫切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愿望。“探病”中的翠云，是个天真无邪、心底纯洁的姑娘，她敢于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的统治下，既无媒妁之言，又无父母之命，竟然和前庄王玉龙自找对象，私定婚约。这在当时，则被认为是违犯封

建礼教的叛逆行为，自然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亲人们的歧视，父母的制裁。而饱经风霜的刘干妈则不然，因患封建包办婚姻之心病，对于女儿自己选择女婿的作法十分同情。当她知道干女儿“病”的根底之后，她不是阻拦干女儿的自主婚姻，而是以自己亲生遭遇、痛苦的经历去开导干女儿，并且告诫陈翠云“千万不要走干妈的老路”。最后毅然决然地答应干女儿的要求，去前庄提亲。这就是反映在刘干妈、陈翠云两代妇女身上反封建的高贵品质。难道对她们能有半点歪曲吗？不能，决不能把刘干妈扮演成油嘴滑舌的媒婆式人物。自此以后，贾士元就从服装、化妆、形体动作，台步唱腔、表演手法等方面进行艺术加工，终于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老实憨厚、热情善良、朴素大方而又风趣的令人尊敬的刘干妈。

贾士元为了让刘干妈，既不能象小脚女人扭，也不能完全象大脚女人走，创造一种既符合刘干妈性格，又有舞台艺术美的台步来，所以他在“稳”字上下了功夫。他每次在农村演出完了，总是深入群众征求意见，模仿各式各

样的老太婆的形态举动,音容笑貌走路姿态等。有一次在明安演出“探病”,散戏之后,他发现一个老大娘,走的步子稳而不浮,碎而不跳,动作优美,很有特点,他看上了眼,也顾不得当时有没有人看,就跟在后面学起来,老大娘突然回头一看,人老眼花,发现后面有个老人赶出来,便打招呼:“你大娘,快走,我正愁没个伴呢!”当贾士元走到跟前时,她仔细一看才认出是谁来:“灰小子,原来是你,还学的不差甚。”。又一次,她和一个老大娘攀谈起来,大娘也有一个干女儿名叫桂英,在旧社会包办婚事,找了个皮打溜混的女婿,耍钱偷人,无所不为,回家经常打骂桂英,桂英一气之下,跳井死了。老大娘越说越生气,说到伤心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贾士元被这悲惨之事所感动,自己也本来是有意识地观察老人家的表情动态,此时此地触景生情,他也自觉不自觉地照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哭的那样真实,就连大娘也不敢相信对面坐的是个男子汉。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通过反复观察和实

践，贾士元同志扮演的刘干妈，从服装设计到形体动作，从面部表情到心里活动，都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让我们看看贾士元现在扮演的刘干妈吧！

刘干妈一上场，上身穿着老兰暗花宽长衫，下身穿着合身打腿的青布裤，头上梳着整齐打髻的普通老太婆发型，胳膊腕上带着银手镯，这是典型的北方古典农村妇女打扮，看上去干净利索，庄重大方，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贾士元根据剧情发展，在表演手法上特别掌握和发挥了刘干妈的“两笑”、“三哭”。所谓“两笑”，即开场一笑，“干妈长，干妈短，不知咋啦，把人亲的活赛赛的……（笑）”；结尾一笑，陈：“你答应啦？”刘：“答应啦。”陈：“那俺们也没病啦”刘：“干妈早知道你也没病啦。”（笑）。这两笑，场场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不是无缘无故的笑，笑在开场与结尾，互相照应，充分反映出这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同病相连，冲破封建婚姻束缚，尽管获得了局部自由，也是出自内心的喜欢，笑的真实

生动，这和观众的笑是心心相印的，是胜利的笑。所谓“三哭”：一哭，赵财主无理拳打刘干妈，致使刘干妈“肚痛的肠子要崩断”（哭）。；二哭，“你干爹一听是赵财主，吓得你干爹不敢喘一声，翻过来可好把干妈骂了一顿，”（哭）；“三哭”，“干妈上了那玻璃桥，泪且由不住往下掉，哭得干妈一阵一阵打不起个调……”（哭）这三哭含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控诉恶霸地主赵财主，无理欺压穷人的罪恶行为；第二层，揭露封建王朝县衙门黑暗，贪赃枉法官官相护，草菅人命，一人升官，鸡犬升天的黑暗统治，请看：“新上任的县官是他外甥，衙门就象人家的家门，谁敢把他的汗毛动上一根，叫你活到半夜，你不敢活到天明，”这是血和泪的控诉，怎能不叫刘干妈哭呢？第三层，揭露了封建婚姻和宗法制度的虚伪本质。请看“访来访去，给干妈访下一个刘大汉，比干妈大下一轮半（十八岁）”试想，这样不相配的一对夫妇，谈得上美满生活吗？怎能不叫刘干妈哭呢？对“两笑”“三哭”的生动逼真的艺术处理，如果没有长

期的生活体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两笑”、“三哭”的成功之处在于把一个老实憨厚，朴实善良、稳重大方、而又有生趣的活生生的刘干妈再现给观众，怪不得观众说他演的活象刘干妈。

一个成功的演员不在于他们演出多少个戏，而在于他在舞台上演活几个人物，能感动多少观众，而贾士元演出上百场“探病”，受到成千上万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

二人台传统唱腔、唱法，基本上是从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节目的曲调直接来源于“社火”曲调和爬山调。贾士元在年青的时候，就是一个优秀的民歌手。由于他深深扎根在民间艺术的土壤里，唱腔、唱法始终准确味浓。后来唱腔更是老练、细腻，大湾大调、真假声配合，很是得体。他对青年演员很严格，不论正式演出，还是平常打坐腔，总是耐心地教他们，严格掌握梆板尺寸，所谓梆板尺寸，“梆板”指节奏强弱而言，“尺寸”指曲调的长短而言。然后教他们如何唱亮调、慢板、流水板（慢二流、快二流）控子板、搓板（或踩

板)以及如何衬腔垫字、行腔吐字等技巧。因此在他晚年演出中,不但在各个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有明显的创新。如“探病”一剧中“对菱花”一段唱,多数演员是一字一腔(二流水)唱,他是一字多腔(慢板)唱:原来是一板,他改成两板词唱。这样更比较符合刘干妈和刘大汗吵架后出来的心情,“对菱花”一段的唱词(刘干妈唱)他是这样拉腔吐字的。原词是:东庄干女儿陈翠云,不知得了什么病,倒叫我刘老婆不放心。手提挂面和粉条,三步并成两步行,东庄探病走一程。他唱成:东里(哎咳咳)庄上一——(我的)干闺女——闺女——她这——名叫陈翠云,不知——道她——得了哎咳咳——什么——病嘞哟咳咳,倒叫我——刘老婆——哎嘞哎咳哟——哎嘞哎咳呀——不呀么乃不放——心呀——叫我不放心。手提上——挂呀阿咳面——和——粉——一条嘞哟咳咳,三步——我——并成——两——步——行嘞哟咳咳,我东庄——上——去探哎咳病——哎嘞哎咳哟呀,我这东庄去探我的干闺女的病呀——不知道病轻重。从这一段词

中，可以看出贾士元在唱腔方面，追求稳中有变，变中出新的良苦用心和独到之处。在二人台曲调“对菱花”的一段体式音乐中，装下那么多的虚词，花腔，确实是一种创新。这就是二人台唱腔中拉腔吐字，衬腔垫字的妙用。在西洋歌曲中是少见的，这就体现了二人台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具体来说，贾士元对青年演员不但要求表演技巧过硬，而且在唱腔方面一点一滴地指导，比如说，唱慢板要放的大些、亮些，唱直回不来就不好。嗓子窄，可用高打低唱的办法唱。所谓高打低唱，演员每唱到高音处，唱不起来，可降低八度唱，这样起到了自然和声效果。嗓子高，可用真假声配合唱，即提高八度唱，在引歌高亢声中见宏厚，优美抒情声中见婉转。

贾士元在“惊五更”、“打后套”、“三国调”、“下山”等曲调中，常用真假声配合唱法来发挥自己“金嗓子”的优势。使用“对儿字”吐字方法唱，达到了字正腔圆的艺术效果。也就是唱出去有回音，尾声拖住，刁进字去，才能唱出真正的二人台味来。另外他也不

轻易调高嗓门唱，以免出现直不拉差，费力不讨好。这些可贵的经验之谈，正是他经过几十年的舞台艺术实践，学习、探索出来的，实在是来之不易。

艺术上的任何一点成就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里面蕴含着大量的劳苦和汗水。贾士元为二人台艺术的发展倾注了全身的血液，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受到了旗、盟两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和照顾，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现在他虽是年近花甲之人，在二人台艺术道路上，仍然还是象个小学生那样追求、探索二人台舞台艺术的技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今后打算一方面把他几十年积累的舞台表演技巧和唱腔传授给一代青年演员；另一方面，在他幸福的晚年，在二人台传统表演上和唱腔方面，进行更上一层楼的研究的和探讨，为今后二人台的改革贡献力量，以报答党和人民给他带来的幸福和荣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乌拉特前旗文史资料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2 2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